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院社會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在臺緬華二代的異質族群認同展演：

政治脈絡、教育背景與人群互動

Divergent Ethnic Identity Performance of Burmese-Chinese Second Generation in Taiwan:

Political Context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Personal Interactions.

馬映卿

YING-CHING MA

指導教授：藍佩嘉 博士

Advisor: Pei-Chia Lan, Ph D.

中華民國 113 年 7 月

JULY 2024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在臺緬華二代的異質族群認同展演：

政治脈絡、教育背景與人群互動

Divergent Ethnic Identity Performance of The
Burmese-Chinese Second Generation in Taiwan:
Political Context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Personal
Interactions

本論文係馬映卿君 (R09325001) 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所
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13 年 5 月 16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
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高祖寧

(簽名)

高祖寧

高祖寧

(指導教授)



謝辭

這篇論文是在許多人的照顧下得以完成的。我帶著對身份認同的諸多疑問，從矇懂困惑的起點開始了研究。在過程中，每當我遇到困境，都能順利地收到協助並獲得解決。因此必須感謝在這段時光中，人們為這份論文及我個人層層堆疊起來的貢獻與付出。

首先，我想感謝我的受訪者們，謝謝你們對我的信任，願意與我一起探索我們模糊、不確定的認同。你們珍貴的經驗與回憶，成為這份論文不可獲缺的關鍵。同時，我也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藍佩嘉老師。除了修課階段增長我研究相關的知識，後續指導期間，也用心地協助我在這個複雜的田野中分析出意義。寫論文的過程是我人生目前最缺乏信心、精神狀態最低谷的時光，謝謝佩嘉老師的寬容與溫暖，讓我能抵達完稿的此刻。此外，感謝口試委員曾嬿芬老師、高雅寧老師的寶貴建議，使我的論文得以更進一步完善。

接下來，我要感謝在社會學這個領域度過的八年內影響我、啟發我的師長們。感謝葉高華老師與林傳凱老師，在我大學期間以及畢業後持續給予我學術上的建議，以及精神上的支持與關懷；在研究所期間，謝謝劉仲恩老師與李令儀老師的鼓勵與照顧。感謝中研院的謝國雄老師與蕭阿勤老師，認真地閱讀我的論文並給予許多重要的意見。

接著要感謝研究所的同儕，綺瑀、寓婷、子翔、慧琪、博謙、初冉、韶桓、振辰、育誠、宇廉、語謙、以正、明珊、晨郁，與你們共同學習的日子非常精彩，豐富了我的碩班回憶。在寫論文的階段，非常感謝怡菁、千萍、元文的各種建議與協助。其中，我想特別感謝邰品、侑芳、怡坤、偉賢、達文、恩亞、斯喆，謝謝你們花時間深入瞭解我的論文，並給予我諸多啟發及想法。沒有你們，我是無法走到這裡的。最後，我想謝謝在台大校園生活中用心陪伴我、對我意義重大的摯友，謝謝心平、君淑、怡禎、友仁、冠輝、宥銘，這幾年在你們陸續的陪伴之下，我不曾感到孤單。

寫論文是充滿挫折感的長久挑戰，所幸身邊總有親友照料。謝謝柏嫻、念喬、殷綺、睦容、晨然、俐臻、芯然、樹欣、樹萱，幾位友人不間斷的關愛。感謝我的先生、我的父母、小舅和所有家人給予我的一切支持，讓我在研究與求學期間能夠任性、從容的生活不至困頓。

最後，再次感謝這段旅程中給予我幫助的所有人們。謝謝你們讓我得以完成這份論文。



摘要

本研究探討在台灣的緬華二代的異質族群認同展演，研究發現，這些緬華二代在族群認同的展演上有著許多不同之處，然而，認同展演並非由緬甸華僑家庭的祖籍所主導，教育背景，特別是高等教育，對於緬華二代的族群認同及其展演方式有著更為重要的影響。即使成長過程中的文化接觸不同，擁有教育背景相似的緬華二代會展現出相似的認同策略。

本研究的田野資料中顯示，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中，無論祖籍為何，皆較偏好展演出新二代、東南亞二代的多元面貌。同時，對身份中涉及「中國」、「祖籍」的部分則有著較為敏感的反應，傾向加以迴避，甚至發展出「替代性的認同」，來為其家庭背景中「華僑」的部分進行解套。未經過高等教育的受訪者，則較常選擇掩蓋與東南亞及緬甸相關的身份。

本研究發現，教育背景在族群認同的形成和展演中起到了更為決定性的作用。即便在同一國家內，不同環境對不同身份的影響效果有所差異。台灣社會中，並不是只有一種主流的看法，社會流動或者高等教育取得會影響人們進入不同的環境，周遭人們對族群身份的觀點也會因此有所差異。

本研究也指出，影響緬華二代認同展演策略的宏觀原因，在於針對東南亞身份的移工與階級聯想、地緣政治的敏感，以及新南向政策的推行。最後，本研究也指出現有的新二代政策，使得緬華二代在族群認同展演中需迎合特定政策想像，形成了另一種層面的限制。

關鍵詞：新二代、移民、緬甸華僑、族群認同、多元文化、華僑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heterogeneous ethnic identity performances of the second-generation Burmese Chinese in Taiwan. The findings reveal significant variations in how these individuals perform their ethnic identities. However, these variations are not predominantly influenced by the ancestral origins of the Burmese Chinese families but are more significantly impacted by thei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particularly higher education. Even with differing cultural exposures during their upbringing, second-generation Burmese Chinese with similar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tend to exhibit similar identity strategies.

Field data from this research indicate that respondents with higher education, regardless of their ancestral origins, prefer to showcase a diverse identity as second-generation immigrants from Southeast Asia. Concurrently, they exhibit a heightened sensitivity to aspects of their identity related to "China" and "ancestral origins," tending to avoid these associations. Some even develop "alternative identities" to reconcile the Chinese elements of their familial background. Conversely, respondents without higher education are more likely to conceal identities related to Southeast Asia and Burma.

This study finds that educational background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ethnic identities. Even within the same country,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ffect identity in varying ways. In Taiwanese society, there is not a singular mainstream perspective; social mobility or the attain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can lead individuals into different environments, thereby altering the surrounding views on ethnic identity.

Additionally, the study highlights macro-leve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dentity performance strategies of the second-generation Burmese Chinese, including associations of Southeast Asian identity with migrant labor and class, geopolitical sensitiviti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Finally,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current second-generation policies compel the second-generation Burmese Chinese to conform to specific policy imaginations, thereby creating another layer of constraints on their ethnic identity performances.

Keywords: Ethnic identity, Second-Generation Immigrants, Chinese Diaspora, Myanmar, Identity Formation.

目次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謝辭	ii
摘要	iii
Abstract	iv
目次	v
表次	vii
圖次	vii
第一章、緒論	1
一、問題意識的萌生	1
二、文獻回顧	3
1. 同化 & 族群邊界	3
2. 二代	6
3. 認同	10
三、研究問題	13
四、研究方法	14
第二章、非均值的緬甸華僑二代	19
一、緬甸華僑第一代的內部差異	21
1. 緬甸華僑的組成	21
2. 對華人的經濟與文化壓迫	23
3. 排華的影響	24
4. 優惠華僑政策、緬華與其他華僑的差異與特殊性	25
5. 在台灣緬甸華僑第一代的認同	27
二、緬甸華僑二代接觸的文化差異	30
1. 語言	30
2. 飲食	34
3. 宗教	38
三、小結	42
第三章、未經過高等教育	44
一、認同展演	44



1. 掩蓋東南亞身份	44
2. 劇班	47
3. 裝正常、堅持否認	49
4. 避重就輕	51
二、東南亞、移工、階級污名	54
第四章、經過高等教育	64
一、認同展演	64
1. 扮演新二代	65
2. 極力迴避身份中的中國性	69
3. 尋找身份中涉及「中國」的替代方案	73
二、新南向政策下稱頌多元的價值觀	77
三、地緣政治下敏感的中國身份	81
第五章、結論	88
一、主要研究發現	88
二、研究貢獻	91
三、研究限制與反思、建議	93
參考文獻	95
附錄、訪談大綱	97
基本問題	97
認同	98
社會困境	99



表次

表一：受訪者基本資料-----16

表二：受訪者教育軌跡-----18

表三：不同祖籍緬華二代間的差異-----42

表四：不同教育經驗受訪者認同展演差異-----88

圖次

圖一：祖籍雲南受訪者家中神明廳-----38

圖二：祖籍雲南受訪者家中神明廳-----39

圖三：祖籍閩粵受訪者家中佛桌-----39

圖四：祖籍閩粵受訪者出家時的照片-----40



第一章、緒論

一、問題意識的萌生

除夕夜的晚餐時段，人們多了個得和親戚們緊挨在一起吃飯的理由，緬甸街周邊的房子在狹窄的巷弄擠著彼此，喧鬧的聲響從每個人家的窗戶飄入又傳出。我出生在大家庭，晚飯時刻，餐廳的圓桌上總是坐滿了人。過年圍爐時的圓桌又被塞的更密集了，外公、外婆、姑公、姑婆、舅舅們、舅娘們……全圍著那一大鍋雲南鍋子菜，待上一個人撈起鍋料盛入碗中，便接棒著將勺子傳遞下去。

雖說屋裡三代同堂，卻盡是媽媽娘家的家人，媽媽的家族在我出生以前，便幾乎通通都靠著依親的管道來到台灣。爸爸出生寒微，是以僑生的方式隻身來台的，家人都留在緬甸。飯桌上，我張口提出想趁著畢業後的時間去緬甸走走、了解緬甸。說是走走，實則想去探望二爹，五歲見過一次的記憶，已經太久遠了。隨著長輩逐漸凋零，爸爸也沒有再帶我們回去過緬甸。說不出口是想去找爸爸的家人，我只是嚷嚷著想回緬甸，於是外婆回我，若要去，更該去雲南。媽媽搶著附和，此生務必會帶晚輩們去一次雲南，那是真正的尋根。

話語一落下，妹妹反射性地露出嫌惡眼神。「我才不去中國那種沒有民主的地方。」「而且，姊姊平常那麼多台獨發言，會被抓走的。」外公聽聞慍然，立刻語氣嚴肅的教說，我們的血脈是中國人的血脈，是雲南人，人不能忘本。外公一家之主，話語有重量，一下子同意或不同意，晚輩都不敢回嘴。一家的根是相同的，卻彷彿不完全屬於各自所認同的族群。族群認同不僅不是完全一樣的，還可能是相斥／相反的，像是台灣與中國。

我默默地再碗中添入掛菜，偷偷瞄著二舅孃的表情，一面想著，外公和外婆是老一輩的人，儘管沒有住過中國、最多只是去過雲南旅遊，人生大半歲月都在緬甸度過，卻有著堅定的中國人認同，絕不會承認自己是緬甸人；二舅孃雖也是華僑，可他在緬甸



出生長大成長過程中，緬甸的華僑多已緬化，上緬文學校，她是和二舅舅結了婚後才學的中文。緬甸政變之後，我看著她與在緬甸的家人參與抗議、為緬甸這個國家心疼、擔憂。我猜想，她分明有著深刻的緬甸人認同吧，他真的會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嗎？

火鍋的熱氣持續蒸騰，湯勺沒有被任何人傳接下去，動也不動地倚著鍋子邊緣。我不知如何回應外公，久久沒有人講話，嬉皮笑臉的小舅舅想借著調侃我緩頰，「她是想著，去緬甸就可以發文說自己是『緬甸』新二代了啦，又要消費這些議題。」

從自身經驗出發，我觀察到族群身份認同在代間的斷裂，老一輩的族群認同，在緬甸華僑的家中難以延續。案例除了我的家庭，從相似背景的親戚、朋友家中，也多能窺探出類似的現象。因此原先企圖分析不同年齡層的緬甸華僑，如何展現出族群認同的差異樣貌。我初步的猜測是，老年人應多以正統雲南人自居；而中年人因為在緬甸出生長大，受排華年代政策、接受緬語教育影響，可能出現緬甸認同；而在台灣出生長大、受教育的緬甸華僑年輕世代，自我認同應該以台灣人認同為主。

然而，在初步的田野中，我卻觀察到在台灣出生長大、受教育的緬甸華僑後代，同代之間的身份展演也有著鮮明的異質性。有些人彰顯自己的緬甸身份，說自己是新二代，致力於推廣緬甸文化，卻不願聲張自己的祖籍背景；有些人卻意外地走著長輩們指出的路，延續著雲南人／中國認同，甚至會說自己就是外省人。儘管家庭背景與家庭中實踐的族群文化彼此相似，田野中緬甸華僑二代們，卻可能呈現出異質的、相反的族群身份展演與族群認同。

這些意外的田野發現，促使同時擁有研究者與田野圈內人的身份的我，開始思考自己過去是如何展演自身族群身份的。在翻找過去的日記與備審資料等田野資料後，我也驚訝地發現自身的認同展演，竟在不同生命階段也出現過變化。因此，我開始對緬甸華僑二代認同出現差異的機制感到好奇。我好奇為什麼有些族群認同可以被延續，而有些認同卻呈現出完全矛盾、相互背離的情況？哪些因素會影響緬甸華僑二代的認同展演？在哪些環境中，緬甸華僑身份中的哪些部分，會被選擇性的彰顯／掩蓋？

二、文獻回顧

1. 同化 & 族群邊界

本小節將針對第一代移民同化，以及族群邊界相關的文獻進行回顧，與第二代相關的文獻將在下一小節進行討論。在本小節中，我將回顧西方研究中，探討移民的主要關注焦點，以及移民研究者關注的方向。同時也將說明西方研究與東亞社會、台灣社會、以及本研究的田野對象——在台灣的緬甸華僑，有著哪些結構性的相異之處。

1960 年代以降的跨國移民，促成許多新的族群的建立，德國的土耳其移民與韓裔美國人等類型的身份，在不同社會中萌芽。隨著這些群體落地生根，他們的後代在接收社會中成長、成為移民第二代，近年研究也逐漸關注這些移民的同化以及流動問題。Gordon (1964)，提出了同化的概念，將同化定義為少數族裔逐漸融入主流文化的過程，並深入探討了種族、宗教和國籍等因素對同化過程的影響。Portes 與 Zhou (1993) 則發現，移民家庭的社會地位、文化資本與種族關係間的差異，可能會讓不同族裔的移民群體走向不同的社會位置，並以分段同化來描述移民並非總是平行順利融入美國社會的現象。Alba 與 Nee (2003) 則探討了當代移民對美國主流文化同化的影響。他們認為，傳統的同化模型不再適用於當今多元文化的美國社會，移民和其後裔的同化過程不再是一條線性單向的道路，指出移民群體對美國社會的重塑與影響。

西方目前有關移民與二代的研究中，研究焦點仍多關注較為難以融入當地社會的群體。Alba (2005) 透過比較法國的穆斯林北非人、德國土耳其人、美國的墨西哥人，三個在所屬社會中，被視為對同化構成挑戰的最大移民群體，指出不同層面的邊界在不同社會中有著明暗的差異。隨著跨國移民的增加，國際間的研究者開始關注人數眾多的移民社群與當地社會融合的狀況。即便有移民群體在移居後仍保有強烈的原鄉文化或網絡，在時間推移之下，大多數的移民社群多有逐漸同化的趨勢。Zolberg 與 Woon (1999) 針對在社會中易引發公共辯論的大型移民，例如美國講西班牙語的移民，以及歐洲伊斯蘭教徒的處境進行探討。Zolberg 與 Woon 區分出三種移民與當地人的互動模式，有個體層次的邊界跨越 (crossing) 、移民與移入社會整體的邊界模糊



(blurring) 與邊界轉移 (shifting)，以此描繪移民遷移後如何同化、逐漸融入進當地社會中。

然而，遷移至台灣的緬甸華僑社群與本地社會的互動方式，以及其後代展演的認同，與西方既有移民同化文獻中的樣貌有著很大的區別。讓台灣的緬甸華僑案例與西方國家的移民有所差異的第一個原因，便是接收國本身的高度種族／族群同質形象。台灣作為接收社會，與美國、西方社會中種族分界鮮明的狀態有所差異。台灣與日韓等東亞國家，因為嚴格的移民限制與公民身份制度，在種族上被認為有著較高的同質性。
(Lan, 2024, Chung, 2020) 在這些國家中，移民多半以婚姻的管道遷移，且嚴格的規定也較難以使他們攜家帶眷，難以形成大規模的族裔飛地或者移民的聚落。王志弘 (2011) 的研究指出，台灣社會中女性外籍配偶多與本地台灣男性組成跨族裔家庭，因為婚後分散進入各地台灣家庭，導致族裔聚居地未能形成。因此台灣的移民現象，並不像美國與歐洲國家，是集體成群、肉眼易辨別的。

除此之外，緬甸華僑公民身份取得容易，華人的面貌，與緬甸華僑第一代心中對華人認同的想像，讓緬華進入族群同質性高的台灣社會時，更容易被人們接受。宗教方面，也並未引發歐洲穆斯林移民般劇烈的社會爭議。在過往華僑移入台灣的過程中，中華民國予以華僑特別寬松的遷移制度、優惠的公民身份取得政策，將「華僑」放置於他者與我群之間的曖昧地帶，這一點與多數移民接收國看待移民的方式有著很大的區別。西方目前研究移民二代同化問題的文獻，多以原先文化、語言、認同皆與接收國有所差異的移民群體作為比較，然而緬甸華僑第一代以「依親」、「歸國」的形式遷移進台灣，讓緬華的案例與大多數西方移民有所差異。Zerubavel (2015) 指出，有標記 (marked) 的事物通常有名字，是被明確表述、會特別受到注意的對象；無標記 (unmarked) 的則通常表現為無名狀態，且多為隱含的。相比起外籍配偶、中國籍配偶近年歸化時在制度上會遇到的審查與繁雜的手續，以及社會中的污名，優惠華僑入台的年代，緬甸華僑的遷移方式讓他們容易取得公民身份，在移入台灣社會後，因為語言與文化的相近性，讓他們從制度到生活中都較不被視為「移民」，使緬甸華僑的處境較接近不被標記 (unmarked) 的狀態。



因為華僑制度與台灣社會的特殊性，緬甸華僑在遷移到台灣後，與社會互動的方式、同化的軌跡也與西方移民研究的發現有所不同。透過 Zolberg 與 Woon 的概念檢視緬甸華僑移往台灣的過程，能發現一開始中華民國在制度上是以邊界模糊（blurring）的方式，把緬甸華僑當作想像的共同體，納入自己人的範疇。於此同時，來到台灣的緬甸華僑，在個人層次也同時有在做邊界跨越（crossing）的工作，以適應生活中遇到的台緬差異。

Zolberg 與 Woon 認為，只有當發生大量的跨界與模糊邊界，才會發生邊界轉移，而發生邊界轉移（shifting）後，某些過去被視為他者的人便會被當成本地人。然而，邊界轉移在台灣緬甸華僑的案例中，卻有著完全相反的動態。因為台灣社會對於什麼是本地人的共識仍在打造中，於是在華僑被制度模糊、包裹進台灣以後，又在台灣化的過程中經歷了邊界轉移，被劃出去成為他者。而台灣社會討論與政策的邊界轉移並非同化，更貼切地說，應該是從過去被當成自己人，到被重新劃界的制度框架所驅逐出去。台灣作為在冷戰後少數尚未正常化的國家，在本地人對於何謂自我與他者的想像仍不斷變動的過程中，透過鑲嵌在中華民國想像下的制度，移入台灣的緬甸華僑與二代的經歷，也將與國界、主權與社會共識較為清晰的國家有所差異。

與大多數西方研究談論移民的案例有所不同的是，相較二戰後大部分現代國家多已確認國家的邊界以及何謂本地、自己人，台灣社會對於「台灣」的定義與共識卻仍在打造中。作為移民的接收國，台灣的國家主權與文化邊界皆相當模糊，甚至歷經重構。華僑過去被中華民國框架、政治號召的華人想像納入，卻在台灣社會當代逐漸走向台灣化的民族論述中被排除。

過去的政策將華僑視為自己人，只需海外華僑出示僑居地同鄉會的證明文件，便能取得中華民國護照與身分證，享有各項公民權益與福利。（龔尤倩，2017）然而，1980、90 年代起，台灣政治與文化慢慢走向台灣化／本土化。相對來勢洶洶的民主浪潮，中華民國政府提供的中國人想像與敘事，逐漸走向乾癟枯涸。（蕭阿勤，2012）中華民國憲法的邊界包含中國大陸，而過去政府制度對自己人的想像則包含了海外華僑，然而，《入出國及移民法》、《國籍法》等制度的建立與修訂，作為國家重新標誌邊界



的一種做法，讓華僑從此成為受國境控管的對象，過去對華僑而言輕而易舉的公民身份取得，開始變得相當困難，此時的國民、制度上的台灣人，也因此與過去出現了斷裂。

從緬甸華僑來台的不同遷移階段，可以看出台灣的對僑政策如何歷經了幾次更動。華僑原先被國家視為自己人、投奔正統中國的反共義士，後又在國籍制度的改變之下，成為國境控管的對象。過去只要台灣有人能夠作為擔保，海外華僑便能註冊戶籍進而取得身分證。然而，在 1991 年之後，台灣政府開始對國境加強管理，訂定《國人入境短期停留長期居留及戶籍登記作業要點》，此時華僑雖仍能取得國籍，但出入台灣必須至駐外館申請形同簽證的入出國許可，並待 6 個月停留簽證期滿，必須離境再申請入境。華僑自此成為國家眼中的「無戶籍國民」，無法如往年般立刻取得身分證，入境台灣更須辦理流動戶口，甚至簽證也僅能取得停留簽證。（龔尤倩，2017）同時，台灣政府陸續於 1992 年制定《兩岸關係條例》，並在 1999 年與 2000 年完成《入出國及移民法》、《國籍法》的訂立，國界人流與移民人口開始被有系統的管理，華僑在台灣能輕易取得公民身份的情形從此走入歷史。

相較於可以被模糊的邊界，鮮明的族群邊界較是目前西方針對移民與二代問題的研究焦點，且比較容易被問題化。然而本文卻發現一矛盾之處，模糊的界線這種類型的同化，允許個人同時感覺自己是少數民族和主流的成員，看似應是最理想的同化方式，在台灣的緬甸華僑案例中，卻似乎仍蘊含許多問題尚未被妥善討論，並可能讓我們難以看見其後代在認同上的失語困境。Alba (2005) 指出，明亮的邊界對少數民族流動的阻力，也促使少數民族採取集體行動來打破障礙。因此本文認為，緬甸華僑在台灣社會中的模糊邊界同化模式，可能使得不平等更難被看出，也更難以形成集體力量，在政治等場域動員促成改變。

2. 二代

跨國移動在全球化下變得頻繁，大量的人口流動，促使許多研究者開始重視移民議題，而近年隨著移民第二代在移入國逐漸成長，移民後代的處境也受到許多西方研究者的關注。（Portes & Zhou, 1993；Farley & Alba, 2002）在有關移民二代的文獻



中，西方與北美研究的核心關懷通常是關注有沒有辦法融入社會，以及移民第二代融入到社會中的哪個位置。Portes 與 Zhou (1993) 指出，移民在美國社會的同化模式並非一致，移民之間有著不同的流動形式，因此該研究提出關鍵的研究問題「移民群體被同化到美國社會的哪個部門」，並類型化出三種主要的方式：順利線性地同化並平行融入白人中產階級；與第一種相反，即永久的貧困和同化為下層階級；還有第三種，有選擇地與美國社會同化的策略。Portes 與 Zhou 認為，有節奏、有選擇的同化戰略是移民少數民族的最佳途徑，但此戰略的可行程度，也取決於每個移民群體的歷史、脆弱性和資源狀況。在分段同化的現象中，脆弱性讓一些移民群體變得容易向下流動，第一個是膚色，第二個是地點，第三個是缺乏流動的管道。

Farley 與 Alba (2002) 的研究也關注美國移民第二代的發展。他們關心移民第二代在成長、進入社會後，是會融入中產階級，還是形成新的城市底層。研究中許多案例指出，美國的移民二代在教育成就、職業取得和經濟處境上的表現傾向優於第一代，這些數據否定了移民第二代將在貧困中掙扎的假設。同時，他們也發現，移民第二代在教育成就、職業取得和經濟處境上，會因出生地國家而有很大差異。在研究中，他們也發現對於波多黎各和墨西哥血統的人來說，代際進步不如亞洲、歐洲或南美洲血統的人。

東亞的移民二代研究，則是關注以女性為主的婚姻移民，其子女的處境。第一代為性別與階級較為弱勢的外籍配偶，第二代的生活困境與跨國身份的挑戰也是許多文獻關注的部分。亞洲其他國家的新二代研究，多以個人單位移動的婚姻移民為主。移民第一代通常是母親，在性別與國籍和經濟處境的弱勢上，較難以傳承文化給下一代。楊真宜 (2017) 的調查顯示，近七成的新二代傾向選擇父親那方的單一族群背景為自己的身份認同，僅有不到一成受訪者認為自己是雙/多元族群的背景，也僅有不到一成的新二代，有在家中使用母親的母語。

當代台灣社會的跨國移民面貌主要由東南亞籍女性配偶構成，自新住民數量增加、政府推出新南向政策以來，台灣社會與研究也增添不少有關新住民議題的討論。（夏曉



鵠，2000；馮涵棣、梁綺涵，2008；王宏仁，2001）。夏曉鵠（2000）關懷跨國婚姻在商品化下，女性外籍配偶的處境；馮涵棣、梁綺涵（2008）的研究則關注跨國婚姻家庭中，幼兒社會化的過程；王宏仁（2001）的研究則指出了婚姻移民對台灣勞動市場的影響，如何成為補充性勞動力並扮演勞動力再生產的角色。

然而，在台灣，移民研究大部分僅關注婚姻移民，移民二代的研究也多以婚姻移民子女的研究為主。（夏曉鵠，2000；馮涵棣、梁綺涵，2008；王宏仁，2001）台灣社會目前廣泛討論的移民二代，主要多指涉婚姻移民第二代。而緬華二代與新二代的處境最大的差異是，緬華家庭組成大多為內婚，而台灣大多數新二代的父母其中一方則是台灣人。緬甸華僑二代的家庭背景中，雖然也有經歷跨國遷移，卻不被新二代的主要定義所包含。然而，即便婚姻移民與緬甸華僑第一代，皆是主動遷移到台灣，兩者的遷移管道的不同與遷移後生活處境上的差異，也讓緬甸華僑二代出現和新二代不太一樣的認同與成長過程。

學術研究、新聞內容外，官方制度中對新住民子女定義的描述，也顯現出國家對新二代的想像，主要仍侷限於指涉婚姻移民的子女。¹雖然父母也是遷移到台灣的人口，緬甸華僑二代與新二代因為處境有著許多差異，在認同的展演上也有著不同的限制與對策。這些既有的研究與新聞中的觀察，難以捕捉、涵蓋緬華二代在認同方面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而過去的移民研究，並沒有把華僑當成移民看待，使得緬甸華僑二代的族群身份定義在相關文獻中處於模糊的狀態。

在有著「一半台灣血統」的血緣邏輯之下，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讓新二代得以在政策鼓勵下擁抱夠促進跨國交流、多元文化的敘事。隨著新移民、新住民身份逐漸被建構，近年新二代也活躍於台灣公共討論中，開始探索自身認同。（陳浩寧，2017）與新南向政策相互呼應，新二代在台灣社會中的處境出現轉變，盧姿云（2021）的研究將台灣對於新移民的態度分為三個時期「未受污名期」、「污名化高峰期」及「新移

¹ 新住民子女：係指設籍本國之在學學生其生父或生母一方為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等新住民者，若已入本國籍，或已死亡、失蹤、離婚，仍應屬之。（教育部，2019）



民肯認期」，在這波浪潮中，對多元文化友善的相關討論增長，讓在外籍配偶子女可以更有動力的展演出自己的新二代身份認同。

與居住分散、家庭背景中多元文化的接觸機會較少的新二代相比，在擁有聚居地的加持下，緬甸華僑在家中使用的母語，多有著傳承的機會。然而緬華二代的問題是，就算有飛地，看似能幫助移民二代傳承文化，卻並未形成一個明確的集體族群認同。緬甸華僑以家庭為單位的遷移模式²，與新住民隻身、透過婚姻遷移到台灣的處境有所不同³，而「歸僑」與「歸化國籍」兩種遷移管道的差異，也使得許多緬甸華僑二代在制度上並不被認為是新二代，因此不但缺乏相關統計資料，在相關補助與福利政策的使用上，身份不符合新二代的條件也使得緬華二代遭到排除。

在社群樣貌上，緬甸華僑來到台灣後，許多人選擇聚居在中永和一帶，與散居在台灣的外籍配偶也有差異（黃郁涵，2009）新北市的緬甸街作為台灣罕見的族裔地景⁴，舉家遷移的緬甸華僑，便成為少數具有公民身份、擁有類似族裔飛地（ethnic enclave）的移民群體。緬甸華僑二代的父母，甚至祖父母，整個家族遷移到台灣的情形非常常見，更因為內婚普遍，在文化上保有了家鄉飲食與母語的使用。

即便有著聚居地，並有著內婚為主的家庭型態，家庭文化較新二代較有機會延續的緬甸華僑二代，卻並未在台灣社會形成集體認同。與在國家欲打造多元形象而廣泛推廣的新二代身份相比，緬甸華僑二代的身份被想像為與當地社會同化較順利的群體，同時因為台灣社會與官方的論述，皆逐漸貼近台灣本土化的敘事，華僑身份易與中國產生聯想，便也形成較為敏感的議題。

² 翟振孝（2006）指出，緬甸華僑透過舉家遷台或個人來台再申請親人團聚的方式，在中和華新街等地形成移民聚落。

³ 馮涵棣、梁綺涵（2008）指出，台灣大多數新移民、新住民幾乎全為女性、因婚姻隻身而來、來臺未久就多成為母親。

⁴ 大部分台灣的族裔地景由移工短暫的假日聚集構成，但透過華僑作為中介者，許多地點也得以從暫時轉為擁有長久使用權。然而，台灣各地的東南亞族裔化地方並非以聚居為根據，而是以消費為主的空間。東南亞新移民的定居聚落很難成形。即使有少數農漁村落有較高比例的外籍配偶，依然不構成「同族裔聚居地」（enclave 或 ghetto）的條件（王志弘，2011）。



因為沒有形成穩固的集體認同，也並未如同新南向政策下的新住民與新二代，成為國家、社會欲建立出的身份認同。緬甸華僑二代的族群身份具有可操演的空間，在田野中，有的緬甸華僑二代會以祖籍、外省人身份進行自我認同；也有的受訪者會選擇稱自己為新二代、緬二代。

3. 認同

回顧既有認同研究，發現過往針對認同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將身份視為原生的、固著的本質主義，以及將認同視為為後天建構，且可能出現流動變化的解構、後結構主義。

本質主義基於人們的相同經驗，將身份的意義當作特定群體顯而易見、自然而然的集體現象。然而，本質主義的解釋難以回答群體內部的異質性、個人多重和有時矛盾的認同構成，以及改變的可能性。（Moya,2000）因此近年既有文獻中有關認同（identity）的研究，已從固著的身份轉向到動態認同，認為認同不但不是範疇式、靜態、先天歸屬的，而應將之視為是認同建構（identification），是過程性的、與社會互動下的、可能變遷的產物。（黃克先，2005）在走向解構、後結構主義的解釋中，主體沒有不變的本質，且時常是破碎、空缺、矛盾或臨時策略性的，由文本、論述、不斷延異的慾望、扮演、拼湊所建構成的。解構主義雖然避免了本質主義對立即了解身份和經驗的渴望，但其對知識可靠性的極端懷疑主義，也招致其被批判為讓身份走向完全的虛無。（Hames-García, 2000）若認同全是建構的，沒有所謂本質、原生的認同，我們應該如何思考身份政治以及外部認同有時集結而成的力量？Brubaker（2000）關心動態、軟的身份認同被研究的方式，他認為若身份是流動的，應該探討自我認同凝固和結晶的方式。在認同研究朝著解構、流動、不固定的方向進展後，形成認同的過程與促成的原因，成為許多後續研究的關懷目標。也因此，本研究的問題意識與分析目標，並非區辨或者建立出一個正確、真實的緬甸華僑認同，而是透過觀察受訪者的認同在各個生命階段、場域中展演的樣貌，進一步思考引發認同出現位移、異質性的機制與因素為何。



在探討是什麼影響了移民二代的認同，家庭、第一代的教養與語言傳承，便是不能忽略、時常被認為對移民二代的認同有著重要影響的因素。Phinney (1990) 的研究指出，家庭、社區和社會環境對青少年的族群認同形成和發展起著重要作用。Bailey (1996) 的研究指出，精通兩種語言的兒童和青少年對亞美尼亞社群的認同感，大於只會講英文的移民後代。作者認為，對母語的了解有助於保持族裔參與，進而強化族裔認同。然而在緬甸華僑二代的認同展演中，可以發現許多人的認同與家庭背景給予的文化是有所不同的。舉例來說，有的受訪者即便不會講緬文，家中長輩教導他要有中國人認同，仍然表現出與緬甸文化較為親近的形象。

除了家庭內部的因素與父母的教養策略，地緣政治也可能對移民二代的處境與認同產生影響。Sadeghi (2016) 指出，美國和伊朗在政治上的敏感與敵對狀況，使得伊朗裔移民在美國社會容易遭受歧視。Sham (2020) 在加州和洛杉磯的南亞裔移民穆斯林社群中進行研究，發現地緣政治影響了在美國南亞人／中東人的處境與認同。促使移民們積極管理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展演「好穆斯林」的樣子，甚至會管理自己要穿什麼顏色的頭巾。在台灣，隨著兩岸情勢緊張，與中國有關的身份在近年也變為較為敏感的身份。然而，Portes 與 Rumbaut (2006) 及 Rumbaut (2008) 也提出 Reactive Ethnicity 的概念，他們發現，在面對敵意的環境，甚至受到威脅、迫害、歧視時，某些族群認同反而會得到增強。例如，當韓裔美國移民二代，在 1992 年洛杉磯暴動中目睹韓國人的店鋪被針對和焚燒時，他們的韓裔身份認同反而會變得更加強烈。這種族群認同的形成模式認為，歧視和針對特定群體的負面印象，可能成為形塑認同的動力來源。緬甸華僑在台灣受到的敵意，相對於上述文獻中的案例，是屬於相對幽微、且大多數人對此移民群體是感到陌生的。而這樣的陌生，與國家邊界重構、移民政策與文化論述逐漸走向台灣化的歷史因素有關。

台灣文化與制度邊界歷經重構之後，過往制度上中華民國的邊界將海外華僑皆納入其中，而逐漸走向台灣化的過程，該將緬甸華僑與後代安放在「台灣百年追求」敘事⁵中

⁵ 蕭阿勤 (2013) 指出，1980 年代上半葉，黨外人士對台灣的過去發展了一套闡述以對抗中國史觀。在這套台灣百年追求敘事中，國民黨是殖民者，而台灣人受其殖民。（吳乃德，



的什麼位置，成為難以回答的懸問。過去被中華民國政府稱頌的「反共義士」、「華僑為革命之母」等說法，在民主化與台灣化的過程消聲匿跡。因此，雖遷移軌跡鑲嵌在台灣與中國特殊關係的歷史中，並非個人層面的個案，而是群體、集體移住。在受教育的過程中，緬甸華僑二代無法從課本與國家官方敘事中得到「自己為何在這裡」的解答，因而出現對家庭遷移歷史陌生，並對認同感到矛盾困惑的狀況。相較新二代能在政府開始推動新南向政策後，擁抱夠促進跨國交流、多元文化的敘事，緬甸華僑二代的身份卻無法被精準的描述。即便認同自身為外省二代、新住民二代，這些類別皆無法貼切描述他們因著緬華一代特殊遷移背景所面臨的處境。既有新住民二代研究，無法貼切的描繪出台灣緬甸華僑二代在認同上掩蓋、操弄、失語、複數、流動的狀況，而認同困境的背後顯示出，目前台灣化與國家敘事形塑的過程，仍缺乏一個合宜的敘事（narrative）安放他們。只能在現有的選項中，演出最適合自己的樣子。

相較於已集體認同的族群認同，緬甸華僑二代的認同，較處於模糊地帶，有可操演的空間。沒有形成集體認同的族群認同，是否就沒有探究的必要？目前台灣既有族群研究框架，大多以王甫昌、張茂桂等人的研究——把所有群體「族群化」的四大族群說為主流。過去的族群研究與族群分類方式，多認為要經過「精英運動」、「社會運動」才是有意義的群體。（張茂桂，1993；王甫昌，2003）關注的焦點也多在考察集體認同如何形成，或者依循四大族群的分類進行分析。然而，本文企圖採取與過往族群研究探討「集體族群認同形成」有別的研究焦點，透過考察沒有形成統一的集體族群認同、內部有著異質性身份表述、處境充滿不確定的研究對象如何展演自身的族群身份，以描繪出邊界與定義模糊的移民二代，動態而複數的身份與認同機制。

因為長久以來用以指涉婚姻移民二代的新二代框架，不足以完全說明緬華二代的狀態。而華僑在近年台灣化下，變成不大被關注、缺乏身份論述的敏感族群。緬華二代的族群認同，因而成為未發展出集體認同的族群認同，有些人跟隨著自己的祖籍身份，將自身描述為外省人，也有人模似新二代的論述，認同自己是緬二代。緬甸華僑二代的

2013）有別於過去將華僑視為自己人、華僑為革命之母的中華民國政府觀點，在社會逐漸走向台灣化的趨勢中，緬甸華僑難以在這套新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身份具有操演性，然而其呈現出的族群認同樣貌，並非每個認同主體所獨創的，而是依循著一套外於自身的、社會中的劇本進行族群身份的演出。

根據 Goffman (1959) 的劇場理論，個人在社會互動一開始時，便會對情境釋出定義，並為後續的互動提供指南，而為了維持印象，人們會採取策略與方法來保護情境定義，以不讓自我表演限於窘迫的處境。然而，在不同環境中，互動對象對認同主體投射的期望可能有所差異，緬甸華僑二代身份中的中國性與東南亞特質，在不同政治傾向或有著特殊刻板印象的環境中，可能分別收穫到截然不同的褒貶意涵。因此，本研究好奇在家庭、地緣政治等因素交織影響下，緬甸華僑二代如何根據對互動者期待的推測、對話情境與身處環境進行判斷，並做出不同的身份管理工作。

三、研究問題

若緬華第一代過去在緬甸的生活背景，會直接地影響到緬甸華僑第二代接觸到的文化，進而成為左右緬華二代認同的關鍵因素。根據對祖籍雲南／閩粵緬甸華僑二代兩者在成長過程中接觸到的文化差異的描寫，以家庭中祖籍的差異，應該會有兩種樣態：祖籍雲南、家族原居於緬北者，較容易展演雲南、祖籍身份；祖籍閩粵、家族原居於緬南者，更傾向將自己呈現為新二代。然而，緬甸華僑二代的認同實踐與操演，皆比起想像中的更為複雜、不固定。比起不同祖籍間家庭環境對緬甸華僑二代認同造成的影響，進入高等教育的場域與否，更大程度地決定了緬甸華僑二代的認同展演策略。兩個祖籍不同的緬甸華僑第二代，即便成長過程中接觸到不一樣的文化，也可能在相同的高等教育取得狀態下，做出相似的族群認同展演。

爬梳過往的族群認同研究，多認為家庭對移民二代的認同至關重要，也有文獻指出政治上的敏感也會導致不同國家的移民在移入社會中遭受歧視，進而迫使他們動用各種手段管理自己的族群認同展演。在本研究的田野資料中，發現家庭給予緬甸華僑二代的文化，雖為緬甸華僑二代的族群認同奠基了基礎的元素，卻並非影響其認同展演最



主要的因素。反而是「上大學與否」的生命經驗，更大程度地與緬甸華僑二代做出哪種族群認同產生關聯。

田野觀察到的現象，使我對緬甸華僑二代操演認同的機制感到好奇。本研究將探究為何緬甸華僑二代的認同展演，並非延續第一代的認同，依照家庭文化背景進行傳承，反而更受高等教育的影響。祖籍雲南、祖籍閩粵兩種家庭的緬甸華僑二代，在使用的語言、宗教信仰和飲食方面存在著差異。然而，為什麼相同教育程度的緬華二代，即使家庭背景、文化不同，也會做出相同的認同展演？為什麼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受訪者，大多會說自己是新二代，同時掩蓋自己的祖籍背景。而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受訪者，傾向會掩蓋自己的東南亞背景，並選擇性地展演出自的祖籍身份？

除此之外，本研究發現當受訪者在歷經教育程度改變、進入大學後，他們能夠感知到周遭人群對不同族群身份的觀點出現差異。從田野中，可以發現對不同教育程度的受訪者而言，周遭的「主流」意見有著異質性。與過往研究地緣政治影響移民認同的文獻相比，緬甸華僑二代面臨的並不僅僅只是一套刻板印象，而是會隨著所處的環境不同、教育程度改變，同時變動的主流價值觀。

因此，本研究好奇，高等教育取得如何影響緬甸華僑二代的認同？不同教育程度的緬甸華僑二代，周遭的人們分別如何看待他們？他們在哪些情境下會展演哪種類型的族群認同？同時，也將更進一步地問，是哪些更大的社會結構與地緣政治的因素，促使緬甸華僑二代身處的社會，對東南亞與中國這兩種族群身份出現不同的觀點。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受訪者為在台灣長大、接受義務教育的緬甸華僑第二代，為回答研究問題，將進一步針對不同社會條件進行理論抽樣及滾雪球抽樣。Glaser 與 Strauss (1967) 指出，理論抽樣是為了建立理論而進行的資料收集過程，研究者須透過收集、編碼和分析他的研究材料後，決定下一步要收集哪些以及在哪裡能夠找到這些資料，以便在理



論出現時對此進行發展。其中，不同類別研究對象的安排，來自一般概念的計畫（general conceptual scheme）以及假說（hypotheses）的設計。本研究根據可能對緬甸華僑二代處境及認同造成差異的因素進行推測，將樣本的變異根據家庭祖籍與教育流動，分為：祖籍雲南／祖籍閩粵，以及未接受高等教育／接受高等教育四個類別。

Biernacki 與 Waldorf (2016) 指出，滾雪球抽樣法非常適用於研究的重點較為敏感的問題，以及相對隱私、需要內部人士來找到研究對象的問題。有關認同展演及談論身份困境的問題意識較為敏感，但由於筆者本身即為雲南籍緬甸華僑的第二代，出生長大於緬甸街、同時是田野內部成員，本研究得以透過自身網絡採取滾雪球抽樣法，尋找上述四種尋找不同類別的受訪者。密切的人際網絡，加上研究者本身相同的族群背景，讓筆者得以透過自己人的身分獲取許多珍貴的研究資料。以彌補過去研究者在研究此問題上，不被完全接受之不足。

然而，滾雪球抽樣有著侷限：容易找到認同較為強烈的人，也就是較活躍者。針對滾雪球抽樣方法的提醒，Biernacki 與 Waldorf 也指出，可以透過「控制轉介鏈的類型和任何轉介鏈中的案例數量」以及「對轉介鏈的進度和數據質量進行監測」，來避免抽樣的偏差，因此本文在尋找受訪者與抽樣時，有對此特別留意，根據親朋好友間的引薦與自身的人際網絡，再找出認同展演較為隱晦／不活躍者。

在尋找受訪者的過程中，除了找活躍於新二代活動中的緬甸華僑二代作為受訪者，並請他們引薦自身有著相似家庭背景的友人接受我的訪談。我也叨擾了多年未見的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同學，甚至刻意尋找在我印象中，有刻意掩蓋、試圖抹去自己家庭背景的受訪者，以避免找到的受訪者同質性過高的問題。同時，雖然自身的家庭背景是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我刻意將受訪者的祖籍設計為平均分佈，九位祖籍雲南，十位閩粵。為了避免性別不同的受訪者，可能在表達的程度上有差異，本研究中受訪者們的性別比例也是平均的。



受訪者	祖籍	性別	教育背景
包姐	雲南	女	職業學校、技術學院
小光	雲南	女	五專、二技
家家	雲南	女	私立高職、科技大學
小丹	雲南	男	私立高中、科技大學
小皇	雲南	男	高中畢業
阿之	雲南	男	高職肄業
映卿	雲南	女	研究所
阿勇	雲南	男	公立高中、國立大學
阿若	雲南	女	公立高中、國立大學
珊瑚	閩粵	女	私立高職畢業
小密	閩粵	男	公立高中、國立大學
阿全	閩粵	男	高中畢業
阿本	閩粵	男	私立高中、科技大學
栗子	閩粵	男	高中畢業
阿宏	閩粵	男	高中畢業
小日	閩粵	女	高中畢業
小金	閩粵	男	私立高中、科技大學
小亞	閩粵	女	公立高中、國立大學
達哥	閩粵	男	公立高中、私立大學

表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在教育程度上，本研究原先僅憑著對「只找大學生訪談，會漏掉田野中佔更多多數、未取得高等教育的緬華二代的經驗」的擔心，設計了「受訪者中，需要有一半沒有取得高等教育」的條件，卻意外的在田野結束後發現教育程度是影響他們認同展演的關鍵因素。

在研究搜集的方面，本研究透過半結構式訪談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設計有利於與文獻對話的訪談大綱，讓受訪者得以在引導下進行開放式的回答，在訪談中，訪綱涵蓋了一系列與認同、文化相關的問題。所有的訪談都有被錄音，並被完整地以逐字稿的方式記錄下來。透過針對訪談內容進行編碼，我編列出目錄與大綱，並從各種類別中觀察、捕捉現象。同時，我也使用了參與式觀察法，在受訪者的意願下參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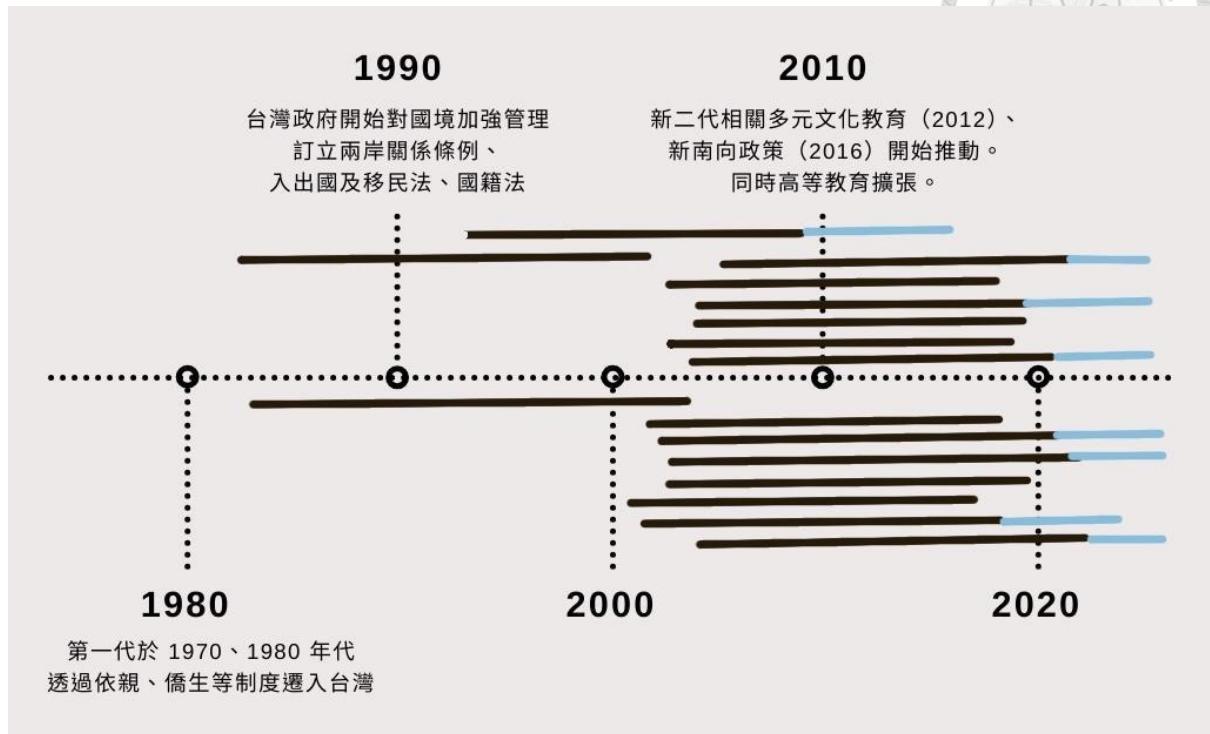


他們的家庭活動，進行觀察、分析。田野場域及活動內容包含參與家族聚會、旅行、住宿受訪者家、安排受訪者家庭出遊等形式。

緬甸華僑第二代的案例中，認同的展演有許多異質性，卻難以捕捉其中動態的認同過程變化。因此至於客觀轉變的材料，因為非常私人，且不一定所有變遷都容易被捕捉、能完整地對材料進行分析，本研究將透過自身作為待過不同場域、認同有著不同類型的田野案例，也擷取了自身於不同時期記錄下來的自傳性質材料，包含小學時期自我介紹的作業、申請大學與研究所時的備審資料、在 podcast 過程中進行自我介紹的語音檔。透過客體化，分析族群認同展演在不同場域與成長過程中的流動變化。

針對章節設計的部分，本研究將在第二章說明研究對象的背景，並透過描繪緬華二代家庭背景中的文化內容，指認出緬甸華僑的祖籍差異——祖籍雲南與祖籍閩粵。然而，因為田野資料中呈現的緬甸華僑二代認同操演策略，並未根據祖籍差異而不同，而是根據高等教育而有所差異，因此後續章節並未以祖籍差異作為兩種類型。在第三四章，本研究將說明未經過高等教育的緬甸華僑二代與取得高等教育的緬甸華僑二代，兩者如何操演認同。並嘗試回答他們的認同操演策略，又是如何受到社會脈絡中的污名所影響。

雖然第三章與第四章分別以接受高等教育與否進行區分，然而，本文並非將受訪者區分為兩種不同的群體看待。接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們所回顧與講述的、對進入大學以前的經歷，也成為第三章的內容。若從下列附圖來看，第三章的田野材料即為黑線部分，而第四章的經驗則為藍線部分。在保護受訪者個資的同時，為方便讀者將受訪者們教育軌跡與重大的幾個歷史時刻、制度變遷時間點進行對照，附圖可作為參照。



表二：受訪者教育軌跡

註：上半部為祖籍閩粵受訪者們的教育軌跡，下半部為祖籍雲南受訪者們的教育軌跡。



第二章、非均值的緬甸華僑二代

「我覺得我不是新二代。」當訪談進行到與新二代認同相關的問題時，小光臉色一沉，不假思索地否認。對小光而言，新二代似乎不是最貼切的族群認同。或許是與我預料的反應差距太大，聽到回覆後的我愣了一下。原先僅是想著，緬甸華僑二代與新二代都是移民到台灣的第二代，應該多少會因著有些相似的生命經驗而產生共感，沒想到會得到如此果斷的反駁。一股說不上來的尷尬哽在咽喉，我緊接著追問她，如何描繪出自己和新二代的區別。

「我覺得我身邊認知到的新二代的爸爸媽媽他們都是真的，他們就不是華人。他們是真的、外籍的，可能媽媽是越南人，或者是可能泰國人緬甸人之類的。然後那種的話，我覺得他們好像可能他們的生長環境，就會更受到兩個不同國家的一些文化衝擊之類的，但是我覺得我就還好。」小光向我解釋。話語之間，她在華人與東南亞、非華人的身份中，劃出了一條鮮明的界線。相較於新二代認同被她果斷地否認，被問到是否認為自己是外省人或外省後代時，小光卻不假思索地的回答「對啊，我是外省人」，語氣斬釘截鐵。

雖然華僑第二代有著外省人認同，似乎不太令人費解。然而，過去的幾次訪談讓我知道，在小光的成長過程中，其實曾經因為具有新二代身份而獲得某些政府提供的資料、資源。作為緬甸華僑二代的受訪者中，有被戶政單位登記為新二代的少數案例⁶，我非常意外即便在制度上有著聲稱自己是新二代的正當性，小光仍將自身排除於新二代認同之外。

在整理另一位受訪者小密的逐字稿時，我時常想起和小光的訪談。兩人的回答迥然不同，對比起來有種矛盾感。小密的父母也都是緬甸華僑，他與大部分的緬甸華僑二代一樣，從小在學校裡都沒有收過任何新二代有關的資料、簡章，也從未收到任

⁶ 小光一家人是家族中是相對較晚到台灣的家庭，爸爸先依親到台灣，媽媽隨後透過跨國婚姻的制度跟上。就是差了幾年，他的媽媽剛好碰上移民法實施、國籍法的制度更動，因此被歸類為「新移民／外籍配偶」。



何政府寄送的，與新移民、新二代有關的信件資料。對於父母的祖籍廣東，小密感到非常陌生，相反地，提到緬甸時，他時常用「我們國家」來代稱。被問到有關新二代認同的問題時，他不假思索的回答道：「我是新二代啊，如果說我新一代我也沒關係，因為我本來就是子女輩。」當我追問他，是否能察覺自身與新二代之間的差異時，有別於小光認為自己相較新二代「同化的較為順利、與台灣社會的文化差異較小」，小密出乎我意料之外，驕傲地表示他的「緬文程度、母語能力遠遠超過普遍的新二代」，認為自己比起新二代更熟悉移民第一代的語言。上了大學以後，小密有機會接觸到許多母親來自其他國家的台灣新二代，因而得以發現自己和他們之間的差異：「對新二代的印象是，我身邊的新二代不管是越南籍還是印尼籍，他都不會用那裡的、用我國的語言，他們也沒有想學的意願，但我比較有環境學會。」小密自信地對我說。

在訪談中，我接觸到許多和小光類似的受訪者，不認為自己與家人是緬甸人，甚至覺得比起認同自己是新二代，自己更像外省人。對他們而言，緬甸只是家族曾經住過的地方。雖然對緬甸較沒有情感連結，這群和小光類似的受訪者，大多表示對祖先過去在中國居住的省份，特別是雲南的文化更為熟悉；然而，也有一些受訪者的情況和小密較為類似。他們認為自己就是緬甸人、對緬甸有情感，但對於自身的祖籍身份則感覺相當陌生。

在最初的假設中，我認為是社會中對東南亞的歧視與偏見，導致與小光相似的這些緬甸華僑二代在與主流社會互動時，會選擇掩蓋自身緬甸背景、策略性地矇混過關（passing）轉而認同祖籍身份。然而，這樣的假設讓我難以回應，為何在同為緬甸華僑二代、自己人的訪談情境中，許多緬甸華僑二代仍然堅持否認自己的緬甸認同與背景、或將緬甸視為過去家族居住過的某個地名般疏離；同時，也難以理解為何明明父母皆以華僑身份、透過依親等管道從緬甸來到台灣，另一群像小密一樣的緬甸華僑二代，卻相反地認同自己更像新二代、甚至就是新二代，而非外省人。

若要了解小光和小密兩人族群認同形成差異的原因，必須從源頭探究緬甸華僑二代們在成長過程中，所接觸到和族群、國族背景有關的文化內容具體而言是什麼。而



緬甸華僑二代接觸到的這些文化，又很大程度地取決於原生家庭族裔文化的實踐，以及家長對其施展的教養策略。雖然皆是緬甸華僑的第二代，但是如果從根本上小密與小光接觸到的飲食、語言與宗教並不相同，兩者的族群認同出現差異，便稱不上是令人意外的事了。事實上，在台灣的緬甸華僑內部有著異質性。緬甸華僑二代在生活中體驗到的文化內容，包含飲食、母語、宗教等，都不完全相同。並且可以依照祖籍，區分為「祖籍雲南的緬北緬甸華僑」，與「祖籍為福建／廣東的緬南緬甸華僑」兩種類型。第一代過去居住在緬甸北部、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其在台灣的後代大多與小光的生命經驗十分類似，時常吃到雲南菜、在家和家人溝通使用雲南語；而父母為過去居住在緬南的福建／雲南華僑的第二代，在飲食與語言上都對祖籍相當陌生，卻相反地非常熟悉緬甸的文化。

因此，本章將在第一節說明造成緬北、緬南兩種類型緬甸華僑家庭，文化實踐上形成差異的脈絡。過去在僑居地便存在的南北差異，延續至來到台灣的緬甸華僑第一代的生活中，進而影響了緬甸華僑二代所接觸到的文化內容。同時，第二節也將透過實際描繪出緬甸華僑二代的飲食文化、宗教、語言使用，勾勒出祖籍雲南與祖籍廣東／福建緬甸華僑二代非均值的族裔文化經驗，以回答緬甸華僑二代認同的內部歧異。

一、緬甸華僑第一代的內部差異

1. 緬甸華僑的組成

緬甸與中國接壤，許多有著華人認同的移民隨著經商誘因自願遷移，或因著戰爭與歷史事件非自願離散，在不同時期遷居緬甸。提到緬甸華僑時，許多人會直接聯想到滇緬孤軍。然而，在這些印象之外，緬甸華僑的遷移動機、遷移時期其實也有著異質性。居住在緬甸的華僑並非全是滇緬孤軍，緬甸華人社群的組成並非完全是政治性的離散（Diaspora），也有經濟因素的遷徙。自元朝前到近代國民黨遠征軍的退守，以及不同時代皆有的商業往來，都吸引了雲南華僑與閩粵華僑



遷移到緬甸居住，不斷地為緬甸華人社會注入活水。移居到緬甸的華僑透過蓋廟、創辦華語學校、建立同鄉與宗親團體，大多得以保有原先信仰、語言使用與認同。尤其隨著國民黨注入資源，在當地創立華夏學校、培養華語教育後，僑民對中華文化的意識更加穩固，母語傳承與認同因而得以倖存於緬化。（翟振孝，2006）

居住在緬甸的華僑，可以根據「水路」與「陸路」兩種移動前往緬甸的方式，區分成住在緬甸北部、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與住在南部、祖籍福建／廣東的緬甸華僑。曼德勒作為分界的上緬甸區域，華人社群大多由雲南人組成，為經由陸路來的「翻山華僑」（Mountain Chinese），而下緬甸區域則以經由海路而來的「渡海華僑」（Maritime Chinese）—廣東、福建為主的移民居多。（Purcell, 1974）北、南不同祖籍的華人分佈，也讓緬甸華僑在語言、產業等方面都有著差異。

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主要聚居於緬甸北部的臘戌、密支那、當陽、眉苗這幾個城市內，因為擁有能夠保存雲南文化的生活環境，大多延續語言使用與認同。除了世代經商搬遷到緬甸的華裔移民，近代有許多雲南籍的緬甸華僑，因為政治因素離散到緬甸借土養命。國民黨軍隊遺緒在當地注入了不少教育資源，也有許多軍人留在當地當老師，提供了當地華人傳承中文、華語的基礎。此外，緬甸北部的這幾個城市中，華人比例高且居住密集，街坊鄰居皆為緬甸華僑。在工作上，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也聚集在特定的幾個產業，包含玉石、木材、農業等類別，因此在工作中大多數互動的對象也是同鄉的人為主。因此不但生活中能夠經常使用雲南話、容易能夠延續母語傳承，更有許多年紀較長的受訪者表示，即便在緬甸出生長大，過去不覺得自己需要會緬甸語，不但緬甸話講得不流利，更看不懂緬甸的文字。像是受訪者小光的媽媽回憶起住在緬甸的時光時，便表示「以前住的地方離中國的瑞麗只隔著一條河，去那邊做生意都是講雲南話」。集中在特定產業、街坊鄰居都是雲南人、又有著語言教育的資源，讓緬甸北部的雲南人在文化與認同上得以延續。

相對而言，住在較南部的廣東／福建緬甸華僑與其他東南亞社會中華僑的組成較為類似。福建與廣東位於中國南方，搭船出海遷移到東南亞的地理位置上非常方



便，因此在歷史不同時期，因著經濟因素為主，許多閩粵華僑透過搭船、海路的方式遷移到包含緬甸的許多東南亞國家內。祖籍閩粵的緬甸華僑，大多居住在曼德勒以南的城市，其中以居住在仰光的華僑為大宗。與緬北的雲南華僑有些不同，閩粵華僑在居住地的比例沒有那麼高，大多仍需要與當地緬甸人互動。在產業上，南部的閩粵華僑則大多從事米產、酒樓、餐館，因此從事的行業類別也有所不同。（黃士純，2010）

2. 對華人的經濟與文化壓迫

在緬甸排華以前，無論緬北或者緬南，華僑遷移到緬甸後大多可以透過許多方式維持信仰、語言、飲食等華人的文化。然而，在政策與社會上的不平等狀況一再發生、經濟上出現各種動盪之後，留在緬甸的華僑緬化的程度加速、加劇，也讓在緬甸的華僑產生了出走的念頭。本小節將描述緬甸排華的一連串事件，並在下一個小節說明排華後對當地華人社群帶來的影響。

自 1950 年代末，緬甸政府開始在經濟上訂定許多限制華人發展空間的規則。包含採取一連串國有化政策，以及專制的取消部分面額紙鈔的使用。緬甸政府在 1956 年，決定開始向緬甸國內的外僑徵收外僑稅，同時將公用企業、土地、不動產、天然資源的開採等事業逐步設限並收歸國營，當尼溫（Ne Win）將軍 1962 年執政後，華人的處境更是嚴峻。（翟振孝，2006）在緬甸，許多華僑都經營小生意，因為不信任軍政府與銀行，大多把現金存放於家中。因此當 1964 年緬甸政府下令停止五十元及百元大鈔的流通後，緬甸華僑損失嚴重。有經歷過當年事件的受訪者阿強回憶，在聽到消息宣布的那天，發現自己辛苦攢下的積蓄瞬間變成白紙，從小康之家瞬間淪為破產的處境，許多認識的人都因為無法接受現況而走上絕路。

除了在經濟上蒙受損失，由尼溫領導的緬甸軍政府，更透過操作排華事件轉移國內對軍人政權的不滿，使得華人在經濟和文化上受到雙重壓迫。1965 年，緬甸政府收回華文書報的出版執照，並禁止華文書報的發行。除了報禁，緬甸政府更下令關閉所有中文學校。同年 4 月，緬甸政府頒佈「私立學校國有化條例」，透過



將華僑教師解聘、接收全緬甸華語學校，進一步地限縮華僑語言與文化傳承的機會。

除了經濟與文化上的壓迫外，緬甸政府更透過否認其公民身份的方式，限縮緬甸華人的生存空間。1982 年，軍政府頒佈《緬甸公民法》，將居住在緬甸的人進行分類，「公民」、「客籍公民」、「歸化公民」、「外僑」四種身份分別有著不同的待遇，多數入籍的華人所持證件類別皆為「客籍公民」與「歸化公民」。公民身分的劃分進階影響的是對基本權利的回收，原居民與非原居民在考試、選舉、讀書、出入境等各個層面都有極大的差異，例如：客籍公民、歸化公民沒有被選舉權；只有父母及本人均為緬籍才能就讀醫科、工科；客籍公民與歸化公民不能出國留學、訪問……等等。緬甸華人在法律上，正式被視為「外族」，不但沒有完整公民身份，在生活中也會遇到各種平等的待遇，儼然是二等甚至三等公民。

3. 排華的影響

隨著緬甸政府頒布排華政策、社會排華事件頻傳，居住在緬甸南／北的華僑，在文化傳承與同化程度上，因為與緬甸首都、政府所在城市的遠近不同，開始出現了差異。從文獻與田野中，可以發現與緬甸首都比較近的仰光華僑大多都已緬化，緬南的緬甸華僑，在緬甸軍政府禁止開設中文學校後，大多去緬文學校上課，也因為在生活中需要時刻提防周遭緬甸人的排華，在語言使用、生活方式上都較為緬化。而緬北的雲南華僑，則因著國民黨軍隊帶來的資源尚得以延續華語教育，相對地保有較多的母語（雲南語）使用以及文化的傳承。

過去緬甸北部的緬甸華僑，皆可以接受全華語教育，生活中幾乎不會學到緬文，也較少有機會使用到緬語進行對話。在排華之後，因為華語學校被迫關閉，才使得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第一代開始去上緬文學校。小玉婆婆就指出：「那時候因為政府把中文學校收掉，我們只能去讀老緬書，有了老緬同學阿，老師，就開始會說他們那個老緬話。」小丹的媽媽也表示：「緬文是十歲以後才學的，如果在緬甸一聽就知道有華人口音。」。華語教育在排華政策下看似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但是緬甸北部的雲南華僑構思出一套因應緬甸軍政府政策的應對方法，在



緬甸教育法規定「20 人內之私立學校仍可存在」的漏洞下，透過開辦華文補習班的方式，試圖延續後代的華語能力。小丹媽媽就曾在回憶兒時經驗時表示，即便當時按照政府規定，上了緬文學校，同學們每天下課後都還得依照家長的要求，再去教中文的私塾補習，補到晚上才能回家。

相較之下，緬甸華僑集中的首都仰光，因為居住地區偏向大城市、軍政府更容易管轄到，華語教育不如緬甸北部、或中緬邊界發展的興盛。舉例而言，緬甸北部即有一百四十四所華文學校，不論質與量均超出緬甸南部許多（林若雩，2001）同時，1966 年緬甸政府禁止華文報刊出版，《緬甸華報》於 1998 年復刊後，該報訂戶 70% 集中緬甸北部，30% 則在以仰光為中心的緬甸南部（方雄普，2001）因為政策與社會上對華人的歧視劇烈，1970 至 1980 年代，緬甸南部的華僑幾乎不會替小孩取中國名字，甚至住在仰光的華僑都不敢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即使在家，一般也不敢說華語。在軍政府與社會中對華人的壓迫下，緬甸南部，尤其是仰光的華人，大多已不太會說中文。（范宏偉，2006；駱錫隆，2005）。

4. 優惠華僑政策、緬華與其他華僑的差異與特殊性

1949 年中國內戰後，由國民黨主導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分為二，相互拒絕承認對方的政權。而戰爭期間屢屢敗退進入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為了維持在國際上作為正統中國的正當性，透過建立優惠華僑的政策，頻頻向海外華人釋出政治召喚的訊號。中華民國政府為鼓勵海外華僑到台灣定居，在當時曾制定寬鬆規定，只需海外華僑出示僑居地同鄉會的證明文件，便能取得中華民國護照與身分證，享有各項公民權益與福利。雖然中國共產黨政府也曾採取各種措施吸引華僑歸國投資、設立農場安置歸國難僑，但後續為了對抗冷戰期間美國為防堵共產主義勢力，在亞洲各國散播「共產黨利用海外華人宣揚共產主義」的政治宣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得不轉而鼓勵華僑加入居住國國籍。（龔尤倩，2017）而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共產黨政府否定任何與生活在海外華人有關的事物，更使得華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感到心灰意冷，進一步促成許多華僑轉而支持國民黨政權，甚至選擇遷移到台灣展開新生活。（王賡武，2002）



全球冷戰時期的反共氛圍下，東南亞國家接連爆發反華、排華風潮，促使許多東南亞華僑，在中華民國政府採取拉攏海外華人的政策下，離開僑居地遷移至台灣、取得公民身份。當時東南亞僑民常與「反共」的政治宣傳劃上等號，被中華民國政府積極爭取成為國族的一員。然而，並非所有在冷戰、排華時期來到台灣的華僑，都與緬甸華僑的處境相似。緬甸華僑與其他東南亞華僑的差異，最主要與祖籍及聚居地有關。

1960 到 80 年代，冷戰期間的中華民國政府為延續作為國際上正統中國的地位，曾制定寬鬆規定，鼓勵華僑到台灣定居，許多東南亞華僑陸續在排華的壓力與政策推力下移入台灣。其中，印尼華僑大多祖籍為閩粵，講客語居多，在遷移至屏東縣長治鄉、桃園縣龍潭鄉等區域後，隨著時代的遷移，這些來自印尼的客僑們已融入當地。（利亮時； 賴郁如，2012）；越南華僑也以祖籍閩粵為主，遷移至台灣後，定居於台北過去的安康市場周遭。（王志弘； 沈孟穎，2009）

即便這些華僑曾經也有聚居的區域，但由於一來排華期間進入台灣的越南、印尼等國華僑，大多為閩粵籍，在選擇進入語言與文化較為近似的社區內後，容易融入當地。二來這些華僑能夠與台灣開放外籍移工後，納入的流動人口及外籍配偶，共同組成多元的社群樣貌（利亮時、賴郁如，2012；王志弘、沈孟穎，2009）同時，隨著安康市場的拆除，以及隨後社會住宅的興建，當地周遭的人口組成也逐漸產生變化。因此，緬甸華僑在進入台灣後，形成了在台灣少見的移民族裔空間，聚居的型態在新北緬甸街與桃園龍崙等地延續，時至今日仍然活絡，成為這個案例與其他東南亞華僑案例相比較為特殊的地方。在冷戰時期來到台灣的華僑，有類似群聚消費空間的還有韓國華僑，然而在近幾年已逐漸沒落。同時相較於東南亞國家，父母來自韓國的身份在台灣社會較不具污名。在階級上，簡珮韻（2003）更指出韓華為有一定資本之移民，使韓華們的經濟與網絡體系並非為了滿足自我族群所需的封閉系統，因此不會使韓華侷限於族群內部，而是有助韓華們逐步融入台灣的生活。這也與來到台灣後，大多從事體力勞動工作的緬甸華僑在社會位置上截然不同。

排華的制度與社會氛圍讓緬甸華僑在經濟與生活上都大受打擊，形成一股離開的推力，而中華民國的經濟與優惠華僑的政策，在另一方面成為拉力，在 1960 年代之後吸引了



許多人來到台灣。黃郁涵（2009）透過分析華僑第一代歸回台灣的法規、來台方式與國籍更動情形，將緬甸華僑遷移到台灣的時期分為三個類別，依序為：早期（1960年至今1988年）；中期（1989年至2000年）；近期（2001年迄今）。過去第一批來到台灣的緬甸華僑，在台灣與中國僑務工作相互競爭之下，除了能夠透過「依親」、「僑生」的管道來到台灣，許多人更得以憑靠政府專案方式，以「反共工作者」的身份入境台灣，而在此階段受到正統中國感召進入台灣的緬華，大多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從事教育、醫療等職業。在台灣解嚴、緬甸發生8888民主運動的接續發生之下，1988年起緬甸華僑不再以「接濟有志反共者」之專案形式來到台灣，依親成為中期緬華主要的遷移管道。而相較前一來台階段，黃郁涵觀察到此時期遷移到台灣的緬甸華僑，職業分布則多以基層勞動力工作為主，他們大多透過移民之間相互介紹，以一個帶一個的方式進入工廠、工地等場域，也有許多人選擇從事開計程車、餐飲業打工等自由度較高的行業。除了遷移管道與職業的差異，國籍取得也從早期的寬鬆走向嚴格。第一階段容許雙重國籍，且不需等待便可以就地取得國籍，中期依親來台者得花一至三年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僑生也得需入籍才能留在台灣。到了近期隨著移民法與國籍法的訂定，2001年後來到台灣的緬甸華僑已無法透過依親管道輕鬆取得國籍，正式成為制度上的他者，此階段到來的華僑大多為僑生，畢業後需得取得工作簽證才能留在台灣，待遇無異於一般外籍跨國移民。

5. 在台灣緬甸華僑第一代的認同

「像小時候我們在家裡面的話，雖然別人沒有問我們是哪裡人，可是可以經常從爸爸在跟我們說話的口氣當中，知道我們不會被允許說「我們是緬甸人」。因為對於爸爸媽媽他們那一代而言，緬甸人是緬族人，『老緬老緬』才是緬甸人，我們不是『老緬』，我們是中國人，不是老緬人，所以在家里面我就覺得我根本不可能去回答那個答案（你是哪裡人），告訴別人說我是緬甸人，所以我只能說我是雲南人或者是緬甸華人或者是緬甸華僑，但是不能說自己是台灣人，或者是不能說自己是緬甸人，因為對於爸媽他們而言無法接受。」（包姐）

（括弧為筆者加註）



包姐是一位在緬甸出生、台灣長大的緬華二代，她的父母皆是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成長過程中，她察覺到父母對中國人與雲南人身份有著極高的認同感，同時卻又會強烈地否認自己是緬甸人。無形之中，他能感知到華人與緬甸人身份間存在著鮮明的界線，例如必須是緬族人才有資格宣稱自己是一個緬甸人，因此自己並不能如此自稱。在成長過程中，包姐時常對自己是什麼人感到困惑。她不解的是，明明自己在緬甸出生、小學以前在緬甸的生活歷歷在目；在家中，他卻不被允許說自己是緬甸人。於此同時，他也不解明明家族已經遷移到臺灣幾十年，仍不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在田野中，與包姐家中長輩有著類似認同情形的案例不在少數。同為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第二代，阿勇表示：「（阿勇的父母）可以說他們是從緬甸來的，但是不會覺得自己是緬甸人，會覺得跟緬甸人還是有個不同這樣。」許多緬甸華僑第一代在生活中時常使用「老緬」、「嘎拉」等詞彙，將華裔自己人與緬甸人、印度人等其他膚色較深的種族進行區分、劃界。翟振孝（2006）的研究中觀察到部分受訪者認為與不同省份的人結婚很丟祖先與家族的面子，不同族裔的婚姻更是不被接受。在田野中能發現，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第一代受訪者普遍內婚，和其他種族的外婚並非典範。在被問到是否家中有非雲南人時，許多受訪者會強烈且果斷地做出表態。一次訪談中，我問到阿芒婆婆，親戚中有沒有人和緬甸非華人結婚，阿芒婆婆立刻駁斥「沒有，我家都是雲南人」對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而言，嫁娶非相同背景的對象，甚至會被指指點點議論紛紛。因此當不同種族結婚時，常會有私奔的情況。

大部分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第一代，在訪談中，皆一致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雲南人，其中更有許多人表示自己當初就是為了追尋正統的中華文化才選擇前移到台灣。在一次訪談中，我請作為緬甸華僑第一代的阿玉婆婆，稍微簡單介紹自己的遷移歷程與動機，她表示：「我父母是從大陸過來，騰衝，來到緬甸才生我的。我在緬甸的北部，密支那出生，密支那雲南人很多，到台灣之後也是住在緬甸華僑多的地方。當初會來台灣是想說，我們的下一代兒女的教育，如果在緬甸，小



孩子就都變緬甸人拉，不知道我們的中國話拉！所以才來台灣，吸收一些中文。」同為緬甸華僑第一代的肯叔叔也表示，還沒來台灣之前，他並不會為了讓孩子在緬甸能夠得到更好的教育、能考到更好的大學，而讓他們多學緬甸話。反而更希望孩子把中文講好，「記得自己是中國人，比考到好大學更重要。」

祖籍雲南的受訪者對祖籍雲南的認同深厚，即便許多第一代根本沒有到過雲南，仍然堅信自己就是雲南人。受訪者龍爸就說道：「雖然沒有去過雲南，但看到雲南當地的人來到緬甸，驚訝的就是，雖然不是在一起生活的人，但他們的語言啦、價值觀啦，都是完全有溝通的橋樑。」（龍爸，2019）這些強烈認同自己是雲南人的第一代移民，日常語言使用上確實多為雲南話，與同輩親朋好友聊天，大多都使用其最熟悉的母語。然而，由於過去曾在緬甸定居多年，第一代受訪者即便大多不認同自己是緬甸人，但對於故鄉飲食與環境的熟悉，仍或多或少讓他們對緬甸有著特殊的情感。因此，住在緬甸北部的緬甸華僑，除了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雲南人、華人，也時常以「緬甸華僑」的身份進行自我認同。

另一方面，祖籍為廣東／福建的緬甸華僑，在認同上呈現了和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非常不一樣的樣貌。父母都是緬南緬甸華僑的阿本，表示他的父母非常討厭中國政府，因此絕對不可能說自己是中國人。阿本在訪談之中也特別強調，他的家庭僅認為自己的祖先在中國，並不會因此覺得自己跟那裡有什麼特別的連接、更不會有太多情感上的認同。與包姐的爸媽不同，阿本的父母認為自己就是緬甸人，在緬甸發生政變時，他的父母時常看著緬甸新聞關心當地的情勢，甚至走上街頭聲援緬甸反軍政府的民兵。大部分居住在緬南的閩粵緬甸華僑第一代，都和阿本家庭有著類似的處境，能夠流利的使用緬語、認為自己是緬甸人，同時對於祖籍身份感到有些陌生。也因此，他們更常與外族、不同省籍的人通婚。雖然認為自己是緬甸人，這些緬甸華僑也可以接受自己被稱作「華僑」，對他們而言，認同的複數選項可以包含華僑以及祖籍身份，但與祖籍雲南受訪者不同的是，他們較不會否認自身的緬甸人認同。



二、緬甸華僑二代接觸的文化差異

從上一節可以知道，過去在僑居地的背景，使得遷移到台灣的緬甸華僑第一代，因著祖籍的差異，有著不同的樣貌。而第一代作為父母，他們的認同與在緬甸生活時的文化，延續在家庭生活的實踐中，構成了第二代對於其國族認同的基礎素材。了解祖籍不同的緬甸華僑二代，在家庭與生命經驗中實踐的具體文化內容為何，能夠更凸顯後續章節中某些認同操演的不尋常。

在田野中，我分別詢問了受訪者們，在他們成長過程中，是否有些經驗令他們得以感覺到自己與其他本地同儕的差異。在我分析了他們給我的訪談內容後，我整理出語言、飲食、宗教生活三個面向，為主要能讓他們感知自我與他者的界線。本小節將透過這三個面向，仔細描繪出緬甸華僑第二代內部的異質性。

1. 語言

大部分祖籍閩粵的緬甸華僑二代，緬語程度都比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二代流利。然而他們對於祖籍當地的語言，無論是福建話還是廣東話，則相對較為生疏；相反地，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大多都能流利地以雲南話進行各種對話，緬甸話則幾乎不會講。這與他們成長過程中，父母的安排、家庭語言使用有關。父母之間的對話、以及家長因著認同與種種因素，有意識的語言教養策略、大家庭中外公外婆與其對話，以及擁有可以溝通的社群，都影響了不同祖籍緬甸華僑第二代所擁有的語言文化。

（1）緬文流利、祖籍語言較為陌生的緬南華僑二代

阿本是祖籍福建的緬甸華僑第二代，在訪談中，他表示他可以流利的使用緬甸話溝通。如果把他丟回緬甸生活，他說一般日常的溝通都可以順利地應付。這讓我感到非常意外，因為阿本既不是在緬甸出生，也沒有在緬甸讀書、長時間生活過的經驗。我詢問阿本，如何在台灣成長卻能養成如此流利的緬語能力？他表示，雖然沒有受過正統的緬語教育，但在家中，他的父母彼此之間的對話都是使用緬語，和親戚聊天，也都是以緬文溝通。和母親為東南亞新住民的大部分新二代不



太一樣，阿本生長在父母雙方能以緬語溝通的環境中，因此在耳濡目染下，也容易受到影響。除此之外，阿本的父母也是有意識地在進行緬語的傳承、刻意地教育他緬語。「他會用緬甸話跟我講，如果有些我聽不懂的字，我就告訴他這是什麼意思，他就再解釋給我聽這樣。」阿本表示，在成長過程中，「我爸媽從小就一直教我講緬甸話，他們可能就不希望語言流失掉，所以他們是有意識在交流（緬甸話）。」阿本父母的語言使用，與教導小孩的語言策略，和認同息息相關。在田野中，我發現阿本的父母與許多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第一代相比，有著強烈的緬甸人認同，不會強調自身族群身份中華人、中國人的部分，甚至來台動機也與經濟因素較為相關。因此，緬甸華僑第一代的認同，會對他們教導小孩母語的策略產生影響。而第二代成長過程中所接觸的母語，進一步地成為他們辨認、選擇自我族群認同時的基礎。

阿本的案例在田野中並不特殊，大部分祖籍閩粵的緬甸華僑第二代受訪者，在第一代的語言傳承下，得以保有緬甸話的使用能力。田野中觀察到的閩粵緬華二代，緬文能力至少有基礎以上，除了像阿本的案例一般，父母有意識地安排緬語傳承策略，引導小孩學習，其他大部分祖籍閩粵的緬華父母，大多透過彼此在家中以緬文溝通，耳濡目染地影響小孩的緬語能力。舉例來說，同樣是祖籍閩粵的緬甸華僑第二代，小亞表示，因為父母在家都用緬語對話，有時也會和她講緬語，過去在她國小時期，和家人說話，曾經講十句話至少有五句以上都是緬甸話。另一位祖籍廣東的受訪者小金也表示，在家中講緬語的比例應該十句有九句都是緬語。和小亞、阿本、小金的家庭語言使用狀況類似，許多閩粵籍緬甸華僑在家中耳濡目染、父母有意識地傳承緬語使用。同時，和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第二代相比，祖籍閩粵的緬甸華僑第二代，也比較常返回緬甸。大部分的受訪者，過去會在暑假期間、過年期間返回緬甸居住、探親，平均每兩三年可能就會回去一次，每次回去大多都待一兩個月。甚至也有受訪者在當地停留更久，以至於緬文變得更好。其中一位受訪者栗子回憶，過去曾因為要逃避坐牢，跑回緬甸半年，有了這個生命經歷之後，讓他的緬語更加流利了。



雖然緬文流利，祖籍閩粵的緬甸華僑第二代對祖籍語言都較為陌生，無論福建話或廣東話，大多都沒有基本對話的能力。舉例來說，緬文能夠進行日常對話的阿本，卻不會講福建話。與阿本類似，珊瑚緬文程度也非常好，但家庭祖籍是廣東的她，對於粵語卻一竅不通。「我曾經跟我爺爺講說我想要學廣東話阿，然後來不及（過世了）。我爸爸雖然應該也是會講一點，可是他不會跟我講廣東話。」

（珊瑚）與珊瑚類似，小亞表示自己在大學期間遇到香港朋友，也很想和對方以粵語交流，但因為從小沒有粵語的學習環境，便只能嘗試以粵語說幾句簡單的字詞，無法深入對話下去。他表示，其實他的粵語程度只會幾句話，就連用聽的也不一定能夠完全理解，因為「我其實也沒有聽得很懂。」小亞說。排華以後的緬甸華僑，祖籍語言流失。因此除非家中有年紀比較大的第一代，比較有機會還能以祖籍語言溝通，大部分祖籍閩粵的緬甸華僑二代，大多都沒有使用祖籍語言的能力。

（2）母語為雲南語的緬北華僑二代

包姐是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第二代，在某次的訪談中，她的手機突然響起，連忙說了聲「不好意思，家人打來」後，包姐接起電話，雲南話流暢地湧出。待她掛上電話後我才得知，包姐平時除了和父母、長輩講話會使用雲南話，家中兄弟姐妹之間也都會以雲南話交談。然而，當我向她問及她的緬文能力時，她卻表示自己只能勉強吐出幾個簡單的單詞，更打趣地說道「搞不好你的緬文還講的比我好咧」。和大多數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二代有著類似的生命經驗，包姐的雲南語能力好，溝通無虞，但對緬文則非常陌生。事實上，緬甸華僑第二代不同祖籍之間的語言使用差異，從緬文名字上便能看出端倪。緬南的緬甸華僑幾乎都知道自己叫什麼名字，有的人甚至還能寫出來、和我說明名字的意義。相對來說，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二代，許多人的父母根本沒有替孩子取緬文名字，即便有，當我問到他們名字的含義時，也大多表示自己不清楚。

與祖籍閩粵緬甸華僑家庭的語言傳承策略不同，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第一代，不會有意識的教育第二代講緬文。相反地，他們大多希望雲南語能夠繼續傳承。第一代彼此之間最常使用的語言也是以雲南話為主，除了透過平時長輩們溝通耳濡



目染的形式影響晚輩的母語能力，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有著強烈的雲南語傳承動機，許多家庭都堅持要教小孩講雲南話。我在田野中就曾經目睹，在受訪者嘉嘉嘉中的飯桌上，當她的弟弟口沫橫飛地和家人們用緬甸話分享學校發生的事，以飛快的語速一面笑一面說時；嘉嘉的外婆從廚房端著湯走進飯桌間，立刻用雲南話嚴厲地糾正他，「講雲南話」，要她馬上改口。飯桌上嬉鬧戛然而止，大家拿起碗筷安靜地繼續吃完剩下的飯。從這個例子就可以清楚的看見，在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第一代家內，若有孩子講了緬甸話，即會被長輩認為是「忘本」的表現，進而遭到嚴厲的指責或懲罰（翟振孝，2006；于嘉明，2004）。

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內婚比例高，父母在家中使用的語言也能以雲南語為主，再加上大多對於傳承小孩雲南語有意識，讓即便是在台灣出生的第二代，仍得以浸泡在雲南語的語言環境裡成長。尤其是家裡有長輩、三代同堂的家庭，在母語傳承上更容易學會雲南語。年紀較高齡的雲南緬甸華僑第一代，因為成長過程中沒有接受過緬語教育，緬化程度較低，在認同上也有高度中國人認同。

訪談中，阿玉婆婆表示，他們家是三代同堂，家中所有小孩們、孫子孫女們「個個講雲南話都通。」原因是他有意識的下功夫，他表示，因為擔心他們平常在外面也不會講到雲南話，過去只要孩子們在家，都會刻意地教孫子孫女講雲南話。她表示，母語這種事情「跟爺爺奶奶一起住才學的到。」無獨有偶，另一位年長的受訪者佩佩婆婆在受訪過程中也特別強調，從他身旁大部分的例子看來，跟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住的小朋友確實都講得更好。與許多住在華新街周遭的緬甸華僑二代不同，力力的家族在桃園龍崙聚居，他表示，和同輩親戚日常中的聊天，大家會有默契以雲南話進行，就算在沒有大人的地方也一樣，使用雲南話並非故意被大人逼迫、強制的語言選擇，而是習以為常、自發性的使用。針對這個特別的語言使用現象，力力認為老人、長輩多是重要的因素。力力表示：「因為在龍崙很多雲南人會去住那邊，而且老人多，所以（第二代的）雲南話會比住緬甸街的好，甚至（第二代）彼此都會用緬甸話互相溝通。」



雖然大部分緬甸華僑二代接觸到的語言文化、第一代傳承母語的動力都跟情感、認同較為有關。特別的是，新南向政策也影響到部分緬甸華僑第一代，讓他們對「傳承什麼語言給孩子」的決定，出現其他的考量因素。龍龍一家是住在新竹的緬甸華僑家庭，父母皆是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龍爸是竹科管理階層的工程師，龍媽是竹北某間國中的老師。雖然在訪談中，龍媽表示「認同自己是緬甸華僑，民族上來說我們是雲南人」，被問到飲食與語言使用時，他也表示「現在在竹科附近住，語言上比較沒有辦法講到雲南話或緬甸話，吃的也都脫離雲南緬甸美食的環境，在緬甸住的地方大部分都是華人，以前在緬甸我們社群大多都是雲南話，緬甸話只有偶爾會說到。」看似對緬甸身份沒有太大的認同，無論過去在緬甸、現在在台灣都沒有太多緬甸話使用的環境。然而，在一次訪談中，她卻有別於其他第一代，和我透露她會考慮教小孩緬語，這讓我非常好奇，為何會有這樣的安排？

「雲南話跟緬甸話，現在覺得好像有教小孩的必要，也是因為新南向政策、現在整個國際的走向。因為台灣有這個政策，雲南話跟緬甸話這些原始僑居地的語言感覺似乎比較重要。但是我覺得……嗯……畢竟小孩生活的環境還是在台灣，好像還是不太能讓他們立即學習。目前就是希望他們學國語跟英文，未來有考慮教他們緬甸話，比較大的誘因可能是當地的貿易經濟發展。」（龍媽）

在本研究的田野中，龍媽龍爸屬於對新南向政策以及教育制度的掌握度較高的受訪者。新南向政策讓過去對緬甸沒有強烈身分認同、缺乏緬語傳承企圖的祖籍雲南緬甸華僑，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孩子學習緬語的意義。

2. 飲食

田野過程中，碰巧有一位藝術家，打算做一個有關在台灣緬甸華僑的飲食記憶的展覽。我受邀與其他緬甸華僑二代參加一個藝術工作坊，擔任創作者，分別創作出符合自己記憶中家鄉飲食與家鄉故事的藝術食物雕塑展品。該展覽的主題與緬



甸飲食記憶有關，為了協助創作發想以及作為食物雕塑的素材，活動前幾天，藝術家特別通知我們，請我們每人攜帶一道成長過程中最標誌性、最想介紹給台灣人的料理到現場。當天抵達現場後，一打開門便聞到撲鼻的香味，映入眼簾的即是忙進忙出的藝術家，將緬甸華僑二代們帶來的料理、菜餚裝進盤子內，色彩繽紛地擺滿了一整桌。

進入創作空間、桌上的料理都擺置完畢之後，藝術家請我們圍繞著桌子坐下，輪流介紹自己的背景以及帶來的菜餚與故事。當天參與活動的創作者，除了我以外，還有另外三位緬甸華僑第二代，分別是阿德、小日、包姐，以及一位剛嫁來台灣不久的緬甸新移民金姐。他們一一自我介紹後，我在腦中將緬二代們根據祖籍的不同，區分為祖籍雲南的我與包姐、祖籍閩粵的達哥與小日。除此之外，金姐的先生是福建緬甸華僑第一代，自己則是克倫族、非華人的新移民。在我的詢問之下，我發現祖籍確實也影響了緬甸華僑二代對於家鄉味、飲食記憶與認同。

在介紹菜餚的環節時，包姐迫不及待地與大家分享她帶來的一道「醃菜炒肉」。她表示，這道菜與她連結很深，是家中時常會煮的菜一道家常菜。雲南的醃菜，拌炒媽媽去市場採買挑選後、親自剁碎的肉。在用頭腦分析將這道菜歸納為緬北、雲南的典型料理以前，我的嗅覺從一開始便告訴了我，這就是熟悉的、家的味道。因為我的外婆也時常在家中煮這道料理，包姐帶來的菜與我有著共鳴。然而，坐在我們對面的阿德、小日與金姐，都表示對醃菜、醃菜炒肉感到陌生，沒有在家中吃到過的經驗。

輪到小日介紹她帶來的緬甸料理時，阿德則表示這就是他常吃的、日常的家常菜。帶的 ching mong yueh（洛神葉），小日與金姐都表示平常很常吃到，反倒是我和包姐，對這道料理比較陌生。金姐的先生是祖籍福建的緬甸華僑，他帶來了一到炒雞肉的料理。阿德表示那時候「一聞到就覺得我爸也會做，我爸會煮，然後他說是我爺爺教他的，然後是雞肉嗎？會用竹簍，他會用竹簍，整體吃起來聞起來就是那個味道。」



從其他受訪者的訪談資料中，我也發現緬甸華僑二代之間熟悉的飲食文化有所不同。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第二代和閩粵的緬甸華僑二代彼此間對於家中的飲食記憶、常吃的菜有著差異的經驗。祖籍雲南的小光，家就在緬甸街旁邊，走路三分鐘內便能品嚐到一碗熱騰騰的緬甸魚湯麵。然而，他卻向我表示，其實他認為認為緬甸街的烤餅、魚湯麵等食物，和自己沒什麼關聯。被問到熟悉的菜色時，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二代受訪者大多表示自己較為熟悉雲南菜，而緬甸菜相對而言比較陌生；相反地，祖籍是廣東、福建的緬甸華僑二代，幾乎都對緬甸菜非常熟悉，能夠立刻說出好幾樣緬甸餐點。舉例來說，當我問到阿德有哪些常吃的緬甸家常菜，他不假思索地迅速回答：「最常吃的緬甸炒飯就一定是豌豆炒飯。一定是只要炒飯不會做台灣的炒飯，然後假如要喝湯的話，也一定是緬甸的湯。幾乎最少每三天一定吃一次咖哩，緬甸緬甸紅紅的那一種咖哩，緬甸咖哩，幾乎每幾天都會吃一次」。此外，緬甸的甜點對祖籍閩粵的緬甸華僑第二代而言，是有感情、故事的回憶。

阿德：「印度冰（Paluda）完全就是我童年的回憶。小時候大家放學可能會沿路去買剉冰，然後還有現在已經復刻回來的思樂冰；可是我媽媽每天都在家裡做一杯印度冰等我。所以我覺得我完全就是用我的童年，完全充滿緬甸文化的童年，去支撐著我的現在。」

然而，當我追問「平常是否會吃廣東／福建菜時」時，閩粵籍的緬甸華僑二代大多會愣一下，花個幾分鐘思考有哪些家裡吃的東西來自廣東或福建。（珊瑚的案例）你對廣東有什麼印象嗎？你們現在只是廣東出來完全沒有，頂多就是港茶港式飲茶之類的，一個月可能是一兩次在緬甸街買之類的。可是對比較小氣，小時候可能姨媽會帶我去外面找她吃港茶之類的。

從受訪者和我自身的經驗可以發現，認同鑲嵌在人的「食性」當中，即便都是緬甸華僑，卻有著相異的飲食文化，並且銘刻在身體記憶中，一吃就能知道這是誰



的「家鄉菜」。同時，也因為如此，我們能從一個人的便當裡裝著什麼菜去區分出對方「是不是自己人」。

舉例來說，緬北的受訪者在家中的一餐，大多會煮幾道菜，緬南的受訪者在提到自己家的菜時，時常講出醬菜、一道菜為主的料理。「因為我很常會帶便當去公司或者是學校，他們會因為緬甸人的菜色的話，他們基本上可能不知道，這有可能是我們自己家，我覺得可能是只會煮一樣菜，然後再煮一個蔬菜，然後飯就沒了。大家都會覺得說很單調，對，然後可能是開始看看我朋友他們的話，他們便當裡面會有肉、豆腐、菜、蛋這樣就會有那種三四種，然後一點一點一點點，就是我們家可能會吃一大個主食，然後再配一個菜，然後就單調這樣。然後類似對他們就覺得說飲食會怪怪的」（珊瑚）因為緬甸菜的菜色、形式，與大多數台灣的便當菜差異較大，許多祖籍閩粵的受訪者回憶起校園中隱藏緬甸身份的時刻時，都會立刻想到與便當有關的記憶。栗子就曾在訪談中表示，因為過去便當中「有些菜是那種醬菜」，會怕同學看到後會有負面的反應，在學校中會小心翼翼，不想讓同學看見他的便當菜。

除了透過受訪者們的生命經驗，在緬甸街中行走，其實也能看出遷移的軌跡與端倪。一走進緬甸街，能發現整條街上充斥著許多賣著傳統緬甸菜——咖哩、魚湯麵、緬甸烤餅的店家。用眼睛掃視了店家的招牌，仔細觀看，能找到許多店名寫著「滇緬」、「雲緬」、「雲南」等字詞的店。從這幾個關鍵字，能判斷出這些店的老闆，多半是緬北遷移來的，賣的菜色就包含耙耙絲、米線、稀豆粉。許多寫著泰緬、滇緬料理，賣椒麻雞、大薄片等，也是雲南特殊的菜色。來自緬南的閩粵移民的遷移痕跡，也能在緬甸街周邊的小店中被找到。往緬甸街裡面走，進入緬甸街中段，能看見緬甸街中佇立著一間港式飲茶；走進巷子中，能發現販賣馬來糕的甜點舖。緬甸街小店的菜色，融合祖籍料理與緬甸當地的飲食，反映出緬甸華僑移民的文化軌跡。



3. 宗教

在台灣的緬甸華僑，根據祖籍的不同，在宗教上也有著差異。祖籍閩粵的緬甸華僑緬化程度較深，受到緬甸主流的小乘佛教信仰影響，許多家庭都有拜佛的習慣。除了會請緬甸的神到家中、在家中擺放佛桌、請和尚來家中念經，閩粵緬甸華僑家庭也較少有祭拜祖先的習俗；相反地，祖籍雲南的家庭緬化程度較低，大多仍保有祭拜祖先的習俗，並且維持道教的信仰。除此之外，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中，也有一部份的人是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並構成了現今台灣穆斯林社群中主要的族群人口。佛、道教信仰與穆斯林的緬甸華僑第二代，在成長過程中所接受到的文化與習俗不盡相同，因此緬華二代認同的基礎，在宗教的部分將有所差異。

許多文獻已指出祖籍雲南緬甸華僑與緬甸傳統信仰的差異。雲南人多拜天地君親師，緬甸人則是信仰小乘佛教為主。葉子香（2008）指出，來到緬甸的雲南人，將天地君親師信仰也帶到緬甸。大部分在緬甸的雲南家庭，都在祭拜天地君親師。在天地君親師排位的兩旁，也同時會祭拜自己家裡的祖先，以及財神、拜土地神、灶君。黃士純（2010）的文獻中，也提及到是否在家中「拜佛」成為辨認華人與緬人的標的。即便有些華人出外也是偶爾會拜佛，大多數在家中都不會擺置佛桌。在田野中，受訪者家中祭拜的方式，也多與文獻的觀察相符。





圖片一：祖籍雲南受訪者家中神明廳



圖片二：祖籍雲南受訪者家中神明廳





圖片三：祖籍閩粵受訪者家中佛桌

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二代，在宗教上，大多較不會感受到與台灣同儕之間的區別。然而祖籍閩粵的緬甸華僑二代，卻大多會主動談起因為宗教差異而感知到的族群界線。「道教的話他們會拿香拜拜，可是佛教是那種佛教的話，印度化的佛教的話基本上不會拿香，也不會拜一些神像。其實這種時候要我介紹那種道教跟佛教的時候，我還是就覺得很複雜，所以其實還是有差別的，在台灣其實基本上都混在一起的」（珊瑚）許多祖籍閩粵的男性受訪者，也表示自己曾經有過出家的經歷。當我表示非常意外時，一位受訪者栗子甚至以稀鬆平常的表情，困惑地的回覆我：「應該全部人都會這樣吧。」顯示出家、在緬甸當和尚的經驗，並非罕見的特殊案例。



圖片四：祖籍閩粵受訪者出家時的照片

除了佛道教受訪者間，會因為祖籍差異而有著不同的宗教實踐差異，也有為數不少的伊斯蘭教的緬甸華僑二代，因為其特殊的宗教信仰，使他們與其他緬華二代有著異質的文化經驗。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構成了台灣穆斯林最主要的族群人口。台灣最早的穆斯林隨著鄭成功而來，像是鹿港的郭家、雲林臺西的丁氏，



1949 後，國民黨帶來了中國回教，並在 1960 年代蓋了台北清真寺。但在多年文化交融之中，逐漸與當地社會彌合界線，許多外省回教徒的後代，並未延續信仰傳承，清真寺中的外省年輕世代逐漸流失。1980 年代後，緬甸出現排華風潮，亟思離開的華僑，在中華民國政府採取拉攏海外華人、優惠華僑政策下來到臺灣，順利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其中部分信仰伊斯蘭教的雲南籍緬甸華僑，逐漸形成臺灣穆斯林社群中的主要人口。

出生於穆斯林家庭中、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二代，自小生長在以雲南人／緬甸華僑為主的緊密社群中。因為童年時期每到週末都得去清真寺學習古蘭經，頻繁互動的穆斯林同儕大多也都是緬甸華僑第二代，讓他們即便長大之後，仍能夠保有綿密的同族群、同信仰的社會網絡。受訪者小光就表示：「小時候會去清真寺學念經，這個東西算是很有連結的事情，小時候都很在意同儕，因為這個宗教有的同儕可以更認識，大家聚在一起，因為宗教聚在一起那個感覺很好。甚至大家到了長大之後都還是會聯絡，這些連結都還在。」另一位受訪者力力也表示，桃園龍崙的穆斯林之中，這樣的記憶更加清晰、強烈。在成長過程中，他們大多使用雲南語溝通。對他們而言，他們成長過程中主要接觸的「同輩、年齡近似的緬甸華僑二代同儕」，便相當於宗教信仰也相同的這群穆斯林同儕。

在身份上，穆斯林身份也比起緬甸身份更為鮮明。在我尋問有關身份的掩蓋經驗中，受訪者們會直接連結、聯想到與宗教身份有關的經歷，而非與族群身份相關連的內容。

馬：「你以前在學校的時候有聽過，或者是你自己有沒有經歷過，因為緬甸的身份可能有些人會歧視或者是笑……取笑你的經驗。」

小丹：「男生打嘴炮可能會，但好像都是跟……因為我還有伊斯蘭教的身份可以攻擊、可以開玩笑這樣，緬甸就反而沒這麼多。」



馬：「你會覺得從小到大哪些經驗讓你覺得跟台灣人有一些差異嗎？」

小光：「宗教就完全不一樣，差異比較大，都在宗教反而不是緬甸華僑那些的，對。宗教比較會讓人感到好奇，台灣現在很多新住民，穆斯林都會聯想到東南亞人，會覺得你是不是那個……一些東南亞的人之類的。」

對同時具有穆斯林身份的緬甸華僑第二代而言，相對於族群身份，宗教身份更容易成為焦點。祖籍雲南的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緬甸文化的比例比較少，能相對容易地採用類似外省人、和其他台灣人差異不大的樣貌。而穆斯林身份則因為刻板印象、污名較深，甚至可能會被與印尼移工產生連結，更容易使緬甸華僑二代覺得比較敏感。

三、小結

透過觀察緬甸華僑二代生命經驗中的語言、飲食、宗教三個層面，我們可以發現集中居住在中永和、華新街周邊社區的緬甸華僑二代，實際上接觸到的文化內容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而這樣的差異，則是源自於不同祖籍的第一代，過去在僑居地期間的生活方式，延續至抵達台灣後，在教養二代的策略、日常生活中發揮影響。成長環境中接觸到的飲食、語言、宗教，形塑了緬甸華僑二代對自我認同的基本認識。因此祖籍雲南與祖籍閩粵的緬甸華僑二代，在成長過程中根據他們自己的生命經歷，有著不同對文化的認識與族群文化基礎。

祖籍雲南	祖籍閩粵（廣東／福建）
對雲南話、飲食較為熟悉	熟悉緬甸文、緬甸食物
認同更偏向外省人 可能延續上一輩的中國人認同	自我認同更像新二代 可能有較強烈的緬甸認同



與緬甸的連結、情感較稀薄	對祖籍較為陌生
--------------	---------

表三：不同祖籍緬華二代間的差異

假設緬華第一代過去在緬甸的生活背景，會直接地影響到緬甸華僑第二代接觸到的文化，進而成為左右緬華二代認同的關鍵因素。根據上一章對祖籍雲南／閩粵緬甸華僑二代兩者在成長過程中接觸到的文化差異的描寫，以家庭中祖籍的差異，應該會有兩種樣態。（如表格一）然而，緬甸華僑二代的認同實踐與操演，皆比起想像中的更為複雜、不固定。比起不同祖籍間家庭環境對緬甸華僑二代認同造成影響，進入高等教育的場域與否，更大程度地決定了緬甸華僑二代的認同展演策略。

祖籍不同的緬甸華僑二代，即便成長過程中接觸到不一樣的文化，也可能做出相似的族群認同展演。在田野中，本研究發現，比起自身在家庭中的文化實踐，緬甸華僑二代接受高等教育與否對族群認同以及認同操演的影響更為關鍵。未經過高等教育的受訪者，無論祖籍為何，身份操演策略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在取得高等教育後，許多人也指出了他們認同操演的方式有出現改變。彼此教育軌跡相似的緬華二代，不管原生家庭參入緬甸文化／祖籍文化的多寡，做出的認同展演存在著不約而同的默契。

即便祖籍不同，和自己高等教育取得狀態相似的緬華二代，經常會採取相似的族群身份展演策略。未經過高等教育的受訪者之間，對於身份中的緬甸、東南亞相關的部分，他們會傾向避談，並且有默契的在校園中相互掩蓋。針對身份中的華僑、祖籍的部分，則會在他們的聲稱中被強調、放大，佔據他們身份中主要的地位；相反的是，取得高等教育的緬甸華僑二代，則會展演新二代、東南亞二代的多元面貌，並針對身份中涉及中國的部分加以迴避，甚至發展出「替代性的認同」，來為其家庭背景中「華僑」的部分進行解套。本章節將針對緬甸華僑二代的認同策略進行描繪，並嘗試說明不同祖籍的緬甸華僑二代，如何因著相似的高等教育取得狀態，展演相似的族群認同。



第三章、未經過高等教育

一、認同展演

1. 掩蓋東南亞身份

在未經過高等教育的緬甸華僑二代受訪者之間，無論祖籍雲南或者祖籍閩粵，共享著一套沒有言說的身份展演默契。在訪談中，他們大多表示自己會盡量不要主動提及自己族群身份的話題，在許多需要自我介紹的場合中，也會避免講到自己的家庭背景。雖然部分受訪者在進行迴避的當下，可能是無意識、下意識地進行。但在校園、職場的情境中，為了避開隨著緬甸與東南亞身份而來的污名，許多未經過高等教育的緬甸華僑二代也會相當有意識地對身份中與之相關的部分使用管理、掩蓋的策略。甚至許多在未來取得高等教育的緬甸華僑第二代，能夠清楚回顧自身流動、接觸高等教育環境前後，身份操演上的差異與轉變。

出生在祖籍閩粵的家庭的小密，臉書上轉貼著一篇篇用緬文書寫的文章，瀏覽他的個人頁面，能深深察覺到他與緬甸身份的強烈連結。在訪談中，他無意間向我透露，自己非常關注一個名為 *myanmar skylines* 的粉絲專頁，時不時便會上去看看粉專發布的緬甸街景空拍圖，以多多了解緬甸當地的模樣。除了粉專，小密也向我表示他很愛看緬甸的新聞。令我十分好奇他究竟是從何時開始對這個感興趣？是否一直都願意擁抱自己的緬甸背景？在深談許久後，他才向我吐露，雖然自己現在看起來擁抱了緬甸文化，很喜歡談論有關緬甸的事情、議題，但自己在大學以前的求學階段，他曾經有過隱藏自身背景的經驗，甚至他認為是過去壓抑太久，讓他上了大學以後爆發性的關注有關緬甸的一切事物。

馬：「那時候是因為被欺負就被霸凌的關係嗎？」

小密：「對，就先隱藏，結果就是……我沒有想到的是，沒有……就是隱藏……壓抑一段時間之後，它後面爆開了。」



馬：「你對你壓抑的那段時間的印象是如何？」

小密：「就是盡量融入，那時候我好長一段時間是沒有吃緬甸的東西的。」

馬：「你說在學校不敢吃？」

小密：「在學校一定吃營養午餐，然後到補習班吃統一訂的便當。」

與小密的案例相互呼應的，還有小光的案例。雖然與祖籍閩粵的小密家庭背景不太一樣，小光是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二代，但兩人卻相似地有著掩蓋身份中緬甸、東南亞特質的經歷。因為小光媽媽來台灣的時間剛好遭逢政策轉變，小光在其他緬甸華僑二代之間罕見地被政府標註、認定為新二代。在學校收到與新住民相關活動、資料時，她表示自己都會想辦法將這些東西藏起來。「記得國小的時候，我那個年代對於新住民家庭已經有很多的輔導資源，雖然我的父母親都是華人，但是因為當初他們來台灣的方式，是爸爸先來台灣，後來保媽媽來，所以媽媽的身份對於當時來說，就是新住民媽媽。因此，學校就常常會有一些參加各種活動的回條、或是一些獎勵、補助的資源，我都會收到。記得以前都會覺得很怕被同學用異樣眼光看待，所以在收這些回條時，常常都是躲躲藏藏的，好像深怕被問問題，也很怕對於別人的刻板印象來說，我是一個需要很多資源幫助的家庭。」（小光）

許多受訪者在成長過程中，都有過和小密和小光類似的經歷。針對身份中關於緬甸的部分，會盡可能的迴避。在生活中幾個容易曝光的時刻，他們會更有意識的管理、掩蓋。除了學校發相關文宣的時刻，午餐時間也是許多緬甸華僑二代必須更加小心翼翼、謹慎的情境。在訪談中，我曾經尋問許多緬甸華僑二代「哪些時刻、場合，會讓你們特別察覺到自己和其他同學的差異」，不約而同地，許多人都回答了和飲食、便當有關的答案。許多緬甸華僑二代擁有「帶便當去學校蒸飯」的經歷，在午餐時間，打開便當盒看到與台灣菜迥然有別的料理時，時常會使他們曝露出差異的族群身份。栗子是閩粵籍的緬甸華僑二代，家裡飲食習慣上時常吃道地的緬甸料理，因此過去帶便當到學校時，他會特別警覺自己的便當不要被同學看到。「小時候可能吃飯的時候，有些菜是那種醬菜，就不想給他們看。」（栗子）當我向栗子追問到，為何會擔心同學看到便當菜時，他反射性地回答「就是不想聽他們說矮額。」



除此之外，像是家長會以及其他家長們能夠見面的場合，緬甸華僑第二代也會特別有意識的進行管理。因為平時在學校中，只要避而不談，大多能夠順利避免身份的曝光，但父母與老師見面、談話的過程，以及父母在校園中碰到相似背景同鄉時，對話的語言，都可能讓緬甸華僑二代的身份被辨識出來。因此許多緬甸華僑二代在類似的場合，會特別小心、甚至會囑咐自己的家長進行身份的管理。在田野中，不僅在家中時常使用緬語、緬化程度較高的祖籍閩粵緬華二代會特別注意，祖籍雲南的緬華二代中也有許多類似的案例。舉例來說，祖籍雲南的緬華二代家家就有類似的經歷：「小時候家裡人來送便當，我都很怕我媽跟其他同鄉聊天被同學聽到。主要是緬甸華僑，因為國小國中的學區很多同學媽媽也都是緬甸的。」

未經過高等教育的緬甸華僑二代，除了在校園內會有意識的管理身份，在找工作的時候更是會對身份中有關緬甸的部分特別警覺。多數人都不會主動透露自己的家庭背景，因為他們認為講了對於工作取得不會有太大的幫助，甚至會招致老闆、同事、客戶對自己的偏見。祖籍雲南的緬華二代包姐便是其中一個鮮明的案例，在幼稚園工作期間，因為擔心家長對於緬甸有偏見，若身份曝光，將會影響到她經營班級中親師關係，以及信任感的維繫。因此在工作期間、面試時，若沒有被問到，他都不會主動提起，甚至會有意識地加以掩蓋。

馬：「你以前在找工作的時候，會特別講到說你們家從緬甸來嗎？」

包姐：「不會。」

馬：「找工作的時候不會這樣，還是會故意不講。」

包姐：「我會故意不講，尤其是我在幼稚園，我之前很長一段時間我在幼稚園上班，在幼稚園上班的話，找工作的時候，如果說是那種面試的時候，因為我的資料就寫在上面，我身份證的證件他其實他就在上面，所以除非是主管問起，不然的話我不會特別講。我在幼稚園當老師的時候，因為經常會接觸家長，然後有時候家長可能會不想去聊天之後聊到我自己的背景，那個時候我就會特別的警覺，我絕對不會去跟我的幼稚園的家長講，我是從緬甸來的，因為我覺得以當時的我



認為建立親師關係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後我就覺得如果讓他們知道我是從緬甸來台灣的這樣的背景的話，我覺得我很難去建立信任感。」

2. 劇班

不少緬甸華僑居住在緬甸街附近，因此第二代的就學選擇，家長偏好讓他們就讀緬甸街附近社區內的幾間地方學校。S 國小、H 國中、C 國高中，都是當地許多緬甸華僑會讓小孩去讀的學校。在校園中，緬甸華僑二代並不罕見，班級內時常會有好幾位同學的家庭都是緬甸華僑背景。然而，不僅在與台灣同儕相處之間他們各自會進行掩蓋東南亞、迴避身份中緬甸特質的策略。彼此之間也會有意識的不公開談論相關話題，甚至會互相幫對方掩蓋、隱瞞。

「你不可以告訴別人他們家是緬甸華僑喔，全班只有我一個人知道，她說不可以跟其他人說。」（家家）在訪談中，受訪者家家向我透露，在她的班上，有一位外型時尚、打扮精緻，且在班上人緣極好的女同學，他的家人也是緬甸華僑。然而，在我繼續追問之前，家家突然抬起頭看著我，緊張的阻止我將這個資訊透露給其他人，並表示這是那位同學急欲掩蓋的秘密。緬甸華僑二代把自己的身份當成秘密，並請其他知情的圈內人協助保密，並不是少見的個人經驗，在訪談中，不少受訪者都表示自己與其他緬甸華僑二代同儕有過類似的經驗。在一次訪談中，達哥回憶起過去在學校內遇到的緬甸華僑二代同學，平常都不願意承認自己家庭背景與緬甸有關，唯有確保秘密能不被其他人發現、私底下聊天時，才敢偷偷跟他坦白自己的緬華二代身份。

然而，並非所有緬甸華僑二代都會進行劇班的打造，許多人就連遇到了家庭背景相似的同儕，都不願意吐露自己的身份。受訪者包姐是祖籍雲南的緬華二代，對他來說，過去和自己相同背景的朋友，卻從未和她提到自己的身份，讓他即便過了許多年仍然印象深刻。「我曾經有一個同學，曾經有一次我在大馬路上看到我媽媽在跟他媽媽聊天，然後我就覺得我媽媽跟他媽媽認識，他們兩個都講家鄉話，雲南話，對沒有，我當時我就覺得既然媽媽會講雲南話的話，代表你一定是從緬甸來的，為什麼我們在學校讀書那麼久，你從來都沒有跟我講過說你是從緬甸來的。」（包姐）



相同背景同儕之間的不願承認、急欲隱瞞的樣貌，讓緬甸華僑二代彼此之間覺察到這是一個沒有明言規定，但眾所皆知的規則。祖籍閩粵的受訪者珊瑚，表示自己雖然知道學校裡面很多同學的家庭也是緬甸華僑，但因為同儕們都選擇掩蓋，連帶地影響了她也不敢說出自己的身份背景。「H 國中裡面應該有很多緬甸華僑喔，我覺得只是他們都沒有表現出來是。大家都不想被歧視，然後不太敢講，我其實到了國中那一段時間都………非常害怕跟別人聊這件事情。」（珊瑚）無獨有偶，祖籍雲南的受訪者包姐，也有類似的觀察與經驗。包姐表示：「我覺得其實那個時候我不太確定其他人是不是這樣，但是我自己還有我的另外一個同學，我覺得我們大家在在學校，其實我之所以沒有看到有被歧視的這種，我覺得其實是因為大家每個人都在努力的隱藏自己，我們不會在學校講這些。盡量不會去談這些，盡量不要去談。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個人，但當時我的同學們是這樣。」

在未經過高等教育的受訪者中，27 歲的票子因為過去犯罪跑路的緣故，在成年後，擁有多次短暫返回緬甸居住過的經驗。因此他經常將幾年前在緬甸街生活的經驗，與緬甸居住後的感受進行比較。在訪談中，談論到緬甸街與緬甸華僑二代之間的凝聚力，以及對於彼此連結深淺的看法時。票子表示，或許第一代之間可能會有強烈的同鄉連結，但現在的第二代之間卻消失了，而對於這樣的現象，他認為是因為「大家都太窮了。」

票子從緬甸居住返台灣投案後，他回顧自己當時在緬甸的生活，感受到團結、彼此接納的滋味，讓他與在緬甸街成長的經驗相比，形成矛盾的對照。

「像緬甸那種原始的地方，或是像台灣的原住民部落那種比較原始的地方，他們能夠那麼團結，是因為他們出來一起在交流，一起在玩的，所以他們就可以一起有個團結感。像我去緬甸我的感受最深刻是他們門都沒有在關的，沒有在鎖的，大家可以互相進去。然後什麼里他們叫做 Yao Gue，然後他就會說什麼，這個 Yao Gue 全部都互相認識，大概都知道就跟部落一樣，它這個部落接很緊，很多小部落，他可能這邊的部落可能這邊的小男生跟那邊的女生有談戀愛，還是男的有欺負的女生，哪一天他可能進入這個部落可能會被教訓這樣子你知道嗎？」
(票子)



然而，當票子回顧生命經驗中，在緬甸街、周邊學校遇到相同背景的同儕時，他卻表示從小就沒有這樣的親切感。他認為在緬甸街的同儕之間，缺乏了「同部落」、「同民族」的凝聚力。因為大家認為掩蓋身份、表現出和學校其他同學相同的樣貌的機會得來不易，便會為了不讓生活受到影響，避免身份揭穿後帶來的窘況。「其實我可能感受到跟我國小國中很多認識同屆差不多歲數的那種緬甸人，就沒有辦法跟我有一種部落那種同民族一起很好的感覺，就是沒有辦法一直聚成一掛。然後可能有些年輕人，很多人就感覺他們的現在能夠正常的機會是得來不易的，不敢隨便透露，擾亂自己生活那種感覺。」（票子）

被問到這樣的現象為何存在時，除了票子直覺地回答因為大家太窮，更詳細的解釋了出社會後未經過高等教育的緬華二代，為了賺錢而不想透露自己的身份。在他的觀察中，除了擔心遭到明目張膽的歧視，會導致緬華二代想要掩蓋自身的背景，來自緬甸的身份遭到聚焦，也可能會影響到他們取得舒服的賺錢工作。

馬：「因為他太怕被歧視了嗎？」

票子：「我覺得歧視之外，是怕自己沒有……可以舒服的工作，賺錢的那種生活。因為可能大家……就是講得來不易嘛，就會有一個好不容易可以好好賺錢是得來不易的，我都沒有辦法過好自己，跟同儕都會有利益，但是利益感覺……想要好的感受上的這種利益。他可能就會不想要被聚焦，這一群就只有你一個人是緬甸人，就不想被聚焦啊。」

從田野中，能發現緬甸華僑二代會心照不宣地避免談到自身身份，並且幾乎都認為與相同背景的同儕沒有向心力、集體意識。這個現象並非大家皆「沒有意識的、剛好沒有談到身份認同」的狀況，大部分的受訪者都能意識到這種「刻意避免談論、掩蓋背景的身份管理策略」的淺規則。同時，也能察覺到彼此之間急欲掩蓋的動機。

3. 裝正常、堅持否認

大多時候，緬甸華僑二代若不主動提起，都能順利的將身份掩蓋的穩妥，然而總是會有些時刻令他們差點暴露自己的家庭背景。在面臨這種情況的時候，緬華二代們也各



自發展出一套應對的策略，來讓他們能夠度過身份被揭穿的危機。小亞的家庭是祖籍廣東的緬甸華僑，父母在遷移到台灣後才生下她，從小在台灣出生長大的她，生長環境與緬甸街十分密切。直到考上大學之前，小亞的求學軌跡都在緬甸街附近社區的範圍內。雖然學校附近就是緬甸街，並且學校裡面也有很多緬甸華僑二代，在班級和同學之間，像她這樣背景的人並不罕見。但是在訪談中，小亞卻意外地向我坦誠，過去在學校裡面，他並不會主動和朋友們分享自己的家庭背景，甚至當同學們或者老師發現，並向他詢問時，他表示：「就會很尷尬，然後會覺得要趕快避開這個話題。」對小亞來說，他除了掩蓋身份之外，在身份即將被揭穿時，他會採取避開、轉移話題的方式來假裝和其他同學沒有兩樣。

相同的迴避策略，也發生在祖籍雲南的包姐的故事當中：「有一次是因為小孩我因為帶小班，小孩就很容易過敏，然後我就跟他媽媽講說他見過蠻嚴重的，我就跟他媽媽小孩的媽媽講了一下他小孩在學校過敏的情況這樣，然後他媽媽就說對台灣的天氣因為實在太潮濕了，所以才會這樣，然後我就不小心說溜嘴，我就說對我沒來台灣之前，就我連過敏是什麼我都不知道，然後家長就說沒來台灣之前，所以你之前是住哪裡，對，然後我就會簡單開玩笑帶過這樣子。」在長時間的身份掩蓋、管理後，緬甸華僑二代在面臨身份暴露的當下，大多不會採取坦白、承認的策略。相反地，他們會想辦法在當下開玩笑、轉移話題，甚至編造一些有趣的事情，以便順利的通過危機。

祖籍閩粵的受訪者中，達哥的家庭屬於緬化程度非常深厚的案例。因此他在成長階段，較晚期才學會講華語。他向我吐露，過去在校園的時光裡，有過不願意承認自己身份背景的經歷，但有許多時刻仍然會因為講話的方式，而遭遇到旁人的詢問，導致身份可能曝光。在遇到疑問時，達哥表示自己仍然會堅持地說自己就是台灣人，若是真的沒有辦法說服對方，便會開开玩笑說自己中文沒學好，並想辦法帶過這個話題。

馬：「你那時候不承認，就是你提過你有過不承認的經驗。那個不承認的時候，你是跟人家怎麼說？」



達哥：「我就說我是台灣人，因為我是大概小學我才會說中文，對，然後很少數的人都說我有口音，對，然後他們就說我才不相信台灣人怎麼有口音，我就會笑笑說我中文沒學好這樣子。」

4. 避重就輕

面臨身份暴露危機時，除了矢口否認、轉移話題、開玩笑般地化解，許多緬華二代也發展出有異於「堅持不承認」的策略。當面臨必須誠實以告、需要說出自己身份的時刻，許多緬甸華僑二代會想盡辦法避重就輕地矇混過關（passing）到其他可能較為安全的身份選擇中。對於未經過高等教育的受訪者而言，也就是相對於「緬甸」二代，較沒有如此強烈污名的「華僑」二代身份。

祖籍雲南的家家，平時在家中會與家人以雲南話溝通，甚至長輩也時常叮嚀她，必須保有有雲南人認同、中國人認同。因此，過去當有人問他是哪裡人，他表示自己會選擇說自己「算是」是外省人。「以前如果人家問我家是哪裡來的，我就都說我們算是外省人。」即便心中知道自己和外省人有些不同，以及能夠感知的到自己選擇性省略身份中緬甸的部分，家家仍然揀選出自己身份中祖籍雲南的部分，並進行強調，甚至更進一步的認同自己是個外省人。與家家相似的，還有在工地上班的小皇。在訪談中，他表示自己不會和其他人透露自己的家庭背景與緬甸相關，當有人即將察覺，或者問他是哪裡人時，他會說自己是雲南人。甚至當對方延伸詢問他是否是「大陸的雲南人」時，他也會給予肯定的答案。

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二代，因為在家中確實密切接觸過雲南相關的文化。在身份認同上似乎較能理直氣壯，許多人甚至不會察覺自己的策略，並將其當成事實，真正的擁有外省人認同。在田野中，小光的故事便是其中一個案例。一次訪談中，話題聊著聊著被帶往與研究不相關的方向。突然間，小光拿出手機、打開相簿，興奮地和我分享過年期間第一次去男友家拜訪的照片與心得，她提到：「我本來就知道爺爺是外省人，因為我男朋友跟我講過，然後那時候就聊到說可能，爺爺就只是先問我說爸爸媽媽是幹嘛做什麼，他年紀多大什麼之類的，他問我爺爺奶奶還在嗎？我就說他們我很



小的時候他們過世，然後我說爺爺奶奶他們他們也是外省人，他們是雲南那邊的這樣子。」（小光）

雖然避開緬甸身份，小光聲稱自己為外省人的案例卻也並非完全策略性、為了討好男友的外省爺爺而採取的「有意識的偽裝」。當我在訪談中，私下、作為圈內人的情境中問起小光有關族群認同、認為自己是哪裡人相關的問題時，小光也誠懇、堅定地對我回答，他認為比起新二代，自己更像外省人。同時，他也認為自己是個台灣人。除此之外，他甚至會對「緬甸人」的身份加以否認。「我會說我是就台灣人，但是我爸爸媽媽他們是緬甸華僑，我會直接這樣說。然後他們可能就會好奇說緬甸華僑？所以是緬甸人？我就會說不是緬甸人，他們是華僑，我們祖籍是在雲南。」（小光）

接觸過雲南飲食、語言文化的緬甸華僑二代，相較於祖籍閩粵的受訪者，表現出強調「外省」、「祖籍」、「華僑」甚至「大陸人」的身份時，似乎較容易令人猜想得到。然而，從小接觸緬甸語言、飲食，甚至家中信仰都有別於台灣同儕的祖籍閩粵緬甸華僑二代，卻也有許多人會做出類似身份操演。

小密的家庭是祖籍閩粵的緬甸華僑，因為他不會說祖籍的語言，對於身份中與祖籍地相關的接觸是少之又少。原先在我的猜想中，我認為照理來說他應該不會有什麼中國認同。但讓我深感意外的是，他表示過去在掩蓋自己身份背景的過程中，竟也曾和同學說過自己是中國人。

馬：「所以如果人家問你說你是什麼人，如果你被問到你是哪裡人，你會怎麼回答？」

小密：「高中時候乾脆說自己是中國人。」

馬：「那你國中的時候也有這樣講過嗎？」

小密：「對。一般的華人，有。」



馬：「類似的對話情景，你還記得嗎？例如有沒有人、怎麼問你？」

小密：「印象國中的時候，有應該說是老師，問我說你覺得你是哪裡人？我就說是中國，一般的中國，但我不是有中國國籍的人。」

小密的案例並非個案，另一個令我感到意外的，是祖籍福建的緬甸華僑二代阿全的例子。阿全從小就很注重打扮，是班上許多人認為很酷的男生。無論在社交媒體上，或者私下聊天，他從不輕易提起有關緬甸身份的任何蛛絲馬跡。除非成為非常熟悉他的朋友，否則應該很難有人知道他的緬甸背景。阿全的家一走下坡，幾步路便能抵達緬甸街，從小的教育歷程都在聚居地周邊的環境，目前工作的手搖飲料店，也在緬甸街附近，甚至有親人還住在緬甸。然而，阿全卻完全不認為自己是緬甸華僑二代，甚至認為自己比較像是外省人。「我應該不算是緬甸華僑二代吧，我是嗎？」「家人還在緬甸，不過媽媽只是在那邊住過的中國人吧，不會說是緬甸人，比較像是外省人之類的。」（阿全）

祖籍閩粵的受訪者，雖然相對於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二代，對於祖籍文化的接觸較少。在未經過高等教育者身處的互動情境中，卻有許多受訪者表示自己會說自己外省人。祖籍廣東的小亞，雖然小時候大部分時間都在和家人講緬甸話，廣東話能力相較之下十分薄弱。但她在和同學交流時，仍然會提到自己的廣東身分，對於緬甸的背景，則是會傾向掩蓋、避而不談。

馬：「以前你有說過自己是外省人，或你是……」

小亞：「我有講過！」

馬：「是在什麼樣的情況？」

小亞：「之前可能學語言的時候，或想要跟朋友有文化交流的時候。就會講自己會哪些語言，然後其實自己的祖籍是哪個地方的人。」

馬：「你說你是跟哪裡的同學交流？」



小亞：「香港。香港朋友交流，可能會就是說，我是外省人我祖籍是廣東。」

將身分中與緬甸有關的部分進行掩蓋、並且強調祖籍、華僑等方面特質的作法，在許多緬甸華僑從事工地行業的場域中更是常見。一位員工都是緬甸華僑的工程行老闆向我透露，在工地中，很多人會因為被稱呼為「緬甸人」而大打出手。在一次訪談中，我詢問亦從事工地工程工作的受訪者阿宏，是否有遇過類似的情況。他向我透露，他也是會迴避緬甸人身分的那種人。「我會跟他們（工地的人）說我不是純緬甸人，我是緬甸「華」僑！是華人！」（阿宏）（括弧為筆者所加註）

從田野中可以發現，祖籍差異與透過家庭接觸到的文化差異，並沒有成為左右緬華二代操演族群身分的主要因素。在未經過高等教育的緬甸華僑二代之間，即便是與中國／祖籍／華僑身分，較少接觸與連結的受訪者，也會採取掩蓋緬甸、彰顯華僑等特質的身分展演策略。

二、東南亞、移工、階級污名

1. 「未取得高等教育」受訪者周遭人群，對不同族群形象的想像

在訪談中，有幾個問題的設計圍繞著緬甸華僑二代「自身對緬甸／中國／新二代／外省人的印象」，與緬甸華僑二代主觀認為自己「周遭的人們與他們所接觸到的大眾，對於這幾種身份的看法」。巧合的是，未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中，不論是祖籍雲南或者祖籍閩粵的受訪者，大多認為自己遇到的人們，普遍對緬甸與東南亞有著較負面的印象。相對而言，中國、華僑、祖籍、外省等詞彙，則被他們認定為較為中性安全的族群身份選項。人生後續階段有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在回顧「上大學以前」的環境對不同族群的偏好／偏見時，也不約而同地給出與「未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相似的回覆。

小亞是祖籍閩粵的緬甸華僑二代，在大學期間，她常以「新二代」身份取得許多資源與補助的機會，也主動參與許多緬華二代的聚會。然而，當他回顧起自己大學前的族群認同展演時，卻向我表示自己過去大多時間都採取掩蓋的策略。在我追問造成差異



的理由時，小亞不假思索的回答我：「大家聽到家中背景來自東南亞的人，反應不會太好。」小亞認為，上大學以前的環境中，對新二代或者東南亞的看法，並不是那麼正面。相對於家庭成員中父母來自歐美國家的新二代，東南亞二代更可能會遭遇歧視。「東南亞新二代，他通常比較會被歧視比較容易一點。有一些他可能會有一些人其實對東南亞會覺得很和善，你就頂多到很和善，不會覺得他們聽到你是東南亞就說你好好。但聽通常聽到歐美的新二代，如果他說我爸爸是美國人，人家就說好像他爸爸很棒的那種感覺，然後東南亞頂多聽到很酷，甚至是有點歧視的感覺。」（小亞）小亞的觀察並非特例，在田野中，許多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在回顧上大學前遇到的人們對「東南亞」、「緬甸」的印象時，也會提到許多負面的歧視語彙。對取得高等教育的緬華二代而言，周遭人們對緬甸與東南亞身份的看法，在進入高等教育的階段後有了清晰的轉變——從有污名的身份，轉變為多元的象徵／可被運用的文化資本。因此擁有上大學經驗的緬華二代，在回顧過去對比現今的過程中，大多能敏銳的覺察到兩個環境中的人們，對不同族群身份的偏見與偏好。

除了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能透過環境的轉換，覺察到上大學前周遭人群對東南亞／緬甸身份的負面刻板印象。未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也能意識到當自己展露出身份中與緬甸相關的部分時，並不會收穫正向、有利的回應。在工地擔任建築工人的受訪者們眼中，緬甸身份蘊含的負面刻板印象是周遭人們未言明的集體共識。因此，將緬甸與東南亞視為負面語彙的預設，更進一步地形塑了工地中緬甸華僑二代們互動的淺規則。在田野中，我接觸到一位工程行老闆阿奇，他的員工組成皆為緬甸華僑與緬甸華僑的第二代。在一次非正式的聊天的過程中，工程行老闆得知我要做與緬甸華僑二代認同的研究。一聽到我請託他替我引薦受訪者，他連忙向我提醒，工地有些人會因為被稱為「緬甸人」而大打出手，訪問過程中務必注意自己的措辭，以免在疏忽注意的情況下冒犯了對方。

對未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而言，東南亞身份、緬甸華僑二代身份涉及「緬甸」的部分，並非中性的字眼，而是蘊含貶義、有著污名的詞彙。這樣的觀點並不罕見，除了在工地上班的受訪者們能夠覺察到自身周邊人群的負面態度。其他素昧平生、生活圈



不同的緬華二代，也都能夠感受到各自生活環境中，人們對於緬甸與東南亞身份的不利聯想。因此，東南亞與緬甸的身份、多元特別的家庭遷移背景，並非未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們會廣泛運用的文化資本。

由於提到緬甸身份較為不利、可能招來他人的側目，除了選擇隻字不提自身家庭背景，對未取得高等教育的緬甸華僑二代而言，將族群身份中的焦點，轉移到「華僑」、「祖籍」、「中國」的策略，更成為了一種認同操演的選項。相較於東南亞與緬甸，中國身份在未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眼中，並沒有受到同等待遇的污名。阿皇是一位做工的年輕緬華二代，父母從緬甸來台後開了一家販賣滇緬料理的泰式餐廳。祖籍雲南的他，與父母皆從未到過雲南，僅在緬甸與台灣兩地居住過。然而，在台灣出生長大的他，在訪談時卻向我表示自己沒有緬甸認同、認為自己不但不是緬甸人，也與緬甸毫無關聯。更令我感到震驚的是，他用理所當然的語氣告訴我，他會和別人說自己是「大陸人」。阿皇性格直率，當我問他有關身邊的人對於緬甸人、中國人／華僑的看法時，他自然地的回答道：「緬甸他們就會覺得落後阿。中國的話就沒什麼負面的印象。」話語之中沒有一絲躊躇。比起沾黏在緬甸與東南亞身份上的負面印象，從時常接觸到的人們的態度中，阿皇發現中國人是相對中庸、不帶有污名的身份。

未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們普遍能夠觀察到，中國、「大陸人」不但比起東南亞與緬甸更沒有污名、較不會成為歧視的原因，許多時候更與有著經濟上較為富裕的印象。與阿皇的回答相互呼應，另一位在手搖飲料店上班的受訪者阿之，被問到相同問題時，也對我說出了相近的答案。

馬：「你覺得你對中國人的印象是什麼？」

阿之：「沒有什麼特別的。」

馬：「沒有什麼特別的？」

阿之：「對，假如真的要講的話，可能是既定的印象，就是財大氣粗。」



與「財大氣粗」相似的中國印象，也充斥在小光的世界中。五專畢業後便從事護理工作的小光，談到身邊的人對中國人或大陸人的印象時，向我表示：「我身邊的人對中國人大陸人，他們會覺得他們比較強勢，但是他們會覺得他們的一些社經地位是比較好，畢竟現在大陸也是發展的還蠻好的這樣；然後如果他們對於緬甸人的話，我覺得他們會有一個刻板印象，就會覺得緬甸人比較低階，然後沒什麼教育知識什麼都沒有很好，然後社經地位也沒有很好。」（小光）

在阿皇、阿之與小光三人身處的環境中，中國有著經濟上較強盛的印象。問到較有貶義的中國人想像，硬著頭皮聯想，也只擠出強勢和霸氣這類的語彙。由於中國與台灣在政治上的緊張，台灣社會中對中國人的印象，可能受到侵略威脅的影響，進而將其聯想為較為強勢、兇悍的形象。除此之外，中國經濟發達、有錢人多的刻板印象，則可能是兩個社會交流下的產物。1990 年代以後，台灣逐漸開放中國遊客來台，正好碰上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歷史時刻，有能力前往台灣旅遊的「暴發戶」成為了台灣社會在實際接觸到中國人後，初步且深刻的印象。

即便兇、強勢、霸氣並非主流社會中稱頌的美德，但相較於可能使緬華二代被貼上經濟弱勢的東南亞、緬甸身份，中國人「財大氣粗」的形象，可能是相對具有優勢的族群身份展演選項。因此，在未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中，幾乎沒有人會主動提及自己是「新二代」，甚至許多受訪者連「新二代」的定義都不清楚。幾次訪談中，我陸續發現每當題目或敘述中出現「新二代」相關語彙，受訪者們會愣一下。原先我不以為然，僅把這樣的肢體語言，解讀為受訪者針對問題進行思考的正常反應。直到某次與小光進行補訪時，他面露不好意思的表情，詢問我「新二代」到底是什麼意思、「哪些人是新二代」時，我才意識到這個語彙對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們而言，可能是不熟悉且罕見的用詞。因此，在後續的補訪中，我重複確認受訪者們對各種族群身份定義的理解，進而確認了未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們，認同操演中「新二代」詞彙的缺席，也可能源於他們本身對於這個說法的陌生。在未取得高等教育緬華二代生活的多數情境中，新二代、東南亞、多元文化並不能轉換成可運用的資本。甚至更多時候會成為引起歧視、搗亂生活的原因。相反地，中國、外省人、大陸人、祖籍等等的用



詞，對未取得高等教育受訪者生活中容易接觸到的人群而言，常有著經濟上富裕、強盛的形象，搬運挪用的後果，被預期順利的提供對話情境中理想的答覆。

2. 經驗形塑的族群形象認知

然而，緬甸華僑二代是如何覺察到「身處環境中容易接觸到的人群，對不同族群／國族身份的態度」的呢？沒有告示排與說明指南，未取得高等教育的緬甸華僑二代，並非一出生就能夠立刻掌握不同身份在社會空間中的主流刻板印象。事實上，對周遭人們眼中刻板印象的想像，是透過社會化過程中實際的經驗、在互動中逐漸清晰的。無論是自己的遭遇，或者目睹與自己相似背景的人遭逢類似的待遇，皆幫助緬華二代建構了他們對社會空間中「標準答案」、更好的認同選項的想像。

深入探尋「未取得高等教育緬華二代」的生命經驗，可以發現他們認為周遭人們對東南亞有著負面印象。這樣的觀點並非空穴來風，許多緬甸華僑二代都有實際經歷、目睹針對緬甸身份而來的偏見。而這些歧視經驗，多半都與經濟狀況、階級息息相關。舉例來說，票子曾經因為他使用的東西有些破舊而被取笑。貶低物品之餘，來自緬甸的家庭背景也被一齊強調、連結。

馬：你覺得在這邊成長的經驗，會覺得這邊的附近的人、你的同學，或是長大以後你身邊的人，他們是怎麼看待緬甸人這個東西？

票子：就跟開原住民玩笑一樣，不會理解，但就可以拿來取笑一下。

馬：你有聽過什麼比較受傷的嗎？

票子：可能看到什麼破舊的東西……比如看到我的手機破破的，就會說「你這緬甸手機」之類的。

歷經、目睹遭歧視的經驗後，未取得高等教育的緬華二代，得以覺察到周遭人們眼中，有著對緬甸、東南亞身份的支配性刻板印象。「緬甸／東南亞」的詞彙，與「經濟弱勢」有著強烈的連結。因此許多時候，僅僅被說到「你是緬甸人」，聽在緬甸華僑二代的耳裡，便有著污辱的作用。一次訪談中，我與票子分享某些緬甸華僑二代，只因為被稱呼為緬甸人就大發雷霆。我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預期得到同樣訝異回應。然而，票子並不意外，他露出能夠理解的表情，覺得生氣的反應再自然不過。



「我覺得其實他們生氣也情有可原，他們帶著語氣都是用一個嘲諷的會嘲笑的，所以就是在這個歧視的氛圍下，對他這樣被講，他覺得他就會覺得如果是緬甸的會不會之後就不好過幹嘛的，所以我覺得打架也情有可原。現在這個環境他們會把你是緬甸的這個東西當成一個痛點在。」（栗子）

歧視除了發生在同儕之間，在田野中，我也意外地發現為數不少的受訪者，都有因為自身家庭背景，而被老師差別待遇的經驗。在緬甸街周邊的學區中，緬甸華僑背景的家長、學生並不罕見。相較於緬甸街社區與學區以外的學校，學生與老師們對緬甸、新二代大多較為陌生，在離聚居區較近的學校中，因為接觸到緬甸華僑父母與學生的頻率更高，污名同時也更加劇烈。特別是祖籍閩粵的受訪者，遇到差別待遇的比例更高。一次訪談中，珊瑚回憶起國小時期，因為和同學吵架時提過要找學長來報仇，沒想到東窗事發後，老師卻不僅僅針對他的行為進行訓斥，更刻意地提及她的緬甸背景、對她進行羞辱。

「我心裡想說，我也只是說說而已，我沒有真的要找人來打他啊。然後結果我放學的時候被老師留下來，然後老師就跟我說，你想想你自己的背景，人家都沒有歧視你了，你還在那邊。他也在強調我的背景，然後那時候想想，當時應該回說「你在歧視我」，只是這才是就事論事吧，我只是欺負別人而已，你要為什麼講我的身份？」（珊瑚）

同樣也是祖籍廣東的緬甸華僑二代，阿本也曾在校園中多次被老師羞辱。回憶起國高中時期的班導師，僅因為他晚到教室，就當著全班面前數落他：「不要把你的東南亞劣根性帶來學校。」擁有緬甸背景的他，僅因為遲到就被老師以東南亞人懶散、不守時的刻板印象，在全班面前歧視他。除了以遲到作為理由當眾羞辱，阿本沒有犯錯的時候，老師也曾私下找他，使他難堪。阿本回憶，在學校另一位同為緬甸背景的學長考上醫科後，阿本被老師找了過去，叮囑「你要跟他一樣，才能翻身啊。」說起這段故事，阿本皺起眉頭，語氣慍怒。他向我表示，他當時不但不解自己為何需要翻身，



更從不覺得自己過的差勁。未取得高等教育的緬華二代在與人互動時，經常能發現身份中的緬甸特質伴隨著許多污名的標籤。而緬甸街／聚居地附近學校中的老師與同學，因為更加頻繁地接觸到以勞工階級第一代為主的家長、居民，有著更嚴峻的歧視問題。

除了自己親身經歷歧視，會使「未取得高等教育的緬華二代」感受到緬甸／東南亞身份的負面刻板印象。當其他有著相似家庭背景的緬華二代，在學校因為族群身份而遭遇負面待遇時，看在其他緬甸華僑二代眼裏也會形成警惕，進而影響他們選擇掩蓋、迴避東南亞身份。祖籍雲南的受訪者小光，雖然沒有親身經歷被老師歧視的經驗，但曾經目睹過其他同學被歧視，也讓他覺察到周遭人們對東南亞身份的偏見，進而調整自己的認同操演。「國中的時候有同學對，他可能家裡爸爸媽媽……反正就是緬甸人，然後他們可能來家長會，他們可能人穿著很土，然後可能很髒的之類，然後可能講話也不太會跟老師講話那種的，有些老師就會覺得會有點不太好溝通什麼之類的，然後加上可能學生他本身成績就很差什麼的，愛玩那種，老師就會特別有點針對他。」（小光）即便祖籍雲南的小光，在家中說的是雲南語，平常便當的菜色也不是傳統的緬甸菜餚。在她目睹周遭同學對與她有著相似家庭背景的緬華二代進行歧視之後，她也會使盡全力地讓身份中本就不那麼顯眼的東南亞／緬甸特徵，更加隱形、透明。

無獨有偶，祖籍廣東的小亞，在進入高等教育的社會空間之前，也與祖籍雲南的小光一樣會努力掩蓋族群身份中東南亞、緬甸的一面。某次訪談中，小亞向我透露，家人過去曾經在職場上因著緬甸身份而遭遇歧視。

「我姐姐在公司就有講到她是緬甸華僑的二代，然後有人好像就會覺得……他的生活或思想可能就會比較低階的那種，就會有點歧視他。」（小亞）

小光與小亞兩人在未取得高等教育的階段，採取的族群認同展演策略十分相似，皆掩蓋了身份中涉及緬甸與東南亞的部分。對照兩人生命中皆目睹周遭相同背景緬華二代



遭歧視的經驗，可以發現就算不自己直接面對歧視，緬甸華僑二代還是能覺察到身處環境中對東南亞主要的刻板印象。因此，對未取得高等教育的緬華二代而言，比起較為危殆的東南亞與緬甸身份，「華僑」一詞容易讓人聯想到的中國人、華人語彙，是相對較不具污名的安全認同選項。

3. 東南亞身份的移工與階級聯想

在田野中，無論是未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亦或是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們描述自身在上大學前的階段中，周遭人群對「東南亞」或「緬甸」身份的態度，大多都會講出較為負面的回應。從緬華二代們自述遭受歧視、目睹歧視的田野資料中，可以發現許多周遭人們投以的負面的觀點，都與階級、經濟弱勢息息相關。訪談逐字稿中，能發現受訪者們的歧視經驗會與「緬甸」、「東南亞」、「外勞」等字眼產生關聯。然而，東南亞身份與階級弱勢或者移工的聯想與污名，並非長久以來固有的現象，而是鑲嵌在台灣近代政策變遷下，開放東南亞移工來台工作後在社會中逐漸衍生的產物。

緬華二代們能夠覺察到周遭人們對緬甸／東南亞抱持較為負面的觀感，也或多或少經歷／目睹過針對自身緬甸背景而來的歧視。在所有負面回應的經歷中，除了上述小節中提及較為隱晦、拐彎抹角的歧視，也有許多案例會刻意與移工、外勞等詞進行連結。在這些經歷中，祖籍閩粵，擁有緬化程度較深刻家庭背景的緬華二代似乎更多這種經驗。在某次訪談中，我與受訪者小密聊到過去曾經受到歧視的經歷。雖然大學以前，他表示自己會有意識的掩蓋自己的家庭背景，但也有不少時候，同學們會發現小密的族群身份和台灣同學們有所差異。回想起許多次遭到同儕們取笑、歧視的經歷，小密忿忿地皺起眉頭，吞吞吐吐地向我分享了他最難忘、尷尬的記憶：「我甚至還被……我之前喜歡的女生，和別人說自己被外勞喜歡。」

小密並非受訪者中的特例，回顧遭受歧視的經驗，直接提到「外勞」一詞的，還有達哥。達哥向我表示，他的母親膚色較深，容易被辨識出是外國人，過去曾經有同學看見媽媽的照片而將她媽媽稱為外勞，而這個經歷也使得他往後更排斥承認自己的緬甸背景。「因為我跟大家可能比較不一樣，然後就被霸凌，我覺得最主要是有一次，那時候還是那種折疊手機，可是我很愛家人，所以我手機桌布就偶爾會用我媽或我爸。



然後我用我媽的照片的時候，曾經有一個同學拿起來，然後大笑給全班看，說『欸！他媽是外勞欸』，因為他長得很黑，然後從那一次開始，我就覺得我再也不要承認了。」（達哥）事實上，除了來自校園中同儕的歧視，達哥的母親從小也教導他要掩蓋族群身份中緬甸的部分，回想媽媽會做出這樣的判斷，達哥表示：「她是覺得假如你成人了，未來出社會，你工作的時候拿到的錢是移工的錢，你沒辦法跟台灣人比。」（達哥）顯示出對東南亞的歧視與對移工與階級的聯想，也影響到緬甸華僑。

雖然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二代，在家庭中接受到的飲食、語言等文化緬化程度較低，照理來說能夠更容易、更順理成章的掩蓋好緬甸背景。然而，因著緬甸、東南亞身份被歧視、與移工、經濟或階級弱勢連結，不僅是家庭緬化程度較深的閩粵籍緬甸華僑二代會面臨到的問題。祖籍雲南的受訪者之中，許多人也有類似的生命經驗。在某次訪談中，阿勇回憶起過去曾經被同學偷拍，並打上「阿勞」的文字進行霸凌的經驗。他指出：「以前有一個同學，然後就是，我跟他沒有很熟，然後有一次在他的限時動態裡面，看到就他拍拍教室，因為我剛好坐在最前面，然後他就說什麼阿勞什麼什麼的這樣子」同樣也是祖籍雲南背景的阿若，在成長過程中，也有因為家庭來自緬甸而遭同學當作把柄。「我印象中好像曾經有人覺得這是抓到我的把柄之類的，我沒有把他視為威脅，只是他可能覺得抓到我的把柄，然後他可以因為那樣子對我怎麼樣。然後他說「我發現你們家是緬甸的」。他可能是想說我找到了一個秘密中的秘密，或者是你知道因為它是比較隱藏負面意義的秘密這樣子。」（阿若）

雖然上述許多受訪者在談論自己遭到歧視的經驗時，都會提到「外勞」與移工，和經濟弱勢較有關的詞彙，但這個現象似乎在年紀較長的受訪者的經驗上有些不同。包姐是我的受訪者中年紀最長的緬甸華僑二代，在她讀書的過程中，雖然他們會掩蓋、不讓同儕覺得自己和其他同學不一樣。包姐「但在成長階段只有覺得陌生，好奇。」談到他們是緬甸華僑，不會與經濟弱勢有所連結。講到緬甸，只會說「沒電」等，不太會遇到與「外勞」等字眼連結的狀況。



包姐的經驗與其他受訪者的差別，或許與移工在台灣的近代史有關。台灣開放外籍移工的時間為 1989，在 1992 年立法院通過就業服務法，開放民間產業也能聘雇海外移工後，以東南亞籍為主的外籍工作者才逐漸來到台灣。大多受訪者們成長的過程與受教育的時期，座落在外籍移工已蔚為普遍的 2000 年後，包姐的成長過程或許同儕間對「外勞」「移工」等字眼仍相對陌生。從未取得高等教育的緬甸華僑二代的描述，以及部分受訪者對上大學前階段的回憶中，周遭人們對東南亞、緬甸的態度較為負面，而這個負面印象背後蘊含的是對經濟弱勢的預設，以及階級的歧視。從田野資料中能發現污名存在校園同儕中，也出現在社區學校中的老師、家長們周遭的人群的口語中。反映出台灣結構性、較佔據主導性位置的刻板印象。而感受到人群中對東南亞的負面刻板印象，導致緬甸華僑二代會傾向掩蓋自己的緬甸部分的家庭背景。

雖然在台灣的遷移脈絡、時間有所差異，緬甸華僑第一代是在 1990 年以前，得以在政策更動前，因為「華人血緣」，透過依親的方式來台灣；外籍移工是在國際全球分工、全球化下，因為工作考量，在 1990 年代後陸續前往台灣的，其污名並非專屬於特定的族群。移工所受的偏見與歧視蔓延在社會中，形塑了人們對東南亞的刻板印象，並進一步對緬甸華僑二代的生命經驗與認同展演策略產生影響。



第四章、經過高等教育

一、認同展演

阿勇是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第二代，高中唸的是明星高中，大學就讀於台大。在台灣出生長大的他，原先不諳緬語，而是熟悉雲南語的使用。家裡開設滇緬餐廳的他，對於雲南的飲食亦不陌生。浸泡在充滿雲南飲食、語言的環境中成長，在某些情境中，阿勇卻會有意識地操演出新二代的認同。相反地，雲南背景、文化雖然可能令他感到更加熟悉，卻鮮少被他提及。

打開臉書，進入他的個人頁面，在搜尋欄打上「新二代」三個字，幾篇過去他曾經撰寫過的貼文跳了出來。有的是分享緬甸新二代的活動的貼文，有的是他分享新二代議題的書。同時，還有他過去高中時期轉發一篇天下評論的投書，並隨著該文洋洋灑灑寫了一段有關新二代身份的經驗與心得。吸引我注意的是，那篇文第一行便寫了「我是很幸運的新二代。」

想起幾次與阿勇的互動，都是建立在他邀請我一同參與緬甸華僑二代活動的場合之中。成功地促成了幾次緬華二代的聚會後，我與阿勇相約進行深度訪談。僅憑著認識初期的印象，我暗自猜想他是有著深厚新二代認同的受訪者，或許出生於祖籍閩粵的緬甸華僑家庭，擁有與緬甸連結深厚的家庭背景。然而，在訪談中他卻向我吐露：「新二代嘍……（停頓思考）我……不會（堅定）我不會說我是新二代，除非有獎學金（笑了出來）。（阿勇）清楚地意識到操演出「新二代」認同，這樣的身份在學校、升學、申請獎學金等場域是有益處的，阿勇的新二代認同，在取得高等教育者容易接觸到的場域中被建構起來。然而，對於身份中有關華僑、雲南的部分，阿勇亦有意識地減少提及。「我很少講自己是雲南的，我比較常講緬甸相關的。可能也跟整個環境可能對於這方面可能會比較敏感有關，除非特別講到雲南食物的時候才會提到」（阿勇）

阿勇的案例並非單一個案，祖籍雲南與祖籍閩粵的受訪者之中，都有相似的案例。事實上大多數取得高等教育的緬甸華僑二代，操演認同的方式也與阿勇非常相似——強



調身份中緬甸、新二代的樣貌；同時省略、避免身份中涉及「祖籍」、「僑」、「中國」相關的部分。與他們在家庭環境中實際接觸到的文化相比，生活環境中對於不同身份的看法與態度，對於緬甸華僑二代的認同操演與形塑有著更關鍵的作用。本章節將描繪出取得高等教育者操演身份的策略，說明他們如何受到環境的影響，調整、重構他們的認同。

1. 扮演新二代

與上一節提到未經過高等教育的受訪者相比，在田野中，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們使用「新二代」這個詞彙的比例不成比例的高。滑動他們在社群媒體的自我介紹、個人頁面，能輕易翻找到與緬甸、東南亞身份有關的資訊、自述、經驗分享、旅遊心得或議論。乍看之下，這些緬甸華僑二代同質性高、彼此間差異不大，難以僅憑著他們在社群媒體的分享，輕易區分出他們的祖籍是閩粵或者雲南。在許多時刻，他們會省略「華僑」兩字，稱呼自己為「緬二代」，因此在閱讀上，時常會將他們與婚姻移民子女，也就是父母其中一方不是移民的東南亞新二代，歸類在相同的框架之中進行想像。

從第二章可以得知，祖籍閩粵的受訪者，在成長過程中接觸到的語言、飲食、宗教文化，緬化程度比起祖籍雲南的緬華二代更為濃厚。因此當看見祖籍閩粵的緬甸華僑二代，在生活中表現出緬甸認同、強調緬甸的模樣時，並不讓人感到意外。時常以緬二代身份舉辦講座、介紹緬甸文化的小櫻，在大學時期創辦了介紹緬甸的臉書粉絲專頁。小櫻粉絲專頁的照片，中華民國與緬甸的國旗。下面寫「我想促進台灣和緬甸之間的交流，將台灣的資源、技術和知識帶到緬甸，藉此讓更多人認識台灣、讓台灣被國際看見進而創造雙贏的局面。」一篇篇臉書貼文中，寫滿充滿豐富的緬甸的宗教信仰、飲食文化的文章。

雖然素昧平生，另一位祖籍閩粵的受訪者達哥也有著相似的行動。達哥在臉書創立介紹緬甸文化的粉絲專頁，其中一篇介紹文寫道：「年輕的緬甸二代們，都在用自己的方法為大家掀開緬甸它神秘的面紗。」達哥自身宣揚緬甸文化的方式非常多重，除了



教導大眾緬甸文，也時常撰寫一些音樂、飲食文化的介紹，以增進台灣人對緬甸的認識。巧合的是，小櫻與達哥的粉絲專頁中，都沒有出現與祖籍相關的內容，他們表現出對緬甸文化的熟悉與認同，與第一代給他們建構出的成長環境相互呼應。在一次訪談中，達哥向我吐露，自己對緬甸音樂的啟蒙與父母有很大的關聯。他的父母每天晚上都會播著緬甸的音樂入睡，讓自己即便已飄洋過海來台，仍然能夠像是在家鄉睡著一般。除了成長過程在家庭中接觸、形塑出緬甸認同，從訪談中得知，達哥與小櫻兩個人的童年經歷也有些相似，兩人都頻繁的返回緬甸。小櫻指出「我生長於台灣，家人是緬甸華僑，小時候放長假會去緬甸，所以也對緬甸有著特殊的情感，想讓這個目前需要幫助的國家變更好，同時也希望台灣越來越好！」暑假寒假期間，小櫻與達哥幾乎都會回去緬甸度過，也因此除了透過第一代傳承緬甸的文化，他們自身也有許多的一手接觸。

有趣的是，祖籍雲南的受訪者雖然在成長過程中沒有歷經太多緬甸的文化，大部分時間，家庭中還是以雲南語、飲食為主，卻也有許多人表現出類似「新二代」、「緬二代」的樣貌。與祖籍閩粵的小櫻與達哥相似，祖籍雲南的包姐與阿勇，也都各自有創辦臉書粉專。從粉專名稱進行分析，可以發現他們都相繼提到了緬甸，並且同時沒有提及任何華僑、祖籍身份相關的字眼。瀏覽粉絲專頁內容，大多圍繞著緬甸飲食文化、緬甸政變等議題。從表面看來，他們的身份是「緬二代」、「東南亞新二代」。但差異是，因為並沒有那麼接觸過濃烈的緬甸文化，相較於祖籍閩粵的受訪者，祖籍雲南的緬華二代可能在這樣稱呼、表現自己時，會有點心虛，甚至私底下根本沒有新二代認同。舉例來說，在訪談期間，阿勇向我透露自己其實不覺得自己是新二代。而包姐也在訪談中，表示雖然常常關注這些議題，但稱呼自己為新二代會讓他感到有些心虛。

馬：「如果有人問你說你其實是新二代的話或新住民的話……」

包姐：「我就覺得如果問這個問題的話，我就覺得是我回答完之後，我就覺得我好像有點心虛。」



馬：「但你還是可能會說算是，這樣嗎？」

包姐：「對，我就說算是。然後如果說有時候有一些新二代的聚會，或新二代的議題的話是很關注，然後新住民的議題或新住民的就是那種相關聚會或者是一些有相關的內容，我覺得其實我還蠻喜歡去關注的，對。」

除了經營粉絲專頁，許多情境中，緬甸華僑二代會展演出自身份中接近東南亞二代的面貌。大學申請過程，備審資料與面試，也可能是他們展現出多元文化的舞台。在我詢問有關申請過程中提到身份的經驗時，阿勇回憶道，自己過去有寫和新二代有關的內容。在我追問細節之下，雖然時隔多年記憶已有些斑駁，阿勇仍表示：「就是對於文化的反省或什麼，因為之前報有報人社科系……可能是那個吧……雙邊文化的……灌溉之類的吧，類似這樣的。」從阿勇的回覆中，可以發現他使用了「雙邊」這個詞彙。在他的暗示中，雙邊的意思是台灣與緬甸。而身份中的雲南、中國、華的部分，像是不存在一般，在這個敘述中消失了。

雖然出生在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家庭，阿勇在生活中追逐著緬甸文化。高中便就讀明星高中的他，和在緬甸街聚居區生活的緬甸華僑二代形成了對照。「我那陣子很喜歡跑各種地方的講座去聽，因為高中很閒，所以不只是緬甸的，有東南亞，或者是有相關的有興趣的主題我都會去聽。」校園中沒有認識半個相同背景的同儕，成長過程中，他幾乎沒有遇過相同背景的緬甸華僑二代。阿勇沒有採取掩蓋東南亞的策略，反而想辦法接觸、將自身與緬甸做出更多連結。阿勇比起許多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更早地步入「稱頌多元」的場域，或許與明星高中的特性有關。台灣的明星高中進入好大學的比例很高，對於大學的慣習、價值觀，以及升學制度背後運作的邏輯與偏好，皆非常敏銳。

阿勇在聽演講的場合，發現了學習緬甸語的機會。祖籍雲南的他，在這樣的管道下開始從基礎學起。在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中，許多人都有學習緬語的動機。甚至許多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二代，緬文名字還是緬文老師取的。然而，並不是只有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二代，會因為家庭文化中較少接觸緬甸語，才另外找機會去學習緬文。祖



籍廣東的緬華二代小亞，就在朋友的介紹下，開始學習緬文。原先我以為祖籍廣東的小亞，本身對於緬甸的語言不陌生，可能是被族群認同、情感上的因素驅動，才決定要將緬文學得更精通。然而，被問到為何要學緬文時，小亞卻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回應我，僅是因為自己有學習語言的興趣，更列舉出他過去所學習的其他語言，羅列出來的方式，顯得緬語和其他語言並沒有什麼不同。對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而言，語言不僅是溝通的工具、情感與認同的載體，更是一種文化資本。除了清楚地有此意識，政府給予新二代的語言學習補助，更進一步的增加了小亞去學習緬文的誘因。

馬：你怎麼還會想去上課？

小亞：我還蠻喜歡學語言，所以大學就有學像泰文、日文之類的。

馬：怎麼會想說他特別上緬語的課？因為……你是自費去上？

小亞：欸那個可以申請補助。高教深根那個。

雖然緬甸華僑二代並非婚姻移民的子女，與台灣普遍的新二代在許多方面都有所差異。身份處於灰色地帶的緬華二代，能夠將自己的身份扮演為新二代的一員，以得到政府給予的補助。小亞是非常熱心的女孩，每次訪談結束後，她總會積極地鼓勵我去申請各種新二代身份能夠獲得的獎學金和補助金，甚至會傳訊息給我，深怕我漏掉申請補助的機會。在申請資料的過程中，小亞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操演新二代身份，申請的項目也大多與新二代相關。然而，在訪談中小亞卻也坦白地和我說，自己並不覺得自己是新二代。緬甸華僑二代即便沒有新二代認同，也能操演並運用新二代身份。在取得高等教育的緬華二代之中，無論祖籍雲南或閩粵，這樣的操演策略皆相當普遍。

像小亞一樣熱心、在訪談後還願意主動與我討論「緬二代」相關議題、分享新二代資源與相關資訊的受訪者，在取得高等教育者的案例中並不是少數。與未經過高等教育的受訪者們相比，雖然取得高等教育的緬甸華僑二代在校園中不太能頻繁地遇到和自己家庭背景相似的同儕，但他們會積極地在相關課程、活動中，找尋其他「緬二代」



的蹤影，並試圖保持聯繫。在受訪者阿勇邀請我共同舉辦的幾場緬甸華僑二代活動中，參加者、自願報名的成員，大多都是進入「稱頌多元」場域，被歸類為取得高等教育的人。活動中談論的內容、議題，大多與緬甸直接相關，即便祖籍不同，在相處時他們看起來卻像是差異極低的共同體。我想起不同國家的東南亞新二代，也被想像成同質性高的組成。目睹著「緬二代」們高談著緬甸政變、文化經濟等議題，突然間，我發現自己很難不把他們當作新二代的其中一種類型看待，並在意識到他們上一輩對緬甸身份的否認時，心生一股矛盾之感。

2. 極力迴避身份中的中國性

祖籍閩粵的受訪者家庭緬化程度較高，第二代在成長過程中接觸到的文化，與緬甸文化較親近，而與祖籍的文化較為疏遠。在訪談過程中，取得高等教育、祖籍閩粵的緬華二代大多直接否認自己是中國人。在被問到是否有祖籍認同時，取得高等教育的閩粵緬華二代，大多表示「基本上已經毫無關聯」、「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同時，會迴避談到身份中華僑、華人的部分，時常直接說自己就是緬二代。許多人更理所當然、理直氣壯的認為自己的身份中僅有台灣、緬甸兩個元素。

在一次藝術工作坊中，藝術家正引導著緬甸華僑二代們根據自身家庭背景、遷移故事與族群認同，來做出充滿意象的食物雕塑展覽作品。祖籍廣東的達哥是工作坊的創作者之一。看著他將台灣便當店裡買來的炸排骨當作蹺蹺板的木板，並在兩端放上台灣、緬甸的家常菜，我好奇地問達哥作品的創作理念。達哥向我解釋，他認為自己的身份就像這個蹺蹺板，總是在台灣與緬甸兩個選項之間擺盪。然而，我卻想起當天不久前，我碰巧聽見他與另一位參加者金姐的談話。達哥聞到金姐帶來現場的福建菜後，無意間透露他對這個味道的熟悉，並表示他的父親其實偶爾也會煮這樣的料理。在飲食上，達哥顯然也擁有些許與祖籍文化相關的經驗，然而，無論在訪談中談家常菜時他並未向我提及，在他的作品中，也難以找到祖籍身份的蹤影。

祖籍閩粵的受訪者雖然在日常生活中、家庭的環境內，較少接觸到與祖籍文化相關的事物。在族群身份的操演上，他們仍然會有意識的迴避祖籍身份、語言。以小亞的作



法為例，即便本身對祖籍的認同、文化的經驗不多，小亞仍會盡量讓自己不要顯露出身份中會與「中國」產生聯想的部分。小亞的家庭語言是緬甸語，父母平時對話都以緬語溝通的她，在童年時期亦多以緬語和父母對話。廣東話能力「只會幾句」的她，在訪談中卻向我表示，除了曾經在遇到香港朋友時，有用幾句台山話⁷和對方交流，自己平常不會顯露祖籍相關的家庭背景。

馬：你會跟你同學講說你們家的祖籍是廣東的？

小亞：曾經有講過，後來就沒講。因為講之後反應感覺不是很好，其實那段時間大家好像蠻仇中的。

在細問之下，小亞向我吐露，自己發現上了大學以後，身邊同儕與老師對於與「中國」有關的身份、議題比較敏感。而廣東話、祖籍廣東，從字面上看來就與中國息息相關。感覺到環境中對這個身份的態度，大多不友善，小亞在上了大學後幾乎不會談論到自己的祖籍，也不會主動與同學分享廣東話。

祖籍雲南的受訪者，相對而言，因為家中使用雲南語、吃雲南菜，第一代多保有雲南／中國認同，在取得高等教育者的認同操演上，常常會需要更謹慎地管理有關中國的部分。尤其在使用到語言的情境中，會特別需要小心地掩蓋。在一次田野過程中，我參加一個祖籍雲南緬甸華僑家庭的聚會活動，期間到了一家咖啡廳，大人們用雲南話你一言我一語，聊的十分熱烈。然而，隨著服務生逐漸走近，聚在一旁的年輕人窸窸窣窣了起來，其中一個緬華二代按捺不住，不悅地碎嘴道：「不要講雲南話啦，等一下人家以為我們是中國人。」

我見獵心喜，立刻湊向前想多問幾句。我一面打圓場，一面藉機詢問方才出聲遏止的家家，為何如此擔心家人被誤認為中國人。雖然看起來有些尷尬，家家仍不假思索地回覆我：「就……雲南話聽起來有點怪，就是，你不會特別去講，在外面怕人家聽到會想說……額……這些人是不是大陸客。」雖然家家看起來深怕自己與家人被誤認為中國人、「大陸客」，但家家向我坦誠，自己在上大學以前，其實常常和同學們說自己

⁷ 台山話為廣東話的一種



是外省人、雲南人，若有人將自己當成「大陸」雲南人，他也不會極力否認。認同操演並非固定的，會在不同生命階段、情境中表現出非一致的表現，甚至可能會是彼此矛盾的。

語言與族群認同的關係是相互纏繞、高度相互影響的，因此當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二代取得高等教育之後，若想讓自己的族群身份擺脫與中國、祖籍有關的部分，便需要對語言的使用、傳承母語的態度進行管理。在一次訪談中，我試探性地詢問阿勇，是否會認為自己的母語雲南語需要被傳承，甚至是放入教材、在學校母語課中成為一個選項。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阿勇表現得有些難以啟齒，思考停頓了幾秒後，他沒有正面回應我他是否希望這樣的安排能夠成真，而是拐了個彎地指出雲南語傳承可能會面臨的挑戰。

馬：「你會覺得雲南話會需要放到教材里面嗎？或者母語課應該要有雲南話選項？」

阿勇：「可是這樣的話就會觸動外省情節，他會覺得這不是台灣，這是台灣的語言，就比起外國語言更像是中國這樣子。」

馬：「所以你會擔心你會跟人家講說自己是雲南人，或者會擔心人家會說……？」

阿勇：「我很少講自己是雲南的，就比較常講緬甸相關的。可能也跟整個環境可能對於這方面可能會比較敏感有關，特別講到雲南食物的時候才會提到，對。」

與大多數東南亞新二代的經驗相比，阿勇對於母語傳承、身份中涉及祖籍部分的拉扯，或許更像中二代會有的心情。在被問到母語課加入雲南語的可能性時，他膝反射般地吐出「觸動外省情結」，並指出「中國」的語言與一般外國語言相比之下更為鮮明的敏感特徵。也因此當阿勇向我表示，自己平常比較常談到緬甸相關的事情、並且很少承認自己的雲南身份時，我並不感到意外。只是幾分鐘後，他的媽媽熱情邀約我留下來在他們家的滇緬料理餐廳午餐，飯桌上一來一往的雲南語，與他訪談過程中的回覆相互映照，呈現出一種斷裂之感。



在取得高等教育、祖籍雲南的受訪者之中，許多人擁有所謂的「拉扯」。與祖籍閩粵的緬甸華僑二代相比，他們的生命經歷中，有祖籍文化參與的比例太高。他們中有的人在日常中頻繁使用雲南語和家人溝通，有的人在清真寺有著能以雲南語聊天的同儕，其中許多受訪者表示，家人與長輩也會提醒他們要講雲南話、延續雲南人認同。因此，在他們意識到自己成長中接觸到的文化，與他們身處場域中較主流的價值觀，甚至是他們也認同的價值觀有所斷裂時，便會不知所措。小貝是畢業於人文社會科學相關科系的大學生，在一次訪談中，他也向我表示，自己很少在外面講雲南話、說自己是雲南人。甚至她會思考，這樣的語言，是否有繼續使用、傳承下去的必要。「其實看到那些母語運動的文，都不知道要怎麼反應欸……我要說我講的母語就是雲南話嗎？這不就是他們在講的支語滾回支那、支語入侵的中國語嗎？那我到底要讓他流失乾脆不講，還是要怎樣？」（小貝，2021／10／19）在小貝的回答中，他提到自己在網絡、社群媒體上時常看見對中國用語進行排斥的貼文，在心中某部分有些認同的她，便開始思考自己是不是不該承認自己的母語是雲南語，以及是否要讓自己的母語流失掉、乾脆不講。

3. 尋找身份中涉及「中國」的替代方案



在身份可以被掩蓋時，取得高等教育的緬甸華僑二代大多不會主動地展露自己身份中牽涉「祖籍」、「中國」聯想的資訊。然而，在某些場合，當他們已經暴露自己並非婚姻移民二代、普遍的東南亞新二代，卻又亟欲將自身族群身份與中國相關特徵進行切割時，緬甸華僑二代會採取一些說法置換、並與中國人身份保持距離。在訪談的情境中，因為我已經對他們家庭背景有所掌握，在不能掩蓋中國身份的情況下，緬甸華僑二代仍會想辦法與敏感的「中國」問題保持距離。

取得高等教育、祖籍閩粵的受訪者，在切割／置換中國身份時，因為在生活中接觸到的文化還是以緬甸為主，而祖籍文化本身就較為陌生，會比較果斷一些。會認識小金，是透過同為緬甸華僑二代的受訪者家家幫我引介的。在向我介紹小金時，家家滿臉自信地向我說著，這個同學會多麼適合我的研究：「因為他們家很緬甸，不是我們這種雲南的。」訪談當天，果不其然地，小金在我面前表現出的樣貌就是「與緬甸連結深厚、祖籍廣東的緬甸華僑二代」訪談中他表現出自己跟緬甸的關聯，會說緬甸語、家中篤信緬甸小乘佛教。然而，在我問到他如何在台灣、中國、緬甸三個國家中認同自身時，他無可避免的提到了自己的「血統」包含緬、中。有趣的是，小金的雙親皆是華僑，家族中並沒有跨種族婚姻，他卻將其當作血統的一部份。同時，他只表示自己的認同有「緬」與「中」，卻幽微地避開了中國這個完整的詞彙，並且加以澄清，他指涉血統包含的「中」，並不是小熊維尼（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或許像是「中華」，這樣意義較為廣闊的詞彙，會比起中國更貼近小金想表達的內容。小金不介意自己被稱呼為「緬甸人」、「緬甸二代」，但對於被當成中國人，卻非常有意見，他試圖與政治上較為敏感的中國這個國家切開關聯。

「我覺得我的意識是台灣和緬甸的，血統的話可能是緬、中吧

.....

但不是中國！小熊維尼爛地方！」（小金）

與小金的說法類似，同為祖籍閩粵的緬甸華僑二代，小亞被我問到是否會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時，撇清了自己在政治的劃分上與中國的關聯。針對家庭中的祖籍背景，以及家庭確實是以華僑身份來台的事實，小亞為了難以迴避與這些相關的族群身份，想出一個解套的方式——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後代的人，而非中國人。

馬：「你會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嗎？」

小亞：「我會覺得這個……我想一下。我會認同我是一個中華民族後代的人，但我沒有如果以現在政治分的劃分的話，我不會覺得我是中國人，因為覺得跟大陸還是有一點不一樣。畢竟也是對地理環境條件，但如果以文化來講的話，我還是認同自己是中國中華文化的後代。」

祖籍閩粵，即便成長過程中接觸到祖籍文化的程度有限，身份中仍然有難以迴避的中國性。即便不佔主導地位，身份中與中國、祖籍有關的部分，仍有一定程度的參與了緬甸華僑二代的認同，在他們心中，知道自己並非純正的緬二代、父母並非緬甸人。因此在認同操演上，他們會想辦法迴避、避免被當成中國人。

祖籍雲南的緬華二代，與祖籍閩粵的受訪者相比，因為在成長過程中接觸的雲南文化更濃厚、也更頻繁地使用雲南話。在取得高等教育者想要掩蓋身份中有關雲南、中國的部分時，認同操演可能會面臨更多的掙扎。以包姐的故事為例，包姐自身的家庭語言與飲食文化皆與雲南有著密切的關連，在田野中，除了觀察到其與家庭成員聊天過程皆是講著一口流利的雲南語，在她近期學習烹飪家常菜的過程中，也能看到其把雲南菜當成認同與家庭文化與記憶傳承的重要媒介。即便如此，被問到是否認為自己擁有中國人認同時，包姐想也不想的立刻反射性地回答：

「我覺得這個是我最不太會說的答案，是因為我覺得雲南它對我來說是一個語言文化跟家里面的飲食的一種傳統的認同，文化上面的認同，可是我並沒有在雲南長時間生活過，所以我會說我自

己是雲南人，是因為我會我到現在我還在講雲南話，我的母語也是雲南話，我吃雲南菜，我的家庭傳統跟雲南息息相關，可是如果我說我是中國人，我也覺得我很奇怪，因為我沒有在中國生活過，我在那裡我完全沒有生活過，然後我說我是中國人，我覺得我有點心虛。」（包姐）



我想起包姐曾經告訴我，她的父親如何叮囑她不能忘本、要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但在此刻回覆我的此刻，我親眼見證了包姐盡力掙脫中國人身份的瞬間。她表示，因為沒有在中國生活過，有中國認同會很心虛。對於成長過程與生命中俯拾皆是雲南語、雲南飲食文化，包姐選擇將其轉換為對「祖籍」、「雲南」等低於國家層次的省份的認同；然而，針對緬甸的認同，包姐卻沒有進行類似的轉換與降級。雖然在緬甸生活的時間不長、自小便頻頻聽見家中父母稱自己為中國人，同時否認緬甸人認同。包姐作為在台灣生長的緬甸華僑二代，卻在家族離開緬甸之後，成為了有緬甸認同的人。與否認中國認同，轉換、降為省級層次的雲南認同對照，在緬甸身份的部分，包姐沒有將自己對緬甸的認同，轉換、降級為眉謬等地區性、城市認同的需要。

馬：「所以你可能也會說我是雲南人。」

包姐：「這樣子，對。我會比較常說我是雲南人，我覺得現在有時候我也會說我是緬甸人。」

類似包姐選擇將身份中可能會牽涉到「中國」的部分進行降級，同為祖籍雲南緬甸華僑二代的小丹，在言談之中也試圖使用其他可能的替代性詞彙取代、迴避自身與「中國人」的連結。在訪談中被我問到「會覺得自己和中國有根源上的連結嗎」時，小丹吞吞吐吐地回答，自己覺得還好、不算中國人，比較像是「華人」。對祖籍雲南的緬甸華僑二代而言，相對於中國人，華人這個詞彙相對指涉的對象比較廣泛一些，也較能夠迴避政治上較為敏感的台灣、中國認同間的矛盾與互斥問題。

「嗯……就……算是華人吧。（覺得自己和中國）有根源嗎……但我覺得還好，這就……有個同個家族的人在裡面的話，華人……不算完全沒有關係，但不算中國人，比較像是華人。」（小丹）

除了「華人」一詞指涉的對象較為寬廣，能夠成為替代性的認同選項之外。被問到家庭背景、自己的認同時，緬甸華僑二代有時也會自行轉換問題，給予對方有關「第一代」的資訊。比起說出自己擁有什么認同後，又引發對方因為不解而衍生出更多的問題。這樣的作法一方面能夠讓對話的另一方更清楚的理解緬甸華僑家庭遷移的軌跡，也能避免無法回應對話情境中的期待——預設聽到簡短而明確的回答，帶來的尷尬。

馬：「有人問你說你是哪裡人，你是哪裡人，你們家是哪裡人，你會怎麼回答？」

小丹：「就是我爹媽在那邊……緬甸華僑。只是我爸爸在緬甸出生，我那個我爺爺他們在中國雲南那邊，對吧？」

與上述案例中小丹的回答相似，阿勇的策略也是先撇開針對自身認同的提問，選擇自行轉換問題，回答自己上一輩、父母的身份是緬甸華僑。然而，面臨我繼續追問他自己的認同，和中國、緬甸、台灣的關係為何時，阿勇倏忽之間便脫口而出「先排除中國」。彷彿先吐出這句話後才開始思考，阿勇沈默了一會後，仍以不確定的語氣告訴我，自己是有著緬甸人父母、在台灣出生的人，而「緬甸華僑」這個比較簡短的說法，也會是他願意接受的描述。

馬：「你會覺得自己是什麼人，如果是問你自己」

阿勇：「我都說我父母是緬甸華僑。」

馬：「那你自己覺得是什麼？國族的……以國家的尺度而言，你會覺得自己是台灣人還是跟緬甸比較接近？還是中國？」

阿勇：「嗯…先排除中國（不發一語地苦笑了一陣子）……可能……就是在台灣出生了，然後父母是緬甸人，這是我的描述，緬甸華僑的這是我的描述。」



二、新南向政策下稱頌多元的價值觀

1. 「取得高等教育」受訪者周遭人群對東南亞身份的看法

與未取得高等教育的緬華二代擁有的經驗相比，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們，大多指出自己周遭的同儕、師長，對於東南亞與緬甸身份較不會帶有負面刻板印象，甚至許多時候是抱持著正面的態度，欣賞多元文化的身份背景。就讀於台灣頂尖大學的阿勇表示，即便過去就讀明星高中，仍有遇過因著自身緬甸背景遭遇歧視的經驗；進入大學後，阿勇感受到身邊的人對緬甸雖然陌生，但對新住民或新二代的看法卻傾向友善。

馬：你覺得現在的話，大家是怎麼看待，或是你的你身邊的人同溫層，是怎麼看待緬甸人或者新二代的？

阿勇：會很陌生，就像是突然提柬埔寨的樣子。

馬：你覺得你身邊的人，大家看待新二代或者新住民呢？

阿勇：應該都是蠻友善的，對新住民或新二代。

同為緬甸華僑二代的受訪者阿若，比阿勇年長五屆，兩人互不相識卻就有著相似的求學經歷——畢業於明星高中、步入同一間頂尖大學。巧合的是，即使兩人皆在就讀大學前的階段，遭遇、目睹過對東南亞的歧視。當我問及「就讀大學後，周遭人們對緬甸的看法」時，兩人都認為各自身邊的人對於「緬甸」、「東南亞」抱持著正面的態度。阿若表示，周遭人們甚至曾經因為認為她的家庭背景很特別，進而想要瞭解更多。

「我的朋友不會是負面的來看待這件事情，然後可能反而是比較我覺得是蠻正向積極的，可能說想要更了解，或者覺得很特別，或者是我覺得想要進一步了解的蠻多。」（阿若）



對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而言，針對東南亞的歧視稀薄且較難以察覺。同時，對多元文化的稱頌，則讓緬甸華僑二代身份中涉及緬甸的部分，從遭受污名的處境，轉變為可以運用的文化資本。在訪談中，受訪者們不約而同地提到了「進入大學」這個時間點作為分野，並揀選出大學中幾個活動與課程的經驗，促使他們感受到周遭人們對不同族群身份看法的轉變。舉例而言，開緬甸飲料店的受訪者達哥，向我吐露自己過去雖然長期掩蓋緬甸身份，直到上了大學，他才發現原來有著特別的族裔身份、家庭背景，能夠受到大家的矚目。回憶起第一次覺察到環境中對東南亞與緬甸抱持正面態度，達哥向我分享了當年在大學「多元文化週」中演唱緬甸歌曲的經驗。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大學的時候有蠻多類似多元文化週，不然是因為我有提到我非常喜歡音樂，所以有表演機會我都有去參與，然後最後他們就會寫說是緬甸混血 rapper，然後大家就會對緬甸很感興趣，對。然後那時候就覺得原來大家會很關注說不一樣的身份。」
(達哥)

大學校園中許多活動的安排與設計，能使緬甸華僑二代感知到緬甸、東南亞身份可以被接納，同時展演出身份中這個部分，對他們而言是有利的。除此之外，課程設計安排、通識課等環節，也讓緬甸華僑二代意識到身份能被轉換為文化資本。祖籍閩粵的受訪者小密，本身緬語能力有一定程度。過去因為感受到學校中同儕對緬甸的歧視，掩蓋自己身份好段時間的他，在大學的通識課中，卻發現教授將他的緬甸背景與母語，視為國際交流的能力。在導覽相關的課程中，他受到老師鼓勵，得以用緬文進行練習。

「我的教授問我說，我會不會用緬甸話導覽，我跟他說我練習一下。因為我在想他可能是一方面是不希望我排斥對國內事務的了解，事物跟社群的了解，一方面可能是想把這邊的特色外傳出去。」（小密）



取得高等教育的緬甸華僑二代在步入大學後，在校內活動、課程中教授的言談，甚至學校校版等管道中，能夠意識到自己身處於有利東南亞身份、緬甸背景的社會空間。除了上述提到的案例，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特別是人文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的緬甸華僑二代中，也有不少人在大學期間修習與多元文化、移民、緬甸音樂等課程。在這些課堂中，他們能感覺到東南亞與緬甸身份，可以作為文化資本並拿來運用。因此在認同展演上，也會比起未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更偏好展演自己是「新二代」、「緬二代」的樣貌。

在訪談過程中，我好奇「感受到上大學後，周遭人群對不同族群身份態度的差異」的受訪者們的認同展演的變化。然而除了訪談，較難以取得其他田野材料來分析緬二代的認同如何隨著周遭人們的看法，在不同時間點出現差異。因緣際會下，我決定翻找自己過去成長經歷中，不同教育階段的自我介紹性質的田野資料、自我介紹、自傳資料，以確認其中有關族群身份的自我呈現是否一致。令我意外的是，我發現自己在國小階段的自我介紹作業簿上完全沒有提及自己的族群背景與認同，在高中申請大學的階段，備審資料僅在語言一欄寫上「緬語」，雖是我寫的，但時隔多年看見有些驚訝，因為生於祖籍雲南家庭的我，事實上不會講緬文，更意外對於家庭背景與族群文化隻字未提。對比起來，大學後申請研究所的備審資料中，在標題與所有鮮明之處都寫著斗大的「新二代」、「緬二代」等字眼，內容也多闡述多元文化背景、克服逆境的形象，和上大學以前的階段形成了明顯的差別。進入高等教育環境的緬甸華僑二代，會發現周遭人們對東南亞的看法，從污名轉變為能運用的文化資本，這也促使緬華二代在認同的展現上，更願意展演緬甸的一面。

2. 新南向的政策背景

從田野中，可以發現多數受訪者們認為「上大學」後周遭人們的態度對東南亞轉為較友善，在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而言，東南亞新二代的身份已經可以從一個不利因素轉化為文化資本。緬華二代們表現出緬甸的一面，除了在同儕的眼中是多元、有趣的背景，更可能能帶給緬華二代們實質的資源。這個現象與新南向政策的實行有著緊密關係。政策施行後，教育單位，以及大學校園中人

們的態度與看法轉為正面。而這些政策與想像，進一步地影響了緬華二代的認同展演。

與台灣開放外籍移工的時間接近，1990 年代開始，許多東南亞外籍配偶以婚姻移民的方式遷移至台灣。隨著其第二代在台灣社會成長、進入教育體系中，台灣政府於 2012 年著手展開新二代的多元文化教育，並於 2016 年推動了新南向政策。從中央層級至地方各部會，新南向政策的實行，讓婚姻移民配偶的子女不僅在資源上能獲得諸多支持，更促使教育環境中師生、學校的同儕，建立起對新二代的正面想像。新二代與多元文化等東西開始掛鉤。（Pei Chia Lan, 2023）

因此，對緬華二代而言，除了到大學後同儕間、高等教育環境友善。在進入大學，發現教育制度中「新二代」身份有著諸多紅利、升學好處後，也會傾向去利用。小亞

馬：你沒有拿或其他新住民相關的補助嗎？或是其他福利或資源。

小亞：我大學以後學校有高教深根計劃，然後我就有去申請的讀書。高教生跟計劃，你也可以申請對申請補助還蠻多。

馬：那你是什麼時候知道這個東西？

小亞：我大概印象當中是大二就知道了，但是我家人……他寫的方法我以為是我申請不到，所以後來到大四才發現我能夠申請。

馬：他是怎麼樣的條件？

小亞：他有很多條件就是什麼家庭中低收，或者是新住民一代或二代可以申請。

然而，台灣的新二代政策並不是為了這群人設計的。制度上真正符合新二代定義的人群，其父或母，其中一方是台灣人。依照政策，緬華二代應該不是要受

到補助的對象。但因為緬華二代與新二代仍有些相似之處，例如父母確實出生國籍不是台灣，再加上整個國家論述中對於在台灣「華僑」的陌生、避談、忽略，讓這些人在制度上可以趁機塞進去，或以為自己就是新二代。台灣的新二代，大多是東南亞外籍配偶的子女。最一開始是想補助那些「婚姻移民」外籍配偶的小孩。因為以血緣來看，他們有一半的身份是「台灣人」。因此政策上，課綱改革也會提到母親國家的語言和文化知識。提供社會弱勢學生的大學入學特殊通道，預設了他們在經濟上較為弱勢。

因此就算祖籍雲南，母語不是緬文，也會讓自己做出新二代的樣子。

「新二代喲……（停頓思考）我……不會（堅定）我不會說我是新二代，除非有獎學金（笑了出來）。」（阿勇）

三、地緣政治下敏感的中國身份

1. 「取得高等教育」受訪者周遭人群，對「與中國有關的身份」的刻板印象

雖然取得高等教育的緬甸華僑二代在生活中遇到的人們，大多傾向讚頌多元文化、具有包容性。緬華二代家庭背景中的緬甸、東南亞身份，在接受高等教育受訪者的生活環境中，甚至是被認可的文化資本；然而，身份中與「華僑」、「祖籍」有關的部分，卻有著相反的命運。中國與台灣在地緣政治上的緊張，一方面使得與中國相關的身份成為敏感的關注焦點。中國學生、中國籍配偶、中二代，不僅許多時候會在人們稱頌多元的範疇中被排除，甚至可能會遭致偏見與排斥。同時，由於中國認同與台灣認同通常是不能同時存在的互斥選項，對取得高等教育的緬甸華僑二代而言，相較於展演出能轉換為文化資本的緬甸認同，易與中國產生聯想的「華僑」與「祖籍」認同，是相對較不理想的族群認同選項。

在田野中，不同時間進入大學的緬甸華僑二代，不約而同地指出，在「上了大學」這個時間點後，他們感受到身邊的人對「與中國有關」身份的看法出現顯著的改變。今年 27 歲的受訪者阿若，踏入大學時，恰好碰上台灣的三一八運動。就讀社科相關領域的她，在被我問到「身邊的人如何看待具有中國相關身份」的人時，向我表示大學後，較容易得到強烈的負面回應。同時，她主動向我提出高中以前的觀察進行對比，顯示出在她主觀的感受中，「上大學」這個的清晰的時間點便是周遭人們態度轉變的分野。

「我覺得中國認同，中國人認同或者是中國人，大學以後，對於中國認同這件事情，接受到比較負面強烈一點的負面的感受，在大學以前高中就覺得好像真的不太會有負面的印象。」（阿若）

訪談完阿若，看著田野筆記的我猜想著，或許是進入大學的時間點碰上了如此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才讓阿若如此深刻地觀察到周遭人群對中國認同的負面態度。在當年的歷史時刻，因為具有爭議性的服貿議題，青年世代普遍對中國有著負面的看法，這個說法似乎能簡單地解釋這個現象。然而，另一位受訪者阿勇，卻讓我發現高等教育環境中人們對中國的負面看法，並不僅是某個特定歷史時刻下的產物。阿勇與阿若就讀同一間大學，即便兩人生年紀有著差距，三一八時的阿勇仍然是國中生，在描述周遭人們對中國人身份的看法時，卻與阿若有著類似感受。取得高等教育的兩人，皆指出上了大學以後，環境中彌漫著對中國身份負面印象。在阿勇舉出的案例中，他曾經目睹了系上同學們在背地裡對中國學生的嘲諷。這類的經歷，構成了阿勇對「周遭人們面對與中國相關族群身份的態度」的想像。同時，在描述周遭人們對中國身份的排斥後，阿勇也給出了與「政治表態」「統一」這類詞彙有關的理由。因此，相對於在同儕眼中較為中性的緬甸背景，對阿勇而言，由於身處的環境中對「中國」的印象是更加負面、敏感、甚至可能引起人們排斥的。在此前提下，「華僑」、「祖籍」、「雲南」等語彙，便自然不會是阿勇，或者其他取得高等教育的緬華二代，心目中最佳的認同展演選項。

馬：你覺得你身邊的人或同溫層、同學是怎麼看待中國人這個身份呢？

阿勇：對中國人蠻排斥是吧？我覺得其實像是中國在政治上面的任何的表態或者什麼之類，都會讓很多台灣人比較敏感。然後像是比如說我們系就會嘲諷……比如說我們看到一個陸生，然後陸生不在的時候，就會嘲諷他說他是不是想說統一啊或者什麼之類類似這樣。說不定人家他們根本沒有這樣的想法之類，類似這樣子。

馬：所以你覺得可能同學或身邊的同溫層，可能對中國身份上較緬甸而言來的比較負面一點？

阿勇：對，國家的。

比對了阿勇與阿若的生命經驗，兩人皆明確的說出在「上了大學後」的時間點，周遭人們對中國的身份轉變的較為負面。我猜想，這與兩人皆就讀人文／社會科學科系或許有些關聯。但在我找到的緬華二代受訪者中，卻也有就讀理工科系的受訪者，有著相似的觀察與經歷。小丹是我的受訪者當中，年紀最小的一位。除了年紀，小丹與阿勇、阿若兩人的差異，更凸顯在他理組科系的同儕環境。即便科系與年紀都與上述受訪者有所不同，仍在大學就讀的他，竟也清楚的指出「念大學」作為自己生命經歷中，人們對「涉及中國身份的負面印象」加劇的分水嶺。小丹向我估算，他身旁的同儕中，會歧視中國人／大陸人的比例，至少佔了一半以上。

馬：對中國人或華人，你覺得他們的看法怎麼樣？一般人或你的朋友。

小丹：小時候還好，但長大之後、唸大學以後感覺越來越負面，對，但也有一些會想去中國讀書。

馬：你自己身邊的朋友是比較偏向哪一種？會歧視中國人嗎？歧視「大陸人」之類的？

小丹：有些會喔大概六成以上會，然後兩成或一成會有有點想去（去中國唸書），對，然後兩成就中立，應該分這樣。



從上述「取得高等教育的緬華二代」的經驗中，能發現他們認為周遭人們對中國較負面的刻板印象，在「上大學」後急劇增長。而這不單純只是因為特定的歷史事件，例如三一八運動所導致的。不同年齡、不同時間點進入大學的受訪者，對自身周遭人群態度的觀察如此相符，顯示了這並非特定時間點發生的事件，而是持續存在的現象。同時，就讀於不同科系的受訪者都有類似的觀察，也說明了這並非人文社會學科「同溫層」內才能發現的現象。

2. 「華僑」二代、「祖籍」身份轉為敏感詞彙

取得高等教育的緬華二代，在上了大學後感受到周遭人們對「中國人」抱持著較為負面的態度。而緬甸華僑家庭背景中，與「祖籍」、「華僑」等容易與中國產生聯想的部分，也可能受較為負面的刻板印象波及。小亞是就讀理工科系的緬華二代，與前面的幾位受訪者的經驗類似，在描述周遭人群對中國人的看法時，也指出了「大學後」較為負面。在小亞的案例中，暴露自身祖籍身份後獲得的反應不理想，也進一步地導致了她在往後的生活中，傾向掩蓋這部分的背景。

馬：你會跟你同學講說你們家的祖籍是廣東的？

小亞：曾經有講過，後來就沒講。因為講了之後，其他人的反應感覺不是很好。其實那段時間大家好像蠻仇中的，尤其到大學，就會感受到很多人對中國人是鄙視的，比較負面。對，有時候我只是為了文化交流，用當地的、對方的語言，但是可能不小心……假設大陸……我們叫軟體，大陸叫軟件，或者我們叫影片，他們叫視頻。我太習慣用大陸的講法，然後不小心跟同學講出來，他們就會瞪一眼或者冷眼的看著我，有一種……你剛剛怎麼在講那種話的感覺。」

在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中，相較於易與「多元文化」掛鉤上的緬甸、東南亞「新二代」身份，與中國容易產生聯想的祖籍身份，是相對較不理想的族群認同展演選項。

像是受訪者阿勇，就會因為感受到比較敏感，就減少提及。「我很少講自己是雲南的，就比較常講緬甸相關的。可能也跟整個環境可能對於這方面可能會比較敏感有關，特別講到雲南食物的時候才會提到，對。」（阿勇）向阿勇一樣會自己調整的人不少，甚至更多人是會正面講述「因為周遭的人們的態度更擁抱多元，讓自己能夠擁抱更緬甸身份」。

但在這部分受到歧視的案例，相較於未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因為展露出緬甸身份而被歧視」的案例而言，稀少許多。主要是因為他們大多會敏銳地掩蓋這部分，在認同上轉為「新二代」避開了被歧視的可能。同時，大學的環境要藏也比較容易、互動較為良性成熟，也能很好地將身份矇混過關為新二代。也因此我在田野中比較少取得「實際受到具體負面經驗」而選擇掩蓋中國相關背景的故事。

然而，當我翻找過往錄製 podcast 的錄音檔作為田野材料，我發現一段自我介紹的對話，不僅能說明周遭人群對華僑的排斥觀感，更能看出當時的回應，如何進行迴避。幾年前，我受邀上錄音節目分享緬甸政變的分析與心得，在該音檔中一開始的自我介紹環節，主持人結結巴巴地講到「今天有一個新的特別來賓，他是這個……緬甸華僑，其實我說華僑……有點怪怪的，因為我心裡認同，我想說台僑……但是一般來說……欸我們來聽他自己怎麼說好了」

而我緊接著回答，聲稱自己不會說自己是華僑二代，自我認同為台灣人。「大家好，我是 salima。剛剛主持人介紹我是華僑還是台僑呢，其實我們家是從雲南遷移到緬甸，所以他們會覺得自己是華僑，可是，我是在台灣土生土長的，算是緬甸的第二代，新移民，我覺得我算是在台灣生長的新移民，人家問我說，你是華僑二代嗎，我自己比較不會這樣講，但我就是覺得自己是台灣人。」從逐字稿中，可以發現當時的我特別使用家人／他們覺得等詞彙，避免將自身與雲南、華僑認同做出關聯，並強調台灣認同。這段回覆顯現出華僑身份與台灣認同，可能是兩個難以同時存在的概念。

3. 台灣社會與地緣政治下敏感的中國關係

由於台灣海峽兩岸的政治對抗，與中國人有關的身份，容易受到地緣政治污名



的影響，被視為政治上的他者。首當其衝的除了中國配偶、中國配偶子女、中國學生，在田野中，許多受訪者都有目睹或有所描述。然而，因為政治敏感而產生的負面刻板印象，並非中國配偶及其子女或中國學生獨有的，對緬華二代來說，提到祖籍會想到中國政治上的威脅。在取得高等教育的緬甸華僑二代的經歷中，上大學後更有這樣的感覺。

中國與台灣近年的關係越來越緊張，大部分受訪者大學的時間，都是蔡政府之後，也是台灣與中國關係越來越敏感，2014 太陽花運動之後。2019 年至 2020 年的反送中。都讓年輕世代對中國可能更有負面的看法。

因為政治上的敏感，緬華二代會避免自己透露出自己有中國人認同，或者主動分享自己的祖籍家庭背景。

除了因為中國的侵略與威脅造成的敏感，有著「中華民國」國號的台灣，也是另一種層面的敏感。華僑這個詞也不能使用，因為台灣從中華民國轉變為「台灣」，說是「華僑」就預設了中華民國、華人思想，而非台灣。

除了台灣與中國的敏感，台灣作為一個不確定的國家，「華僑」二代失語、在台灣這個新認同中找不到詞彙，以及他們本身與第一代認同的斷裂，也讓他們不知道如何自我指稱。台灣文化與制度邊界歷經重構，過去被中華民國政府稱頌的「反共義士」、「華僑為革命之母」等說法，在民主化與台灣化的過程消聲匿跡。因此，雖遷移軌跡鑲嵌在台灣與中國特殊關係的歷史中，在受教育的過程中，緬甸華僑二代無法從課本中得到解答，因而出現對家庭遷移歷史陌生，並對認同感到矛盾困惑的狀況。相較新二代能在政府開始推動新南向政策後，擁抱夠促進跨國交流、多元文化的敘事，緬甸華僑二代的身份卻無法被精準的描述。

在一次訪談中，受訪者小密向我表示，大部分再在談台灣在談多元文化時，會感覺緬甸華僑不被歸類於台灣的框架中，但當談論多元文化時，又能被包含。

能把緬華包裹進來的敘事從過去的華人血脉，變成東南亞、多元文化的一部份。

「你會覺得緬甸華僑這個群體……如果台灣是這樣一個圓圈，台灣的緬甸華僑算是在裡面，還是你覺得這群人是在外面的？對你而言，你自己的感受。」

小密：「我覺得在邊邊，在邊邊。尤其在台灣談台灣本位的時候，會覺得這些人可能不會被包含在裡面。可是如果說什麼多元文化社會這些人又會出來就會出現。就像……就像……就像我身邊的新二代也是這樣子，我認識的幾個越南人也是這樣。」

因此，在中國身份有污名、失語的情況下，剛好有替代的身份更為好用，緬甸華僑二代們在各方考量之下，便會選擇稱呼自己為緬二代、新二代。

第五章、結論

一、主要研究發現



	祖籍雲南	祖籍閩粵（廣東／福建）
取得高等教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展演出新二代／緬二代認同，即便私底下沒有新二代認同。2. 對緬甸文化較為陌生，熟悉雲南文化3. 掩蓋與中國、雲南相關的身份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展演出新二代／緬二代認同2. 對祖籍文化較為陌生，熟悉緬甸文化3. 認為祖籍與自己連結較淺
未經過高等教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展演出外省人、華人認同2. 對緬甸文化較為陌生，熟悉雲南文化3. 掩蓋與緬甸相關的身份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展演出外省人、華人認同2. 對祖籍文化較為陌生，熟悉緬甸文化3. 掩蓋與緬甸相關的身份

表四：不同教育經驗受訪者認同展演差異

本研究在對緬甸華僑二代認同展演的描繪上，以及對影響緬華二代認同展演主要因素的考察方面，有著出乎意料的發現。首先，在田野中，本研究發現，比起自身在家庭中的文化實踐，緬甸華僑二代接受高等教育與否對族群認同以及認同操演的影響更為關鍵。未經過高等教育的受訪者，無論祖籍為何，身份操演策略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在取得高等教育後，許多人也指出了他們認同操演的方式有出現改變。彼此教育軌跡相似的緬華二代，不管原生家庭中緬甸文化／祖籍文化的多寡，做出的認同展演存在著不約而同的默契。

即便祖籍不同，和自己高等教育取得狀態相似的緬華二代，經常會採取相似的族群身份展演策略。未經過高等教育的受訪者之間，對於身份中的緬甸、東南亞相關的部分，他們會傾向避談，並且有默契的在校園中相互掩蓋。針對身份中的華僑、祖籍的部分，則會在他們的聲稱中被強調、放大，佔據他們身份中較為主要的部分；相反的，取得高等教育的緬甸華僑二代，則會展演新二代、東南亞二代的多元面貌，並針對身份中涉及中國的部分加以迴避，甚至發展出「替代性的認同」，來為其家庭背景中「華僑」的部分進行解套。

透過田野調查與訪談，我發現祖籍與成長過程中接受到的文化，對緬甸華僑二代的認同操演並沒有決定性的影響力。比起祖籍與實際的文化接觸，高等教育似乎更深入地影響了緬甸華僑二代的認同展演。儘管擁有相同祖籍的緬甸華僑二代間，彼此擁有共通的語言、飲食及信仰經驗，但他們並未形成集體認同，或統一的認同操演策略。相反地，不同家庭／祖籍背景的緬甸華僑二代，反而可能與和自己的教育軌跡更為相似的人，表現出較為相似的族群認同樣貌。

未經過高等教育的受訪者，無論祖籍為雲南或者閩粵，往往傾向選擇掩蓋與東南亞及緬甸相關的身份。即便在日常生活中容易遇到和自己家庭背景相似的同儕，未經過高等教育的緬甸華僑二代，無論在校園、工作場所，皆並未因著共通的族群背景形成集體認同，而是相互遵守著隱藏身份的淺規則。在身份尚未曝光之前，他們大多會採取裝正常、堅持否認的方式，以呈現與台灣一般人無異的形象。然而，在某些需要揭露自己家庭背景的時刻，未經過高等教育的緬甸華僑二代，也會採取避重就輕的方式，強調身份中「中國」、「祖籍」的地位，並將身份中緬甸的部分盡量輕巧地帶過。

相反的是，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中，無論祖籍為何，皆對身份中涉及「中國」、「祖籍」的部分有著較為敏感的反應。不但不會主動談論自己的祖籍身份，在需要介紹家庭背景的對話情境中，他們也會採取其他替代性方案，來避免自身的認同與政治上較為敏感的「中國」身份有所牽連。相對地，他們會強調及凸顯自身的多元文化價值，在升學及申請獎學金的情境中，會被取得高等教育的緬華二代們強調，做出符合「東南亞新二代」、「緬二代」想象的認同展演。

除了發現高等教育對緬甸華僑二代認同展演的影響，甚至比家庭更為關鍵，本研究更進一步地探索了緬甸華僑二代在未經過高等教育與取得高等教育的環境中，各種與族群身份相關的經驗。並在統整了未經過高等教育與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們描述周遭人群對不同族群身份觀點的觀察後，對不同環境中主流的，對東南亞及中國的刻板印象，有了深刻地捕捉。從未經過高等教育的受訪者的生命經驗與認同展演的方式看來，周遭人群認為東南亞、緬甸，是較具污

名的身份。相對而言，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們認為，在上了大學後，東南亞與緬甸通常被視為多元文化的象徵；針對身份中的與中國脫不了關聯的祖籍身份，則是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們，會面臨到更多的政治敏感困境。而未經過高等教育的受訪者們，較少感受到此壓力，甚至有些受訪者會覺得這是更好的身份認同選項，因為在他時常互動的人們眼中，中國身份並不會讓人聯想到貶意。

在發現不同的高等教育取得狀態，可能意味著周遭人群有著完全不同的，看待族群身份的方式後，本研究又再更進一步的探索，是哪些更大的社會結構與政策的影響，導致了人們觀點的不同？本研究認為，未經過高等教育的受訪者們揭露自身在互動中遭遇的、多因著東南亞身份而來的歧視，應與東南亞身份的移工在台灣常被賦予的階級聯想有關。台灣的移工主要以東南亞為主，而移工在階級上的經濟弱勢刻板印象，也沾黏在人們對同地區的想像中。即便緬甸華僑二代無論在遷移管道、生命處境，各方面都與移工有所不同，歧視與污名也並非專屬於其起源族群，仍然可能外溢至許多與之相關的身份上。與上述原因類似，在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試圖做出新二代的姿態、自述迴避祖籍的認同操演的行為背後，是對與中國身份相關身份的敏感。而這樣的敏感源自於周遭人群因著政治因素，所形成的另一種刻板印象。因著地緣政治的緊張，對中國身份的標籤化，並不是只對有中國籍的學生、中配子女的生命經驗產生影響。

除此之外，政策的改動或建置也會對人們的想法產生影響。本研究在取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的經驗中，發現東南亞、多元文化等身份有著正面印象的共通性。從升學管道、課堂中、校園活動到細微的互動，都讓緬甸華僑二代們察覺到緬甸身份可能成為一個較理想的認同展選項。本研究認為，這與新南向政策的設立有關。新南向政策被政府大力推廣，在教育層面，透過各種制度的建立，打造了一套「東南亞」、「多元文化」是一種優勢、文化資本的論述。而這套論述也在新南向政策施行後，逐漸於校園，特別是從大學校園中開始成為主流的價值觀。緬華二代們在流動至大學的過程中，了解到彰顯身份中的緬甸身份，成為一種有利的族群身份操演方式。

宏觀的政策、地緣政治與階級污名等因素，透過周遭人群與緬甸華僑二代們活生生、血淋淋的互動，形塑了緬華二代們心中對周遭人群主流價值觀的想像。緬華二代在斟酌、揣摩人們如何看待緬甸／自身祖籍後，會對自身的認同展演進行管理，調整對自己家庭背景、族群認同的呈現方式。



二、研究貢獻

本研究在經驗層面上最主要的貢獻，在於描繪出緬甸華僑二代的認同和認同展演為何。同時，透過呈現出田野中緬甸華僑二代們為避免遭受污名、觸碰到敏感的議題，而管理、調整族群認同展演的策略，亦揭示了台灣社會中現存的、針對特定身份的刻板印象問題，以及新南向政策推廣除去東南亞污名的效果與限制。

因此，在經驗的層次上，第一個貢獻便是將緬甸華僑二代在文獻中缺席的身影補齊。過往針對緬甸華僑的研究都以第一代作為研究對象，且研究關懷多以族裔聚落、飛地與其經濟等面向進行考察。最重要的是，或許是礙於研究者身份與滾雪球方法的限制，大多數研究者不是只以祖籍雲南的受訪者為主，就是多以祖籍閩粵、過去居於緬南的受訪者為主。本研究以緬甸華僑二代作為研究主體，並且控制性別比例、祖籍背景比例與高等教育取得的比例，以更精準地描繪出不同緬甸華僑二代家庭、高等教育程度不同的受訪者的生命經驗。

第二個經驗層面上的貢獻則是，過去在台灣、東亞研究中，大部分關注的焦點仍以婚姻移民與其子女為主。同時現有新二代政策主要針對婚姻移民子女設計，緬甸華僑二代若也希望能受惠於此政策，得需要管理身份、讓自己盡可能符合制度的想像。透過了解緬甸華僑這個不被當成移民、其後代子女也與新二代處境不盡相同的案例，能讓提供更寬廣、更多元的移民圖像。

除了經驗上的貢獻，本研究在理論上也有所突破。首先是針對過往地緣政治與移民認同相關研究的延伸。過去雖然已有研究指出，地緣政治會對移民的處境與身份的管理產生影響。但在本研究中發現，即便在同一國家內，不同環境對

不同身份的影響效果有所差異。台灣社會中，並不是只有一種主流的看法，社會流動或者高等教育取得，會影響人們進入不同的圈子，而周遭人們對族群身份較為支配性的觀點，也會因此有所差異。



在台灣社會中，或許理解到「東南亞身份、移工身份在社會中存在污名」並非難事，要發現「地緣政治因素使得與中國相涉的身份變得敏感」，也並不困難。然而，透過緬甸華僑二代管理身份的方式與他們說出的故事，能讓我們發現，並非身處同一個國家內，周遭人們主流的價值觀就是均等、一致的。不同的環境中，對族群身份的想像可能有著完全相反的論述與判斷。在交織性的影響下，因著階級的不同，會有著截然不同的評判標準。如同本研究中，高等教育便是鮮明的分水嶺，許多受訪者皆指出，上了大學後周遭人們對緬甸與中國的印象有所轉變。緬甸華僑像是試紙，放入不同酸鹼性容器中，會呈現出不同的結果。因此，我們可以將緬甸華僑認同展演的結果視為證據，檢驗出台灣社會蘊含的問題。

第二個理論上的貢獻，則是選擇了與過往移民研究相反的關注焦點，並發現其中有著許多探討、進一步研究的必要。過去西方針對移民與二代的研究，大多關注難以融入、面臨困境的移民，緬甸華僑二代在認同上具有操演性，或許處境不至危殆，也能展演出身份中較為有利的部分，但透過考察緬甸華僑二代的認同，也讓我們從另一種視角思考，是否只要能依循著不同環境中的規則，管理族群身份認同而在個人層次能被減少歧視就夠了？在田野中，可以看見緬甸華僑二代雖然能調整呈現族群身份的方式，但許多人仍然面臨折認同的困惑、失語，甚至需要掩蓋或做出與原生家庭給予的文化並不完全貼切的身份展演。若將個個精通華語、擁有完整公民身份，看似順利融入進台灣社會的緬甸華僑二代，視為同化順利的案例，我們將看不見這些更幽微、隱晦的問題。

除此之外，在過去研究移民與當地人互動的文獻中，多預設同化是線性過程，隨著移民群體與當地互動愈深，移民後代的認同、行為、語言都可能愈貼近移入社會。然而在本田野中，可以發現有些緬二代的緬甸認同展現、語言使用、母語學習，是在新南向政策和環境的相互影響下，被塑造起來的。原先家庭中

可能不使用緬語、並沒有教導孩子要認同自己是緬甸人，但可能會在緬華二代發現「新二代」身份的優勢下，自發性的去上緬文課、接觸緬甸文化，甚至在公共場合、社交媒體上公告自己的緬甸身份。也因此，本研究在理論上的貢獻，也揭示了家庭、原生環境給予的文化，並非完全決定了認同與認同展演，比（受到教育程度影響的）周遭人們的態度，家庭的影響可能較小。

三、研究限制與反思、建議

在論文寫作的初期階段，我產出了許多份有關「家庭語言選擇」的草稿，我觀察到「母語復振」是一個對我生活的環境中安全、正確的提問方式。近年來，無論新二代或者台灣母語復振的聲浪，收到的迴響都相當正面。然而，我始終迴旋在我的母語就是雲南話，而非緬甸話的困境中。好長一陣子，我不知該如何面對自己的母語即是自己口口聲聲說的「支語」，在談論復振母語議題時，也時常受到價值層面的問題困擾。我是否要假裝我是雙母語？我的父母確實也是會說緬甸話的，我也算能理解些皮毛。難道我應該認為這座島嶼應該支持我講雲南話嗎？還是我應該放棄母語，快點同化就好？我發現「母語復振」的問題，一旦建立在我的母語是雲南語的前提下，就變得非常敏感。在一次團體 meeting 中，同學問了我一句，你最好奇的問題是什麼？我驚而察覺，長期不願意觸碰的，最敏感的問題，便是我到底是誰？台灣社會該如何看待我？以及我們到底該如何思考台灣的人群類屬？這才是真正最想處理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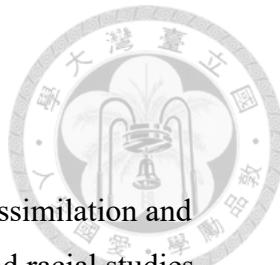
也因此，在論文寫作的過程中，我釐清了緬甸華僑二代或我自身，在認同上面臨的幽微困境。首先，在未取得高等教育階段，社會中的部分主流觀點，仍充斥著針對移工與東南亞的負面印象與經濟層面的污名。即便目前已有新二代的政策與許多相關的倡議，在高等教育環境中也確實能看見主流態度出現改變，但現有問題是，在高等教育、聲音較容易被聽見、具文化資本的人群之外，該如何洗刷有關東南亞與負面刻板印象的連結。同時，在推廣新南向政策時，過度樣板、單一的想像，除了排除了某些人的受惠，比如華僑二代或者中二代，

更影響了緬華二代的認同展演——需做出迎合政策想像的特定族群認同姿態，這也形成了另一種層面的限制。



新南向政策的推出，與逐漸走向台灣化的路徑上，國家欲追求多元文化形象的目標一致。過去優惠華僑政策的取消、政策的改變，近年華僑身份的敏感，讓來到台灣的緬甸華僑與後代成為難以描述的群體，就像不屬於台灣社會中的族群，難以談論，因此在潑水節活動等節慶，能看見國家將其轉變為強調其緬甸特點的宣傳方式，忽略其過往遷移脈絡。在本研究的最後，我認為台灣社會應該直視恐懼，除了宣傳緬甸街緬甸文化，也應該好好面對歷史。緬甸華僑分明是鑲嵌在台灣歷史社會中，因著「東南亞排華、中華民國政府吸引華僑」歷史背景，大量遷居而來的，是政治因素及政策下的產物。因此，我認為讓不知道自己是誰，不知道該如何理解自身家庭遷移背景與當地社會的關聯的緬甸華僑二代，繼續將自己當成「新二代」或「有點像外省人」，也是一種不正義。面對過往華僑遷移至台的歷史，透過讓移民的後代知道自己為何在這裡，和其他移民群體的差異，是促成族群身份平等不可忽略的重要功課。

參考文獻



西文文獻

- Alba, R. (2005). Bright vs. blurred boundaries: Second-generation assimilation and exclusion in France,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8(1), 20-49.
- Biernacki, P., & Waldorf, D. (1981). Snowball sampling: Problems and techniques of chain referral sampling.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10(2), 141-163.
- Brubaker, R., & Cooper, F. (2000). Beyond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ety*, 29(1), 1-47.
- Chung, E. A. (2020). Immigrant incorporation in East Asian democrac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rley, R., & Alba, R. (2002).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6(3), 669-701.
- Glaser, Barney G. and Strauss, Anselm L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 Imbens-Bailey, A. L. (1996). Ancestral language acquisition: Implications for aspects of ethnic identity among Armenian America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5(4), 422-443.
- Lan, P. C. (2024). Contesting Boundaries and Navigating Identities: Second-Generation Adult Children from Cross-Border Marriages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 Moya, P. M., & Hames-García, M. R. (Eds.). (2000). *Reclaiming identity: Realist theory and the predicament of postmodernism*.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 Phinney, J. S., & Alipuria, L. L. (1990). Ethnic identity in college students from four ethnic group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13(2), 171-183.
- Portes, A., & Rumbaut, R. G. (2006). *Immigrant America: A Portrait*, Third edition. Revised, Expanded, and Updated (3rd 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ortes, A., & Zhou, M. (1993).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30(1), 74-96.
- Purcell, V. (1965).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umbaut, R. G. (2008). Reaping What You Sow: Immigration, Youth, and Reactive Ethnicity. *Applied Developmental Science*, 12(2), 108–111.
- Sadeghi, S. (2016). The burden of geopolitical stigma: Iranian immigrants and their adult children in the US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17, 1109-1124.
- Shams, T. (2020). Here, there, and elsewhere: The making of immigrant identities in a globalized worl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Zerubavel, E. (2015). Hidden in plain sight: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irrelev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Zolberg, A. R., & Woon, L. L. (1999). Why Islam is like Spanish: cultural incorporation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s & Society*, 27(1), 5-38.

中文文獻

于嘉明（2004）多元共生下的當代台灣穆斯林社群。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

方雄普（2001）有關緬甸華僑華人族群的幾個問題。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7-14。

王宏仁（2001）社會階層化下的婚姻移民與國內勞動市場：以越南新娘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1期

王志弘、沈孟穎（2009）疆域化、縫隙介面與跨國空間：台北市安康市場“越南街”族裔化地方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3期，P119 - 166

王志弘（2011）我們有多元文化城市嗎？台北都會區東南亞族裔領域化的機制、類型與作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2期，P31 - 84

王甫昌（2003）。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出版社。

王賡武（2002）〈海外華人社會與地方史文獻〉，收入劉宏、黃堅立主編，《海外華人研究的大視野與新方向：王賡武教授論文選》，新加坡：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利亮時、賴郁如（2012）臺灣印尼客僑的歸屬經驗台灣東南亞學刊；9卷2期，P109 - 131

范宏偉（2006）〈1967年緬甸6.26排華事件與緬華社會研究〉，《臺灣東南亞學刊3卷2期》。

夏曉鶴（2000）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婚姻—以台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例。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9期（2000/09/01），P45-92

張茂桂（1993）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業強出版社。

陳浩寧（2017）從搖籃到社會：像新二代這樣的臺灣人。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馮涵棣、梁綺涵（2008）越南媽媽、臺灣囡仔：臺越跨國婚姻家庭幼兒社會化之初探。臺灣人類學刊；6卷2期。

黃士純（2010）上緬甸雲南籍緬華移民的研究—變遷的國族邊界。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

黃克先（2005）原鄉，居地與天家：外省第一代的流亡經驗與改宗歷程。台灣大學社會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郁涵（2009）全球化、跨國流動與都市飛地：中和緬甸街移民社區之研究，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位論文，臺北市。

葉子香（2008）文化的認同與變遷—以居住台灣的雲南人為例。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翟振孝（2006）遷移，文化與認同：緬華移民的社群建構與跨國網絡。

盧姿云（2021）新移民子女認同形構探究：生命歷程觀點。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學位論文，2021，1-152。

蕭阿勤（2013）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簡珮韻（2003）韓華與永和韓國街：一個經濟面向的國際遷移調適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學位論文，2003，1-139。

龔尤倩（2017）華僑與公民身分：以 1990 年代台灣菲律賓華僑為例。社會分析，（14）39-74。

附錄、訪談大綱

基本問題

1. 姓名
2. 是否有緬文名字

3. 年齡
4. 出生地（遷移過？家裡哪一年來）
5. 居住地區（遷移經驗？過去曾住過緬甸街？遷離這個群居地？）



認同

1. 你認為大家如何看待（中國人？緬甸人？緬甸華僑？雲南籍、（緬南）福建廣東籍？台灣人？一般新二代與新住民？）大家可以是身邊的人與同溫層或者大眾。（有聽過說緬甸街很髒很亂？）
2. 自己對各個身份的印象與差異（中國／華人？緬甸人？緬甸華僑？雲南籍、廣東籍？台灣人？一般新二代與新住民？）
3. 過去在學校有聽聞或者親身經歷過，因為緬甸身份所帶來的歧視嗎？（老師是否會有差別待遇或者歧視言論？同學之間呢？）
4. 家庭使用什麼語言？（小時候、長大之後？父母之間？父母與其他家人？）
5. 家中成員的認同？（有聽過父母、家中其他長輩說過自己是中國／緬甸／雲南／廣東人？）
6. 自我認同為何？（覺得自己是什麼人？有過困惑，覺得「自己到底是什麼人」的經歷嗎？認為自己是新二代或者外省人嗎？或有覺得哪些像或者不像？在台灣的族群之中，你認為自己屬於哪個族群？）
7. 對緬甸的情感（會緬甸話嗎？想學嗎？覺得應該要放入教材嗎？覺得應該要放入教材嗎，還是同化就好？食物是否有歸屬感？有回去過探親嗎？對緬甸的印象？對緬甸政變看法？家人在政變時看法與行動如何？）
8. 對省籍，雲南或者廣東福建的情感（是否會講方言？想學嗎？覺得應該要放入教材嗎，還是同化就好？會擔心所謂支語問題嗎？食物是否有歸屬感？對雲南或廣東福建的印象？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嗎？對祖先的故鄉有想回去尋根？）
9. 台灣認同（認會不會講台語？跟台灣同儕的差異？哪些經驗讓你感受到這些差異？為自己是台灣人嗎？）

過去揭露自己家庭背景的經歷？（對誰說？在什麼場合說？會如何說？）

10. 當被問到是哪裡人時，會如何回答？（有對外說過自己是外省人／新住民或新二代？什麼情況下？講最印象深刻的）
11. 在求學階段，如何與學校同儕揭露自身家庭背景？（會跟同學、朋友說嗎？有交往經驗的話，會跟另一半說嗎？）
12. 升學或求職的過程，如何揭露自身家庭背景？（有寫在備審資料裡？怎麼寫？或是求職的自傳中？有提到過嗎？）

社會困境

1. 目前職業／未來職業規劃
2. 過去的求學經歷（國小、國中高中為何？公立私立？是否有遷過戶籍？）
3. 父母的職業背景與教育安排（爸媽的工作？是否有親自教導課業？語言或者教育程度有辦法指導你嗎？有送去補習安親或者給予其他教育方面的支持嗎？或者皆無，比起成績，較注重做人處事？放學課後的活動安排？）
4. 在讀書期間，你自認比較偏向成績升學導向，還是就業並及早出社會賺錢的導向？（如何花心力準備升學？讀書階段打工經歷？成績表現如何？家裡會不會期待你趕快出來工作）
5. 與工地、原鄉產業的連結，包含餐飲業。（認識的家人在做，或者自己有參與的經驗？如何參與？）
6. 同儕與身邊時常互動的朋友，處境如何？（並不限於緬華背景）
7. 相關補助、福利、國家資源取得？（低收？或者新住民相關的？）
8. 緬甸背景親友、同儕與同學的處境如何？（聽過處境最艱難的案例？有聽過入監或者犯罪經驗的嗎？）